

红色年轮·将帅系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许世友
展示这位传奇将军鲜为人知的一面

孙洪宪◎著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

——我给许世友当秘书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色年轮·将帅系列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
——我给许世友当秘书

本书作者是开国上将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的首任秘书。他以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许世友许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给读者一个大忠大勇、刚烈正直、粗中有细、有血有肉、可亲可爱的传奇将军的形象。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18-07089-6

9 787218 070896 >

定价：32.00元

红色年轮·将帅系列

孙洪宪◎著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

我给许世友当秘书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我给许世友当秘书／孙洪宪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18-07089-6

Ⅰ.①在… Ⅱ.①孙… Ⅲ.①许世友（1906～1985）-生平事迹
Ⅳ.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2655 号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

——我给许世友当秘书　　孙洪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选题策划：钟永宁
责任编辑：余正平
装帧设计：艺和天下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7089-6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75　　插　页：2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作者与许世友在一起

序　言

1973年12月到1976年8月，我在广州军区给许世友司令员做了近三年秘书。

《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我给许世友当秘书》，初稿写成于1993年。那时候，我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军事工作研究室工作。那一年，许世友去世已八年，我调离许世友身边已十七年。因为曾有在许世友身边工作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每每回首往事，岁月越久远，记忆越深刻。特别是老将军政治敏锐、善辨真伪的能力，刚直不阿、敢作敢为的气概，身居高位、不忘本色的品质，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风范，出身平凡、气度不凡的传奇，以及他的机敏睿智、幽默和蔼等，总使我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升腾起对他的敬仰。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怀着崇敬和虔诚，忠实地去记录在许世友身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这就是我写这篇稿子的初始动因：不是为了去发表，纯粹是为了纪念。因此，稿子写成后便放进抽屉里，一放就是十二年。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许世友诞辰一百周年，有几家媒体约我写写许世友的故事。于是，我把十二年前写的稿子从抽屉里找出来，请几个朋友润润色，便先后在《中华儿女》杂志、《羊城晚报》以及《人物》杂志等，

分别以《许世友在广州》、《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为题连载了。

稿子连载后，社会反响热烈，争相转载的境内外报纸、杂志、网站不下二十余家。军内外一些单位和媒体主动登门采访或邀请参加座谈会，要我介绍许世友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有些热心的读者或登门或电话相邀聚会，要求当面给他们讲讲许世友的故事。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对许世友的拥戴和喜爱，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同时也为自己曾有幸担任许世友的秘书感到光荣和自豪。

自许世友去世后，我就注意广泛收集和阅读有关他的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小说，以及传奇故事等。我发现，在诸多体裁的文本中，普遍对许世友六十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经历，记叙得过于简略，使人读后总感到像少了点什么。因为我对许世友这一时期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座谈中，许多同志都热切希望我能写一写，以填补这一时期的空白。他们说，许司令在广州这段时间的情况，你了解得最直接、最具体、最真实，你最有资格写，要尽快写出来，以让广大读者对许司令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广大读者对许世友的爱戴和要求写一写许世友在广州的期盼，激励了我的写作动力。我作为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后的首任秘书，在与他朝夕相处的三年时间里，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了许世友为我党我军的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写好许世友在广州这一时期的情况，以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盼。为此，我又把五年前已发

表过的稿子找出来，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形成现在这篇稿子。

我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高级将领中，不乏传奇式的人物，许世友当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广大读者喜欢读许世友的故事，大都是因为他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因此，写许世友在广州，既要真实反映他工作、学习、生活的一面，也要尽力反映他人生传奇的一面。许世友晚年的传奇故事，是他传奇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历史上的传奇故事是一脉相承的。本书在记叙他这一段时间的传奇故事时，力求与他在历史上有关的传奇故事联系起来，使之融为一体，以达到许世友传奇人生的系统性、真实性与生动性的统一。

许世友一生传奇，也一生辉煌。他是我军战功卓著的猛将和卓越的指挥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以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贡献，赢得无数人的崇敬和热爱。但有些出版物为了猎奇，片面夸大了许世友特殊性格的某些方面，歪曲了他的形象，把他写成是李逵、鲁智深式的，有勇无谋、简单粗暴的鲁莽人物，严重误导了读者。本书在写作中摒弃那些对许世友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的传说，力求多方位、多视角、准确、全面地把握许世友的特殊性格，给广大读者一个大忠大勇、刚烈正直、粗中有细、有血有肉的、可亲可敬可爱的、真实的传奇将军的形象。

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几年，与他光辉的一生比，只是短暂的一段。写他这一段经历，因时间跨度小，在文章结构的设计上，采取了集纳式的方法，把许世友在工作、学习、生

活、作风中，最能体现他特殊性格的故事，分类为十六个方面加以叙述。这样安排，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但条理清晰，有助于读者从多个角度全面了解许世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小平、刘立忠、王景喜、张燕卿、孙广军、李经林、费存宝、许怡平、吴东林、刘海霞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有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的帮助修改文稿，有的帮助联系和安排出版事宜。写作中还参考了《许世友回忆录》、《许世友传》、《许世友的晚年岁月》、《毛泽东之剑》、《近看许世友》等书，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写作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作　者

2011年3月

引 言

1905年2月28日，在今河南省新县许家棠的一个农户家里，随着一连串响亮的啼哭，一个健康的男娃呱呱坠地。祖母盼望再多添几个孙子，就为孩子取乳名“又得”，按照家族排行，左邻右舍还是习惯用“三伢子”来称呼这个襁褓中的婴儿。

许家棠的乡亲们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身世平平的“三伢子”，在许多年以后，成就了新中国将星榜上最为经典的传奇。许世友，这位戎马一生、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上将，他的传奇故事像神话一样在民间和军营广泛而恒久地流传。

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这一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曾经手举《语录》高呼万岁，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林彪惊慌叛逃，折戟蒙古温都尔罕。这对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辗转难眠，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认识到，整顿军队刻不容缓，肃清林彪流毒势在必行。他多次派出工作组，下到各大军区了解情况。叶剑英认为，军队的

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为此，必须进行组织调整。叶剑英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兼会客室里，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对调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并任命邓小平为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时全国有十一个大军区。对调后，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因任职时间都不长，没有调动。

关于此次对调，有几点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第一，下命令就走；第二，人走家搬。军令如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 年 12 月，许世友奉命离开南京，匆匆南下广州。从此也才有了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与许世友朝夕相处的三年时光。

目录

引　言 …… 001

一、结缘篇 …… 001

- 想到将要去直接面对许世友，那些有关他如何凶狠的民间传说便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有些发憷
- 百闻不如一见，许世友远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凶
- 一次普通的党小组会议，因为许世友的突然光临，气氛变得不可捉摸
- “什么行不行，我看他就行。”许世友一锤定音，选定我担任他的秘书

二、情感篇 …… 017

- 看似暴烈的许世友，其实也有非常细致的情感表达，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 许多人认为，许世友是个只关注打仗的铁面将军，我感到他还是个很会关心他人的长者。而他的关心，总是独具一格，别出心裁
- 日理万机的许世友有时也做身边人员的思想工作。他教育人，既无长篇大论，也无苦口婆心，那是典型的许世友风格

三、生活篇 …… 031

- 许世友的一日生活看上去很简单，但简单

的生活能让他讲出一堆大道理

- 许世友的饮食既简单又特别。他的餐桌上，一年到头有土味、野味，唯独没有洋味
- 许世友衣着也不讲究，一年到头身穿半新不旧的军装，一双草鞋在脚
- 许世友嗜好郊游，尽管发生过一次意外的“手枪走火”事件，但没有影响到他的郊游情趣
- 许世友还喜欢看电影、下象棋，但他的棋艺不算高，经常不按棋规走子，惹得对方常提“抗议”
- 许世友一天能抽好几包烟，但是他说戒就戒，为此他和韩先楚打赌，结果许世友赢了

四、打猎篇…… 049

- 战争结束了，很难再闻到战火硝烟的味道，打猎也就成了许世友延续战争情结的一种寄托
- 跑了一只野猪虽有些遗憾，但许世友还是像指挥打了一场胜仗那样高兴
- “不许打猎，打鸟总可以吧！”当年许世友在白云山上随口讲的一句话，后来却成了他在“禁止打猎”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五、农桑篇…… 059

- 能够把一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的精巧别墅，

改造成一个菜苗翠翠、鸡鸣狗吠的农家大院，这恐怕只有许世友能够做到

- “妈巴子的，竟敢钻到老子的地盘上分享劳动果实，消灭老鼠！”许世友又指挥了一场持久的灭鼠“战役”
- 许世友不仅种菜有招，而且养鸡有术，“生财”也有道，这些方面他很讲究，只是他的坐骑是完全用不着讲究的

六、饮酒篇 …… 071

- 许世友与酒，这是个不能不提的故事，因为酒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大都与喝酒有关
- 许世友不但酒量大，而且酒风好。我目睹了他喝酒的豪爽和“认真”
- 许世友有时把喝酒作为看人忠厚不忠厚、老实不老实的标志，较起真来，难免伤和气
- 周恩来“以酒制酒”，劝说许世友不要强迫客人喝酒，不要对客人罚酒
- 许世友把饮酒之道运用得精妙之至。他以酒会友，结交了众多英雄豪杰。晚年他又别出心裁地喝酒选将，给后人留下一段美谈
- 王建安笑着说：“喝就喝，跟许司令喝酒，图的就是个痛快！”

- 接到陈毅派人送来的茅台酒，许世友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喝，要喝就和宋时轮一起喝。"
- 许世友连连举杯劝酒，还发动工作人员轮流敬酒，我第一次醉酒了，是被许世友"灌"醉的

七、武功篇…… 101

- 许世友抡起哨棒，捅、打、劈、扫，连破四门，堂堂正正地打出了少林寺，成为少林寺少有的人杰而名扬天下
- 许世友虽没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央领导表演过少林功，但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曾为毛泽东表演过少林拳
- 许世友打下了少数民族寨主摆设的擂台，令寨主敬佩不已，置酒盛情送红军过山
- "没有武功的人抓人，只能扯破衣服。我抓人能连衣服带肉抓下一大块来。"许世友高兴时，常炫耀他的武功了得

八、力量篇…… 117

- 当许世友把关公庙里一把重八百斤的大刀扛回驻地时，众人皆称奇不已。一老者赞曰："真神人也。"
- 村民们被许世友双手同时举起两把百斤石锁的壮举惊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报以

热烈的掌声

许世友晚年雄风犹在，其力量远非一般年轻人可比

九、性格篇 …… 129

胆大好强敢碰硬，是许世友性格的显著特色。他在强敌面前不示弱，危险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低头。在许世友的字典里，找不到个“熊”字

“我们困难大，敌人困难更大，现在就看谁硬过谁，胜利往往就是在最后五分钟取得的。”

“看我的！”许世友说完，抓住绳子，双脚一跳，敏捷地向山崖上攀去

许世友不高兴了，厉声说：“我看能上就能上。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上！”

权贵面前不奉迎，强势面前不折腰，敢于匡扶正义，不怕惹火烧身，是许世友特殊性格的又一显著特色。他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救助了不少落难之人

位高权重的许世友，越升官越仗义，对落难弱者一次次伸出救助之手

十、廉洁篇 …… 155

许世友位高权重，但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没有个人的家业，唯一的家产，是

一口老式樟木箱子

- 许世友把七个子女全送去当兵，但他从来不允许给子女特殊照顾
- 许世友不给别人送礼，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我在许世友身边三年，只见他收过三次“礼”，送过一次“礼”

十一、警觉篇…… 167

- 世人传说许世友办公桌上放着一把手枪，谁进门不报告，他甩手就是一枪，曾经打死好几个老婆，这是谣传
- 许世友时时保持着超乎常人的警觉性，常年枪不离身。即使到北京参加一些限制携带武器的重要活动，他也枪不离身
- 战争年代经历的太多险情，使许世友遇事总爱从最复杂的方面去作出判断。这种以防万一的警觉性不难被理解，但有时也会弄得人哭笑不得
- 许世友也有警觉性不高的时候，他有时不按警卫规定办，常使警卫人员感到头痛

十二、作风篇…… 183

- 许世友下部队检查工作，从不提前发通知。他说：“等准备好了再去检查，就看不到真实情况了。”
- 许世友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到随机确定的单

位去检查，常使那些平时工作不扎实，上级来检查时又突击做表面文章的单位丢丑

- 许世友下部队照相，喜欢和部队家属、基层官兵、农场职工一起照，很少和部队领导单独照

十三、读书篇…… 193

- 许世友总被人理解成一个少文的武将，一个勇敢粗犷的军人，这并没有错。但他自幼嗜书如命，并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认真阅读《红楼梦》等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他还认真阅读了《汉书·周勃传》，并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当了一回“周勃”

十四、立场篇…… 205

- 戎马一生的许世友，几乎经历了我党我军所有的政治斗争事件，饱经世事沧桑，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
- 江青攻击陷害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阴谋伎俩常使许世友恼火，只是碍于毛泽东的面子，他才没有发作
- 许世友给张春桥画像：“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 许多人认为，许世友是个重武轻文的“粗人”，其实他粗中有细。他对政局的透彻了解和驾驭局面的高超技巧，远非常人能及

十五、作战篇…… 227

- 西沙之战爆发，许世友一改往日在家里办公的习惯，整日守在作战室里，胜利地指挥了这场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的战斗
- 许世友以74岁高龄，亲自指挥了广西方向的自卫还击作战，再一次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立了新功

十六、离别篇…… 235

- 许世友对我说：“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进院校深造。”
- 许世友的墓前，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上千个空茅台酒瓶，前来悼念的人都带上一瓶上好的茅台酒，绕坟墓洒酒一圈，用这样的方式寄托哀思

附录一　许世友同志生平…… 251

附录二　我的军人生涯（许世友）…… 256

主要参考引证书目及文章…… 282

一

结缘篇

● 想到将要去直接面对许世友，那些有关他如何凶狠的民间传说便涌上了心头，我情不自禁有些发憷

1973 年 12 月，岁末的广州，尽管两眼所及依然是绿意盎然，但霏霏细雨以及瑟瑟寒风的不断光顾，再加上那个年代所营造出的灰、黑时尚色，还是让人感到别样的萧瑟。此时，我已经完全顾及不到眼前这座大都市所特有的岭南韵味，心思已经被即将回家成亲的喜悦所充盈。穿上军装四年多了，还没有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兄妹，也没能闻一闻从家乡胶州湾吹过来带有浓浓的海的味道的空气。如今，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婚宴所需的食品、蔬果，新房也已经布置的喜气洋洋，就等着我回家后，炸响喜庆的鞭炮。双方父母选定的成亲日子就在眼前，回程的车票也已拿在手中，此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抽空转了转商店，买了一些广州的土特产，打点好简单的行装，第二天就要返回那冰天雪地、但温情融融的故乡了。

然而，下面发生的事情却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孙洪宪同志，根据组织决定，派你去担任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即日便要报到，你的婚假必须延期，退掉车票，准备开始新的革命工作……”

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主任陈玉宝的谈话还在继续，但我早已有些痴愣愣了，以致陈主任在后面谈话中强调的工作制度、工

作纪律、注意事项之类的诸多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脑子。为定住神，我走出陈主任办公室的大门时，下意识地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

吃惊、欢喜，还是害怕？反正太突然了，我当时也说不清自己的感受。但有一点能够肯定：从没想过自己一个从山村里走出的新兵，这一生中会有一天能够和名声赫赫的许世友将军联系在一起。

婚期自然是推迟了，这是军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沮丧。然而，一想到很快就要去直接面对许世友，就情不自禁有些发憷。

我知道，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就把许世友派到了山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许世友在山东战斗生活了十六年。许世友在山东打仗打出了威风，许世友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许多传奇故事，我在儿时就早有所闻。民间盛传许世友打仗不怕死，但脾气很暴躁。他不高兴时，轻则骂人，重则打人，惹恼了他还会动“真家伙”，曾经打死过好几个老婆和警卫员。我想，像我这样没有多少阅历的小干事，能打点他满意吗？万一有个闪失，惹火了他，打骂倒没什



红军时期的许世友

么，若真的撞在他的枪口上……我不敢再往下想，所有民间流行的一些关于他如何如何凶狠的传说，都涌上了心头。再加上为我送行的战友们，你一句我一句“要小心啊!”等亦真亦幻的劝告，我真的有些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了。

● 百闻不如一见，许世友远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凶

1973 年 12 月 29 日，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依照组织的要求，到广州军区珠江宾馆留园 7 号许世友的住处，正式向许世友报到。但许世友因事外出，从南京军区跟来的马寿生秘书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就在楼下的庭院里，马秘书向我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这时，我高度紧张的心才稍稍趋于松缓。马秘书说：“别看许司令平时少见笑脸，其实他还是很幽默的，生活起居也很简单。许司令也批评人、也大发雷霆，但那都是因为工作人员犯了错误。他批评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许司令可是不记‘仇’的。”马秘书还特别交代，“许司令喜欢实事求是，千万别在他面前自作聪明，不懂装懂。”我认真地倾听着，唯恐漏掉半个字。在马秘书那里，我还了解到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双数，比如两个司机、两个警卫、两个医生、两个厨师、两个服务员，当然还有两个秘书，从今天起，自己就将是两个秘书之一了。

我和马秘书正聊的兴起，一阵强烈的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首长回来了!”随着马秘书的一句低语，一辆风尘仆仆的老式北

京吉普车快速驶进院落，一个急刹，警卫员下车正准备去帮许世友开车门，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许世友已经迅速跳下车来。只见他一身戎装，腰扎武装带，腰带上别着手枪，威风凛凛地大步走来。传说中的神奇将军，第一次在十几米的近距离进入我的视野：

一个胖墩墩、硬朗朗的老军人，步履矫健轻盈，不到一米七的个头，紫红色的脸膛，浓浓的眉毛下，双眼锐利有神，刚剃过的胡须衬得脸色发青。那形象，活脱脱一个包公。我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慑力。

马秘书带着我疾步迎上去，把我介绍给许世友。我立正敬礼，许世友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军礼，在我的生命中永远定格为一种永不衰减的感动——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级别的首长的还礼。握手的一刹那，我感受到了那只短而厚的大手传递过来的力量。接下来，我便与操着豫鄂交界一带土话的许世友，进行了第一次很随意很有趣的交流。

“哪里人啊?”

“回首长话，山东烟台海阳县人。”我毕恭毕敬，尽量寻找体面的词儿回答。

“妈巴子的，什么‘回首长话’，跟我讲话用不着装斯文。”

一番奚落之后，许世友接着说，“烟台属胶东地区，那地方我比你熟悉，打了十几年仗，不夸张地说，我踏遍了胶东的每一寸土地。”

许世友随后一口气讲出了胶东地区几十个乡镇及村庄的名字，包括每一处的地形地貌和交通状况，包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领导胶东军民剿灭了横行胶东、作恶多端的赵保原、

蔡晋康、秦玉堂等大小24个国民党任命的“投降派”司令。许世友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三十多年前的战斗往事，如奇袭牙山、大战榆山、围困发城、争夺烟（台）威（海）、激战平度等，就像讲述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暗自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而许世友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驰骋疆场的峥嵘岁月，眼中充满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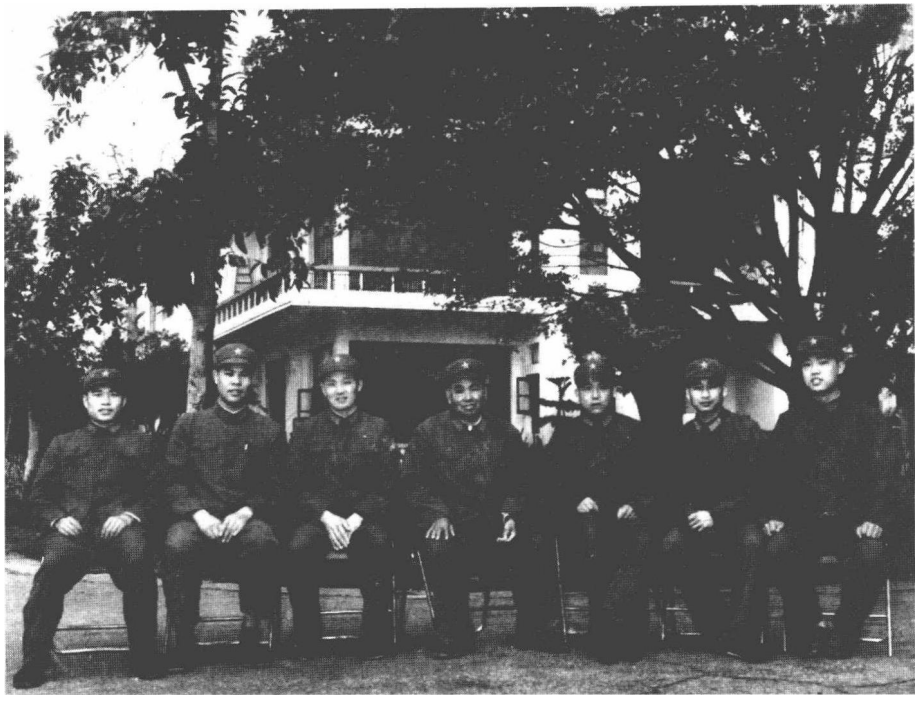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的许世友

正当我紧绷的神经稍感放松时，许世友话锋一转，问我：“什么家庭出身?”

“中农。”这次我的回答简单多了。

“中农？瞻前顾后，干革命可不如贫、下中农!”许世友的口气不容置疑，然后又操着一口大别山腔调，很流利地背诵了一段当年在胶东曾广为流传的，反映中农景况的顺口溜：“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苞米饼子就咸鱼，吃穿不愁乐悠悠。”许世友意犹未尽，“中农啊，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干那些掉脑袋的事就瞻前顾后，不大积极喽。”

许世友此时似乎意识到了，他面前的谈话对象就是中农出身，他不再讲下去，用眼睛的余光扫了我一下，大概是在观察我这个刚到他身边工作的中农子弟的反应。



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右三为作者）

我默默地听他讲，不露声色。

“当然了，干革命也离不开中农，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参军支前，中农也很踊跃嘛。”许世友换了个口气。

我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我告诉他，抗战时，我爷爷、我父亲都参加过他领导的民兵，抬担架、埋地雷，还听过他的战前动员呢。

许世友一听乐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爷爷多大了?”

“69 岁。”

“哦，和我同岁。”许世友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当年他领导胶东军民浴血奋战的许多场景。“像你爷爷这个年纪的，当年在胶

东，除了地主富农，没有几个没当过民兵的。当时的胶东，武装民兵有二三十万，普通民兵有四五十万，加起来有七八十万。胶东人好啊，忠厚实在，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以听得出，许世友对胶东群众的感情之深，这完全在情理之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一直是他战斗和生活的地方。胶东人民，胶东的山山水水，伴着他走过了一段最为辉煌的战斗历程。

其实，许世友在山东，特别是在胶东辉煌的军旅生涯，我早就在祖辈传颂的故事中了解了这段历史，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亲眼见证了许世友在山东，从一位战役指挥员到战略指挥员的巨大升华。

“你有多少文化?”

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直白的问话，不禁一愣：

“文化不多，高中毕业。”

“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别假谦虚了。”

“多大年纪了？结婚没有?”

这时，站在旁边一直默默无语的马秘书抢先回答：“孙洪宪同志快26岁了，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已经批准他回去结婚，他服从组织安排，推迟了婚期。”

许世友斜了我一眼：“妈巴子的，年纪轻轻的就想娶媳妇，没出息！我三十五六岁才结婚呢。”

我知道许世友的话更多的是玩笑成分，也知道他36岁结的是第三次婚，但还是没有胆子揭首长的底。

聊到这里，许世友就撇下我和马秘书，不慌不忙上楼去了。

马秘书对我一笑：“考核通过了。”

我不解其意。半个多小时的谈话，被许世友连续讽刺和奚落，怎么能算通过了呢？马秘书解释说："许司令就这脾气，他对不喜欢的人比较客气，但不愿多讲一句话。他如果喜欢一个人，偏不当面称赞他，反而会变着法子挖苦他，甚至会根据他的性格和长相送个绰号。许司令能跟你聊上半个多钟头，算是赏识你了。"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许世友果然个性强烈，但不乏幽默风趣，远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凶。

● 一次普通的党小组会议，因为许世友的突然光临，气氛变得不可捉摸

广州留园 7 号，曾经是董必武居住的别墅。1973 年 12 月之后，它的主人是许世友。除了开会或外出之外，许世友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这里，并且要求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集体生活、工作在这里。

这是一个由工作人员组织起来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出奇的团结和睦。在工作时间，秘书、警卫、司机、医生、厨师等，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开饭时就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就餐。业余时间，大家又在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因为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党员，为便于学习和管理，我向马秘书建议成立一个党小组，把工作人员的

组织生活规范起来。于是，1974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当得知许世友不外出的消息后，我们决定乘人员整齐，赶紧开会选举党小组长。

全体工作人员在楼下的大会议室里坐好后，开始酝酿党小组长人选，发言相当热烈。突然，许世友推门而入，大家赶紧起立："请首长指示！"随后全场鸦雀无声。

"什么指示？不懂规矩，党内一律平等嘛！"许世友听说我们要选党小组长，便顺手拉过一张硬板凳坐下，然后目光不停地在所有工作人员身上扫来扫去。

"党小组长嘛，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一定要选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选谁合适呢？"

他的目光首先瞄到了我和马寿生。他开口了："你们两个秘书大人，有文化、有知识、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讲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讽刺张春桥的话）。大家说，他俩当党小组长合适吗？"

很多人都忍俊不禁，许世友依然是一脸严肃，突然间，他把目光停在笑得尤其灿烂的两个警卫干事身上："瞧你们两个还笑，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次出去，吆三喝四，鸣锣开道，狐假虎威，回家保卫自己的老婆还差不多。你们当党小组长合不合适？"

这一下，大家实在憋不住，屋内响起"哧、哧"的笑声。许世友仍然不动声色，又把目光对准两个司机："你们这两位司机大人，可真是了不起，驾驶技术过硬，加足了油门，车开得比牛车还快，那车也很听你们的话，不是上树，就是掉沟。你们自己说，是

不是干党小组长的材料?”

两个保健医生刚想把头低下，许世友的声音已经直接向他们射去：“你们两个可是绝对的医术精湛，号称‘蒙估大夫’，给人看病，一靠蒙，二靠估，肚子痛擦碘酒，头痛贴膏药。我看你们就不错嘛!”

“还有厨房两个大师傅，不仅烹饪技术好，而且厨房的卫生搞得尤其出色，把里面的苍蝇抓起来，充其量也就有五六斤吧，你们当党小组长怎么样?”

大家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许世友始终不笑，他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重新扫描了一遍，确信对每个人都“惠顾”到了，这才站了起来。大家顿时安静，等候指示。

“你们开会吧，我走了。”说完，许世友推门而出。

大家面面相觑，尔后哄堂大笑，边笑边比划着重复许世友的话。笑累了，会议才进入选党小组长的正题。

尽管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许世友并不是在寻开心，而是在给每个工作人员打预防针，这是许世友教育人的方式，就在这不经意间的幽默笑谈之中，对不同的工作人员的职责提出了要求。我现在想来，也很佩服并且感激许世友，在不知不觉间上的一堂做事做人之课。也正是在这次党小组会上，我感受到了许世友的机敏睿智、幽默和蔼、不善客套以及干脆利落。

●“什么行不行，我看他就行。”许世友一锤定音，选定我担任他的秘书

许世友到广州军区上任前，军区机关有关部门即着手为他挑选秘书。挑选秘书的内幕，我开始并不知情。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正是许世友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才使我得以顺利地到他身边担任秘书工作。许世友初到广州军区，在选秘书上有几条指示：“一要年轻有文化，有点文字水平和机关工作经验；二要忠诚、老实、可靠；第三，如果前两条都具备，最好选山东人。”简简单单的几点要求，忙坏了军区有关部门，他们从全军区挑选符合条件的年轻军官，然后又层层筛选，反复比较，汇编整理好资料后去向许世友汇报。在入选的名单中，我自认为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可能是因为我最年轻，又是山东人，干部部门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因此也就第一个被汇报给许世友。汇报人对我的情况还没讲完，许世友就挥挥手打断汇报的人话：“行了行了，不要往下讲了，就是他了。”

“可是，他当兵才四年多呀，不知能不能行，后面还有一些人选，再给您汇报一下。”汇报人想继续讲下去。

“什么行不行，我看他就行，就这么定了。”许世友一锤定音。

如此简单，我来到了留园7号许世友身边。

如果我不是山东人、并且不是胶东人；如果当时的秘书人选

我不是排在第一位；如果许世友同意汇报人继续讲下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这可能就是缘分，一种历史的巧合吧，也唯有许世友能够创造出这种巧合。

许世友干脆利落的作风，在他选司机和对他的司机破格提干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和富有戏剧性。许世友选司机也有三条标准：一要技术好，二要胆子大，三要动作快。他认为技术好开车就安全，胆子大不怕走险路，动作快则开车麻利。许世友每次外出，秘书和警卫等随员，要提前上车等候，司机则提前发动引擎。他上车一落座，随着关门声响，车子同时就要窜出去。如果司机动作稍慢，就会招来他的批评甚至调离。

一次，老司机调走了，新调来的司机第一次给他开车，心里有些慌张。许世友把车门打开，左脚刚踏上踏板，右脚还在车外，新司机就松了离合器，车子“突、突、突”地向前冲了好几米。幸亏许世友反应迅速，他一手抓车，单脚着地，敏捷地跟着车跑，才没有发生意外。随行的工作人员心里紧张得“嘭、嘭”直跳，新司机吓得直打哆嗦，本能地刹住车，等着许世友的批评。

“为什么停下来？快开车。这样很好，开车就要动作快。”许世友不但没批评司机，还表扬他开车麻利，随行人员吊起来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知道了，专门派人找司机谈话提要求，要求司机放慢车速，把车开稳，确保首长安全。可是，许世友不管什么要求不要求，他只要求一个“快”字。一次外出，许世友上车落座后，司机按保卫部门的要求，轻踩油门，车子缓缓开动，许世友马上不高兴了，训斥道：“你的车轱辘比别人的小啊，慢慢腾腾

的像赶牛车，亏你还是个干部呢！”

坐在后座的秘书连忙解释说：“首长，他不是干部，他还是个战士呢。”

“我看他可以当干部”，许世友回头指示秘书，“通知干部部门研究一下，把他提起来当干部。”口气不容置疑。

没过几天，一纸命令下来，这个司机被提拔为排级干部。20世纪70年代，从士兵中选拔军官，不像现在这样必须经过军校培养。那时候军官进出量较大，随缺随补。士兵只要德才兼备，部队建设需要，一般就可以提拔起来。可是，像这个司机这样极富戏剧性的提拔，恐怕也只有干脆利落的许世友，才能演奏出这样的“妙曲”。

二

情感篇

● 看似暴烈的许世友，其实也有非常细致的情感表达，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前面提到，我本来是要准备回家结婚的，因到许世友处担任秘书工作而推迟。当时的通信落后，再加上一时疏忽，我没有把推迟回家的原因及时通知家里，结果家里苦心准备办喜事用的肉菜、糕点等很快就坏掉了，惹得父母亲满心的不高兴。但后来家人听说我是跟着许司令干革命，怒气也就消了，并且在乡亲间有了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父亲给我写信说："孩子，宁肯屈了自己，可千万别耽误了首长的大事。"

转眼间，我来到留园7号已经三个多月了。由于工作忙，回家结婚的事早丢到脑后了，没想到许世友却记在心里。一天，我陪着他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许世友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胖子（其实我并不胖，只是较其他工作人员稍微壮实一点），你他妈老跟着我转悠什么，还不赶紧回家娶你的媳妇。"我不禁一愣，心里一阵高兴，却又不敢确认。后来，马寿生又把许世友"让胖子回家结婚去"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给我，我才真的动身回家了，这已经是1974年4月的事情了。

我结束探亲返回部队时，背回了家乡的花生、苹果、小米等特产送给许世友，并带来家乡人民对他的思念和问候。许世友捧着这些土特产，爱不释手，并喃喃自语："唉，当年就是吃着这些



元旦看望基层战士

东西闹革命呀!”随后，他非常高兴地把这些东西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品尝。

一到逢年过节，并且什么节日吃什么饭，许世友都有讲究，而且安排得非常周到。尤其是中秋节、春节，他一定要和全体工作人员吃一顿团圆饭。中秋节，他还会吩咐厨房自己做月饼分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在楼顶天台赏月，号称“赏月不想家”。聚餐时，乒乓球台成了大餐桌，这时候，许世友会把自己上好的茅台酒和他打的各色野味拿出来招待工作人员，并轮流敬酒。他不敬完，别人是没有机会发言的，也不敢发言。他敬你酒，如果你不喝，他会说你怕死，如果你扭扭捏捏，他又会说你怕老婆，你要是一饮而尽，哪怕到最后醉得一塌糊涂，他就会向你伸大拇指，夸你有种，像个男子汉。像这等喝酒的豪爽，恐怕只有许世友才能

做得出。

1974年5月份，我的新婚妻子申奎英来部队探亲。开始，我没有报告许世友，自己住到了营房部门在营区外为我安排的临时住房，每天上下班早出晚归。许世友有个习惯，特别喜欢看到身边的人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如果少了哪一个，他很快就会察觉。一天早晨，许世友感觉有些不对劲，身边似乎少了些什么，便问："胖子到哪里去了?"

"他爱人来队了，住在营区外面。"警卫员回答。许世友知道后，亲自到厨房交代王师傅："今天中午多炒几个好菜，要咸一点，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中午，我接到通知，带着妻子来到留园7号。没料想，许世友亲自在楼下等候。许世友待人接物自有规矩，他热情豪放而又等



同海防战士在一起

级分明。凡1955年首次授衔，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领导人到广州，许世友会主动亲自登门拜访。对来访者，凡上将以上军衔的，他要亲自在楼下等候，陪客人上楼；凡中将以下的客人来访，由工作人员在门口迎候，他在楼上等候。这次他亲自安排请我妻子吃饭，还破格下楼迎候，足见他对来自他曾经战斗过的胶东的乡亲的一片深情。

“孩子，你从山东来到中国的南方广州，跑了大半个中国，不简单啊。家里老人好吗？庄稼长得好吗？坐了几天的车，累不累？”就像一个父亲见到了久别的孩子，许世友显示出从未有过的耐心和慈祥。这样边聊边走到了楼上的餐桌旁。我爱人因为紧张，开始有些拘束。“孩子，到这里就算到了家里，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吃了不少胶东的米，我们也算是半个胶东老乡呢。”许世友边对我爱人亲切问候，边麻利地安排好座位。

我爱人坐下后定了定神，终于带着浓浓的胶东口音，怯生生地说出第一句话：“打鬼子的时候，您在俺家住过，俺父亲还给您喂过马哩，他让俺给首长您带个好。”

“哦？你是哪个村的？”许世友顿时情绪高涨起来。

“郭城南申家。”

“哦，我知道，我是住过的。当年和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的部队在郭城打仗，指挥部就设在你们家的后院。”

许世友有些感慨，索性边吃饭边把发生在1941年春天的那场战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当年在胶东，部队打到哪里，都是住在老乡家里，打了不少胜仗，也认识了不少房东，真得好好感谢他们啊！”

许世友一边说一边向我爱人举起杯："闺女，我敬你父亲一杯酒，回去向他问好。"

整顿饭就在这种怀旧的气氛中结束。许世友回卧室取出一张自己的相片，用粗粗的红蓝铅笔，在背面签上"许世友"三个字，递给我爱人："孩子，送你这张照片，带回去给你父亲看看，就说我许世友想念胶东的父老乡亲，感谢他们啊！"

许世友送给我们的这张照片，我们一直珍藏至今。但当时我和我爱人并不明白，亲手签名的照片，这是许世友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一件礼物，是不轻易送人的。

● 许多人认为，许世友是个只关注打仗的铁面将军，我感到他还是个很会关心他人的长者。而他的关心，总是独具一格，别出心裁

1976 年春，由于许世友的关爱并亲自过问，我爱人提前随军到了广州。在人们心目中，许世友似乎是一个只关注打仗的铁面将军，其实他还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长者。而他的关心总是做得独具一格，别出心裁，在关心我爱人随军问题上就是这样。

许世友平时要求秘书不但要做到随叫随到，而且无特殊情况不能请假，包括请探亲假。这一特殊要求常使我感到为难。按照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夫妻两地分居的，干部每年可休探亲假一个月，家属可以到部队探亲一次，可当了许世友的秘书，这条

规定就行不通了。为落实我的休假，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何硕丰主任曾多次亲自向许世友建议，要指派一个熟悉情况的秘书临时替换我，可许世友始终不同意。

一天，许世友来到我的办公室，“胖子，我看你长了个榆木脑袋，”他瞄了我一眼说：“你不能休假，还不能让你爱人随军吗?”

“首长，我爱人还不够随军条件呢。”我嗫嚅道。

“工作需要也可以随军嘛！你跟办公室领导报告一下，就说我同意的，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不成!”

我心里一阵惊喜。说心里话，让家属随军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啊！在城乡差别极其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从农村入伍的青年，都想借机跳出龙（农）门，到部队后大都心怀“入党、提干、



1974年在海南天涯海角与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三为作者）

家属随军”三大奋斗目标。眼下，我虽然早已入党、提干，可家属随军的事我却连想也不敢想，因为总政治部对农村户口的军队干部家属的随军条件有硬性规定。按规定，干部军龄要满 15 年，或者年龄满 35 岁，或者职务为营职以上的干部，家属才能随军，而当时我却一个条件都不够。既然首长主动为我想到了，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第二天，我就把家属随军的申请交给了办公室领导。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按照审批程序，很快为我爱人办妥了随军手续。

日理万机的许世友有时也做身边人员的思想工作。他教育人，既无长篇大论，也无苦口婆心，那是典型的许世友风格

照实说，身经百战、从战火和硝烟中拼杀出来的许世友，做思想工作不是他的强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南京和广州两大军区司令员，统率着千军万马，关注着整个战区战备和建设的大事，无暇做思想工作。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从各个部队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全面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素质比较过硬，也用不着许世友为他们分心劳神。但许世友不这么看。他看着工作人员一年到头在他身边转悠，早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年龄稍大的，他当成子女辈，年龄小的，他当成孙子辈。他认为这些年轻人阅历浅，经验少，说话做事容易冲动，免不了会犯错误。他要

亲自给他们打“预防针”，使他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许世友做思想工作，讲究时间、地点。每逢身边人员回乡探亲，或外出执行任务，他就会把他们叫到跟前，亲自提要求，交代注意事项，用他特有的方式进行教育。许世友的思想教育简明扼要。通常，他把即将外出的人员叫到跟前，只讲两句话：“一是外出要遵纪守法，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搞歪门邪道；二是不要仗着我教了你们一点拳脚功夫就动手打人，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寥寥数语，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苦口婆心，但必须坚决执行。这种近乎下命令式的教育方法，具有典型的许世友的性格特色。

本来，思想教育的内容极其宽泛，可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期间，看到许世友从来只强调以上两条，极少言及其他。当时，我不解其中原因，后来随着对许世友了解的加深，逐渐认识到这跟他



接见部队先进分子

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密不可分，从而也就认识到许世友的思想教育虽然简单，但针对性极强。

从身份上讲，许世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要时时处处维护党的形象。许世友身居高位，但从不利用职权和自身的影响谋取私利。他对领导干部中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人深恶痛绝。他经常痛心地说："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就让这些人给败坏了。"他骂这些人是"害人虫"，是长在共产党身上的"恶性毒瘤"，早晚要被切除掉。许世友自身正气足，要求身边人员也要走得端、行得正，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搞歪门邪道。他经常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做得好坏，不是你们个人的事，群众会讲我许世友如何如何啊！"原来，他是在教育身边人员同他一道，以自身的良好行为去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严格自律，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工作。

许世友教育身边人员"不能打人，打死人要偿命"，乍一听，这似乎在重复一个很直白的老道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不打人骂人"，每个军人早在入伍后上第一课时，就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育。但了解了许世友的早年经历后，就会感到这是他对年轻的工作人员发自肺腑的忠告。青年时的许世友曾背着两桩命案投身行伍，在旧军队里再一次犯下命案后，经共产党人的引导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旧社会坏人当道，我许世友的拳头专打坏人，打得痛快，也打出了麻烦。"这时，许世友就会把他早年路见不平、打死几个坏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许世友打死的第一个人，是他家乡地主李静轩家的二少爷。李二少爷污蔑说许世友的大哥许仕德放的牛，吃了他家的庄稼，把许仕德打得鼻青眼肿。刚从少林寺回乡探母的许世友听说后上前劝阻。李二少爷不但不听劝，反而挥拳朝许世友打来。许世友起初并不还手，不想那二少爷连打十几拳仍不肯住手，许世友恼怒了，一拳朝二少爷的胸口打去。许世友打出的本不是致命拳，也没使太大劲，可那小子不经打，只一拳就打得他口吐鲜血，一命归天了。

许世友打死的第二个人是个劫匪。许世友打死了地主家的二少爷，家里是不能待了，他连夜逃走，躲过了李静轩和家丁们的追捕，到湖北的马家洼投奔了他的师兄赵保福。赵保福开了一家小酒店，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经常有地痞土匪来闹事抢劫。一天深夜，小店又遇到一伙劫匪的打劫，许世友手提哨棒冲上去和劫匪们厮打起来。他知道自己命案在身，本不想伤害他们，只想把他们打跑，保护师兄的酒店。那伙劫匪自恃人多，围住他往死里打，混战中一劫匪被许世友击中要害，当场毙命。为了不连累师兄，许世友再次出逃。

许世友第三次打死的是一个老兵痞子。许世友告别师兄后，逃进了深山老林，在饥寒交迫中为寻找生路，投身到军阀吴佩孚的队伍里当了兵。他班里有个横行霸道的老兵痞子，平时对新兵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新兵对他又恨又怕。一次，他借口许世友的内务没整理好，嘴里骂骂咧咧。许世友回了几句嘴，那老兵欺他是新兵，动手打了他几个耳光。许世友火了，抬腿就是一脚，不巧正踢在他要害处，那老兵当场就被踢死了。这次许世友跑不掉了，

他被五花大绑关了起来。杀人偿命，就在准备绑缚他上刑场时，他做生意的三舅用钱打通了关节，买下他一条命。

“老实常常在，冲动惹祸灾。”许世友讲述着他的故事，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年轻气盛，打死的虽是坏人，却也弄得我有家难回，有朋难投，若不是后来参加了革命，就可能在劫难逃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最后，他会画龙点睛，直击主题：“旧社会穷人有理无处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做主，可不能对战友和群众动拳头啊！”我们就是这样，在一次次地听他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三

生活篇

许世友的一日生活看上去很简单，但简单的生活能让他讲出一堆大道理

许世友是个闲不住的人，坚持锻炼让他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他有一套独到的“收支平衡”理论，并且按照这套理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按这套理论，“收”就是从外界吸收热量，“支”就是通过运动消耗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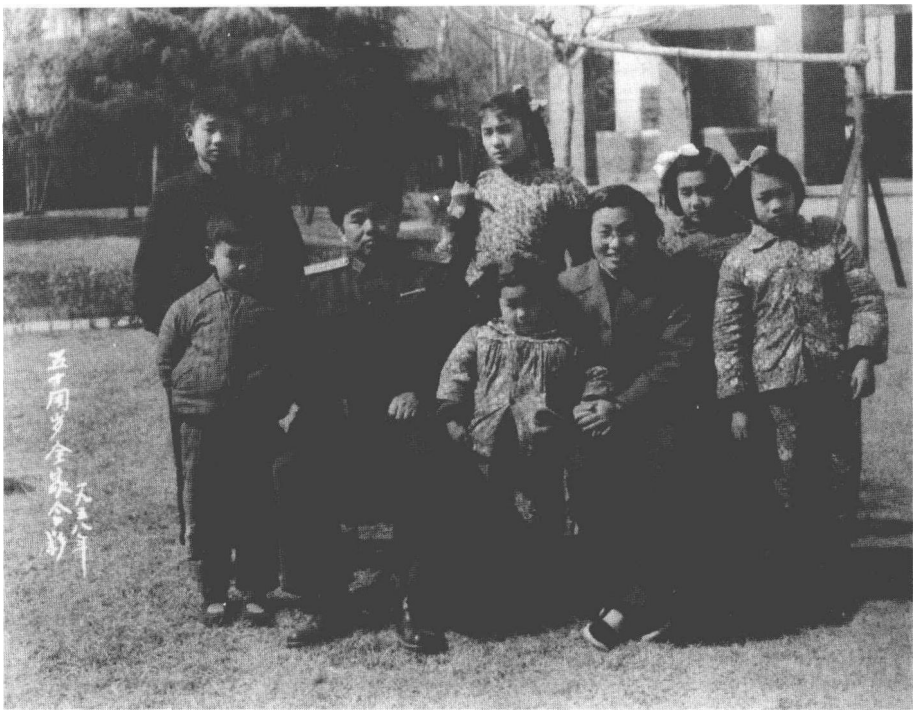
“收支相当，身体健康”；“收大于支会胀气，支大于收会亏虚”；“现在生活好了，营养足，主要防止收大于支，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运动量”。许世友经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推广他的理论。其实，为了保持他的所谓“收支平衡”，许世友除了开会、看文件，他的主要运动就是散步。而许世友的一天，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度过的：

许世友睡得早起得也早，每天起床后，先洗漱，后散步。洗漱用品全是工作人员从商店里买回来的。许世友从来不逛商店，他用的毛巾、牙膏、牙刷、肥皂等，都由工作人员购买，工作人员买什么，他用什么，从不过问，也不挑剔。他从来不用香皂、洗面奶之类的东西，偶尔女儿给他买回来，也会被他斥之为“资产阶级那一套”而弃之不用。坚硬的胡须是每天要刮的，他刮胡子倒是蛮认真的，洗漱的大部分时间，被用来去对付那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头发长了，他有时会利用早晨的时间给自己理发。尽管专

为军区首长设立的理发室，离他的住处很近，但他嫌里面的服务程序太烦琐，太耽误时间，不愿去。他对着镜子，用刮胡刀把帽檐以下的头发一刀一刀地剃干净。后脑勺镜子照不到的部分，他就用手摸索着刮，常常刮得长短不齐，高低不均，但他并不在意。洗漱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散步，在别墅四周的小路上溜达至少半个小时，然后回来吃早餐。

早餐过后，许世友如果不开会，就在家批阅文件。他不喜欢文字长的文件，讽刺这种文件“有斤两，没内容”，也不喜欢一次看太多文件。所以，我每天从保密室取回文件，总要先把急件、要件挑出来，把长文件中的重点内容摘录出来，再送给他看。许世友上午看文件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大概 10 点多钟，在工作人员陪同下继续散步。这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向他介绍外面新近发生的事情，这是许世友在会议和文件之外，了解外面社会的又一窗口。他一般是只听不插话，偶尔被他听出添油加醋的破绽，他就会嘲笑你是“路透社”的记者，只会道听途说。遇到高兴时，他也会讲一讲他的从军史。比如，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当敢死队长，四次挂彩；他当师长时还带领战士跟白军拼大刀；长征途中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他曾三过草地；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他在延安“红大”遭到关押，是毛泽东解救了他；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消灭胶东最大的汉奸赵保原，并割头示众；济南战役时，他采用“牛刀子”战术，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八昼夜，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抗美援朝时，他带领所属部队参加夏季大反攻，打得美国佬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等等。我就是在一次次的陪同散步中，了解了许世友曾经的辉煌及坎坷。

许世友散步的时候，心情会特别好，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和他交流的最佳时机。这时候，如果把一些平时不好张口的想法或请求提出来，一般会得到他的“恩准”。



五十周岁时全家合影

许世友没有午睡的习惯，如果下午没有重要公务，午饭后他就会乘车郊游或打猎。许世友吃饭的速度就像在打歼灭战，非常迅速。如果是外出，他放下饭碗就直奔汽车而去，随从人员的动作稍微缓慢，就吃不饱饭。工作人员要随时准备跟随他外出，也都养成了不睡午觉的习惯。许世友有时会在中午时间突然到工作人员房间“侦查”情况，若人员整装待命，他就不声不响地退出，

若发现有人午睡，他就会连讽带刺地挖苦一顿。我刚到留园7号时不了解这一情况，有一天中午，躺在床上不知不觉迷糊着了，恰巧被到房间“侦查”的许世友发现。“好你个孙胖子，妈巴子的，大白天睡觉想好事，想要接班人啊？可惜啊，你老婆不在这里。”这一顿数落，让我至今想来都有点哭笑不得。不过，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疏忽大意过。

晚饭后，许世友会散步一个小时，然后或看书，或下棋，或看看电影，10点钟以前便休息了。

● 许世友的饮食既简单又特别。他的餐桌上，一年到头有土味、野味，唯独没有洋味

专为许世友做饭的厨师老王，曾为许世友制定过一份日常食谱，时隔三十多年，我依稀记得如下：

早餐：馒头或包子或油条，外加一个煎鸡蛋，一碗稀饭，一小碟咸菜。

中餐：一小碗米饭，一碟野味（凉拌野猪肉，红烧野兔肉，红烧野鸡，红烧野鸭，油炸斑鸠等，任选一样），一碟荤菜（炸排骨，红烧猪蹄，炸鱼丸等，任选一样），一碟红烧豆腐，一碟青菜（炒辣椒丝，炒苦瓜，炒生菜等，任选一样），一碗肉丝榨菜汤或紫菜鸡蛋汤。

晚餐：一小碗米饭或一碗面条，一碟宫爆鸡丁，一碟雪里红

炒肉丝，一碟辣椒炒鸡蛋，一碟青菜，一碗西红柿蛋汤。

许世友的早餐既简单又特别，那是典型的中餐特色。什么面包、蛋糕、奶酪之类的西餐食品，他是绝对不沾边的，只需一个馒头，或一个包子，或一根油条，再加一个煎鸡蛋，一碗稀饭，一小碟咸菜，他就会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地瓜、芋头或玉米等农产品下来的时候，厨师做早餐时，会给许世友配一点，做什么他吃什么，从不挑剔。因此，厨师从不用为他的早餐多费心。

许世友早餐吃的咸菜，通常是自家土法腌制的泡菜。他每年都要腌上几大缸，除了自己和工作人员食用外，还送给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享用。许世友腌咸菜，用的是他家乡大别山群众祖祖辈辈沿用的方法。每年深秋天气凉爽的时候，许世友就和工作人员一起腌制咸菜。先把采下来的新鲜蔬菜摘除老叶，洗净、晾干，再晒上几个太阳，去掉部分水分，就可以入缸了。入缸的顺序是：先往缸里填一层青菜压紧，撒上姜、葱、蒜、辣椒和盐；接着腌第二层，直到把缸填满，再倒点白酒，盖上缸盖，用塑料纸包扎紧，最后用黏土把缸盖封严实。等到来年开春开缸取菜，味道又脆又香，或切丝生吃，或上锅热炒，都是一道美味。

许世友的中餐和晚餐也不复杂，他最反对大盘子大碗，大鱼大肉。他常说：“吃饱了就行了，吃多了就是浪费。”如果没有客人，摆到餐桌上的就是两荤两素，全是小碟。

两荤中必有一碟野味，是许世友打猎所获的猎物。“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一条鸡腿不如一条鸽子腿，一条鸽子腿不如一条斑鸠腿”，这两句常挂在许世友嘴边的口头禅，道出了他

对野味的钟爱。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许世友酷爱打猎，另一方面，对喜爱喝酒的人来说，能常有野味下酒，平添了许多酒趣。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如叶剑英、李先念、陈再道、王建安等到广州，许世友都曾设“野味宴”款待，他们品尝后，都赞不绝口。当时，广州军区和广东省的不少领导，也都以能享受到许世友的“野味宴”为幸事。

为保证野味不断，许世友把平时打来的野猪、黄猄、野兔、野鸡、野鸭、斑鸠等，或冻或晒，或腊或腌，储存起来用于招待客人和自用。他到广州上任时，把在南京打的猎物也带到了广州。但是好客的许世友，很快就把带来的野味招待完了，而广州又无猎可打，每当快要“断顿”的时候，他就会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南京打猎，运回广州。

两荤中的另一荤是鸡、鸭、鱼、蛋等，全是自家所产。两素中必有一样是辣椒，而且越辣越好；另一样是时令青菜，也都是自家所种。许世友最爱吃的蔬菜是苦瓜和生菜。苦瓜，广东人又叫凉瓜，瓜肉苦而甘。生菜脆嫩滑口，略带苦涩。两种菜都有清凉解毒之功效。许世友离休回南京定居时，把苦瓜和生菜的种子，带到他所居住的中山陵八号试种成功。有的资料介绍，许世友把苦瓜和生菜引种到南京，可能属于首创，因为南京郊区普遍引种苦瓜和生菜，比许世友要晚好几个年头。是否首创，没有考证。

许世友衣着也不讲究，一年到头身穿半新不旧的军装，一双草鞋在脚

许世友一年到头都穿军装，他从不穿便装，也没有便装。20世纪60年代他出国访问时做的一套便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造反派捅了几个窟窿，以后他再没做新的便装。不管是上班、开会、会见外宾，还是下部队，他都是一套军装在身。他喜欢穿旧军装，板板正正的新军装，他穿起来感到别扭。每当发了新军装，他就叫公务员先洗两水，揉搓软了才肯上身。军装一旦穿上身，他又不肯轻易换。时间长了，衣领上、袖口上、军帽沿上，就有了汗碱油渍，如果不是公务员再三催促，他绝不会主动换下来洗，可能是嫌麻烦吧。1985年军队服装改革后，许世友已经离休，部队没有给他换发新军装，他依旧是一套老式军装在身，直到去世。

跟随许世友多年，我从未见过他穿皮鞋，穿在他脚上的不是草鞋就是部队发的圆口黑布鞋。当年尼龙袜时兴时，他也从不穿，通常用一块裹脚布把脚包住，外面套上棉线长筒袜子，他说这样不伤脚。开会或下部队都是穿草鞋，即使会见外宾，他也是一双草鞋在脚。他教工作人员如何打草鞋，也把自己打好的草鞋分发给大家。我到他身边工作不久，他就亲手送了我两双崭新的用布条打制的草鞋，我只穿了一双，另一双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着。他



和苏联顾问在一起

身边的工作人员，除了女的，其他人都穿草鞋或布鞋。对此，许世友也有自己的理论："穿草鞋干爽透气，不出汗，不长脚气，还省鞋子。"

不过，许世友穿的草鞋已经不是用草编织的了，而是用废弃的降落伞撕成布条搓成细绳编织而成，鞋底再用胶水粘上橡胶皮，既耐穿，又防水。自己动手打布条草鞋，这是许世友的发明专利。在南京，曾一度领导时尚新潮，"红火"了很长时间。当时，不少人都以拥有这种"许记布条草鞋"为荣。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穿草鞋，大多数人感到新奇，报以赞叹，继而效仿。也有个别弄是非者，把许世

友比成冯玉祥，说冯玉祥也爱穿草鞋，冯玉祥的草鞋上还多了一个红樱。许世友听了嗤之以鼻："穿草鞋又不是冯玉祥的专利，过去农民穿，红军战士也穿，怎么我许世友穿草鞋就成了冯玉祥了！"许世友一直穿草鞋，他去世后，人们发现在他的房间里，还保存着几双这样的草鞋。

● 许世友嗜好郊游，尽管发生过一次意外的"手枪走火"事件，但没有影响到他的郊游情趣

许世友有个很大的嗜好就是郊游。他非常喜欢坐在硬座吉普车里上下颠簸的感觉。每当车子驶出城外，许世友就下令："下小路！"专门选择崎岖不平的荒郊小路行驶。车子剧烈的颠簸，许世友在车子里弹上弹下。他喜欢这种节奏，这是他戎马一生留下来的特殊嗜好。车子在乡间小路上跳跃，当路两面绿油油的田野迅速铺展开来时，他总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雀跃。如今我回忆起当年许世友郊游的情景，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也是一次很普通的郊游。车子在坎坷的乡间小路上跳跃，因为许世友的心情很好，大家谈笑风生。和许多领导干部不同，许世友坐车习惯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他觉得这个位置视野开阔，也不憋气。警卫干事坐在后排，摆弄着手枪。突然间，就听"呼"的一声响，一颗子弹紧贴着许世友的左耳，打到车前的挡风玻璃上。

“他妈的，怎么回事?”许世友回头望了望，狠狠地骂了一声。看得出他非常生气，但还是相当镇静。

“走、走火了。”警卫干事吓坏了，结结巴巴地说。

“掉头，回去!”许世友厉声命令。

回来后，许世友跳下车，一声不吭地上楼去了。

这次郊游我没有去，许世友回来后，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便悄悄向警卫干事打听，了解清楚后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来到车前，发现车前防弹挡风玻璃上，被走火子弹打出了一张蜘蛛网，在网的中心还夹着那颗小小的弹头。后来，我四处联系找防弹玻璃，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才在沈阳的一家兵工厂里找到了防弹玻璃，重新安装好。

好悬乎呀！如果子弹再向右偏五公分，后果不堪设想。望着有些发呆的警卫干事，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因为我不清楚这件事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在那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年代，政治高于一切，这件事说多大就有多大。后来，军区保卫部门介入调查，当有关领导征求许世友对警卫干事的处理意见时，许世友的态度异常明确：“他不是故意的，他跟随我多年，非常忠诚。我的意见，一不要处分，二不要调走，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就行了。”按照许世友的脾气和作风，他的话无疑就是命令，底下只有执行。也正是因为许世友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胸怀，警卫干事逃过一劫，并且在以后还有了很好的发展。

这只是许世友“郊游”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次意外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一两天后，他又兴致勃勃地享受那种颠簸之趣了，只不过，临时换了一辆车而已。

许世友还喜欢看电影、下象棋，但他的棋艺不算高，经常不按棋规走子，惹得对方常提“抗议”

许世友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看电影。刚到广州时，他常到专为军区首长放映的军区党委会议室去看。因为他一到场，其他首长就会站起来同他握手打招呼，他不想干扰别人，后来就在家里的会议室里，放映16毫米的小电影。那个年代，正是狠批“封、资、修”的“文革”时期，电影市场异常萧条。因怕惹上“崇洋媚外”的嫌疑，国外的片子基本进不来，国内的片子，大多被看做“封、资、修”的东西而被封存。当时允许放映的片子，大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统一发行的新闻纪录片。故事片主要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群众戏称“老三战”。戏剧片主要有《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等八个样板戏，群众戏称“老八戏”。许世友不满足只看这些片子，他要把“文革”中被封存的，他过去熟悉的片子找来放映。这样，找片子的艰巨任务就落在我的肩头。我找到军区电影发行站的领导，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工作，发行站破例为许世友开绿灯，允许秘书到影片封存仓库查阅“封存影片目录”。影片库里封存的片子可真多，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开发行放映的片子，在这里大都可以找到，把整个仓库堆放得满满的。我粗略地看了一遍，足有上千部。我草草地抄了一份封存目录拿回来，许世友一看如

获至宝："胖子，给我重抄一份。"

当时的文化生活非常枯燥，许世友就时不时按照那份目录，从发行站把老片子调过来放映，还邀请军区一些领导和机关干部一起来看。在那个"样板戏"和新闻简报充斥银幕的年代，我们这些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人员，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幸跟着他欣赏了许多"文革"中被禁映的片子。我们至今想来也觉得无比幸运。

许世友看电影也和打仗一样，时间把握得特准，他一旦进入放映室，屋内就会鸦雀无声，他一坐下，必须立即开映，否则，就会招来一顿训斥。许世友当时最喜欢看的电影，有《霓虹灯下的哨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乔老爷上轿》、《女驸马》和《刘三姐》等，翻来覆去百看不厌。尤其最得意刘三姐讽刺秀才的场面，不仅百看不厌，通常每看到此处，就会抑制不住地开心大笑，不无得意之情。行伍出身的许世友，看不惯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纸上谈兵的书生。

工作之余，许世友也喜欢下下象棋，但他棋艺不算高，又是个急性子，喜欢开局就杀，输赢都图个痛快。许世友下棋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取对方"将帅"，常出奇招，把对方"将"得无路可走。他下棋的对手是他的司机费存保。费存保当时兼任司令部车队的副队长，不仅驾车技术好，棋下的也不错，许世友并不是他的对手。但许世友也有他的"绝招"。比如，乘对方不注意，偷偷摸掉对方一个子儿，或者把自己的子儿悄悄移动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再比如，炮可以隔二子进行远程打击，要不就让车做曲线运动，拐弯抹角去吃掉对方的子儿。费存保实在无法"忍

受”这种不按常规下棋的怪招，常向他提出“抗议”。许世友往往振振有词地分辩：“喊什么！我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

当然，一般情况下，费存保还是会让他赢两盘的，尤其最后一盘通常都是以许世友的获胜而结束。这时候，他的心情会特别好，批阅文件时也会有更高的效率。

● 许世友一天能抽好几包烟，但是他说戒就戒，为此他和韩先楚打赌，结果许世友赢了

许世友不抽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抽烟嗜好的，也从不在许世友面前吞云吐雾。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想过过烟瘾，于是点上一支烟，一边抽，一边优哉游哉地翻阅文件。不想刚吸几口，外面走廊里就响起了许世友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糟糕，没想到第一次在办公室抽烟，就被许世友碰上了。慌乱之际，我随手将来不及按灭的那支烟，藏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刚把抽屉推上，许世友就进来了。也许是闻到了飘散在屋子里的烟草味，许世友一改往日见到人交代完事就抬脚离开的习惯，在办公室里踱起了四方步。这可把我急坏了，我面朝许世友，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放烟的抽屉。只一会儿工夫，袅袅白烟从抽屉里飘散了出来。

许世友发话了：“胖子，还不赶紧把烟拿出来，你想把办公桌烧掉啊？”

我简直是无地自容，匆忙把没燃完的那截烟拿出来按灭，等着挨批。然而，我等来的不是批评，许世友见到烟突然来了兴致，引出了他自己的一段关于戒烟的话题。

许世友说："抽烟也不是坏事，想抽就正大光明地抽，何必躲躲闪闪，像做贼一样。告诉你，我过去也抽烟，一天能抽好几包。"

没想到从不沾香烟的许世友过去有这么大的烟瘾，我面露疑色。

我这个细微的表情没有逃过许世友的眼睛。

"胖子，你不信吧？那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兵团指挥部设在地道里，天昏地暗，不见阳光，憋闷得慌，没有战斗时，大家就一天到晚不停地抽烟。我抽烟比别人厉害，一次同时点燃八支烟，嘴里含六支，一个鼻孔各插一支，一包烟分两次就抽完了。"一边说着，许世友还一边比划着做动作。

"告诉你我是怎么戒的烟，韩先楚他们和我打赌，我赢了。他们几个见我烟瘾太大，自认为许世友离开烟一天也不能过，就和我打赌说，只要你许司令戒了烟，我们就请你喝茅台酒。"喜酒闷烟么，在闷烟和美酒之间，许世友当然要选择美酒了。许世友说："戒就戒，不抽就完了嘛。"他以惊人的毅力，硬是把烟戒了，打那以后他再没抽一支烟。许世友自豪地说："这顿茅台酒赢得有意义。"

听了许世友抽烟和戒烟的故事，我对许世友有了更深的一层了解，那就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恒心和毅力。

"有的人喝了一辈子酒，丢了一辈子丑。抽了一辈子烟，烧了

一辈子手。孙胖子想烧桌子不想烧手。”许世友说着顺口溜走了出去。

许世友这几句顺口溜，弄得我一头雾水。后来我询问了老秘书马寿生，才知道这是许世友在南京时，给他的保健医生编的顺口溜。保健医生叫高复运，是1939年入伍的老同志。有一次他喝了点酒，抽烟时把衣服烧了个洞，被许世友看到了，就编了这几句顺口溜来取笑他，不想他今天又用来取笑我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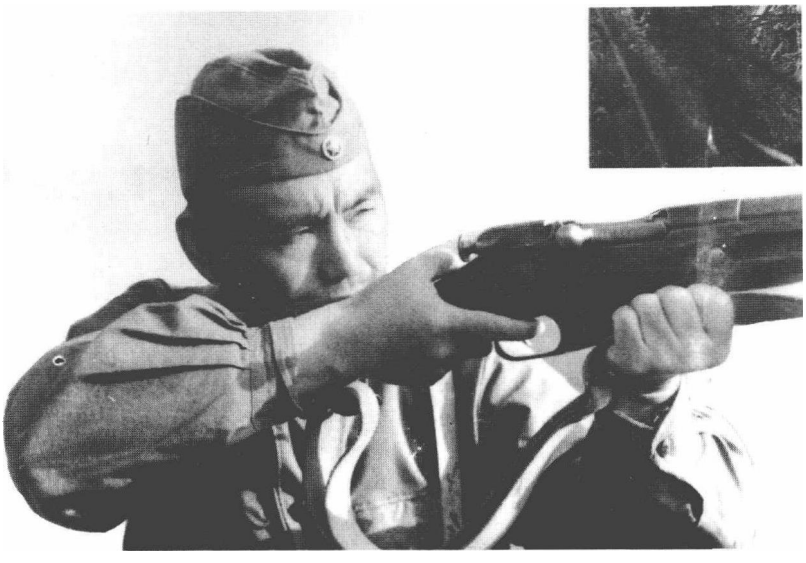
打猎篇

战争结束了，很难再闻到战火硝烟的味道，打猎也就成了许世友延续战争情结的一种寄托

许世友酷爱打猎是很有名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猎物美味的钟爱，更主要的还是当战争结束以后，一生为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他，对于枪声有着很强的迷恋情结。许世友外出打猎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军人作风，比如，进入“阵地”前，所有的“战前”准备工作都必须就绪，包括地形的选择、枪械的完善、诱饵的准备等等。稍有不备，便会招来一顿训斥。

许世友也曾尝试过钓鱼，但他脾气太急，只要几分钟不见鱼儿咬钩，就不耐烦了，扔下鱼竿就走，还抱怨：“钓鱼太被动了，还是打猎主动，可以满山找。”

有一阵子，许世友对用枪打鱼产生了兴趣。留园7号三面环水，水里放养着淡水鱼。由于水塘多年不干，其中也滋生了许多野生小鱼。中午时分，野生小鱼会成群地浮在水面晒太阳。出于好玩，我经常端起小口径步枪瞄准小鱼射击。目标虽小，距离较近，几乎百发百中。被击中的小鱼肚皮一翻，就漂在水面上不动了。跟我同去的管理员张传亮，用捞网把小鱼捞回去加菜，竟是一道美味。许世友见了很感兴趣，他从我手中取过小口径步枪，也瞄准小鱼射击。随着一声声枪响，成片的小鱼在水面上翻了白肚。许世友高兴极了：“胖子，打鱼比钓鱼过瘾！”



瞄准射击

许世友平常打猎，一般会选择去广州市北郊白云山和部队的嘉禾农场。这些地方因为离市区太近，很难打到理想的猎物，顶多打到一些麻雀，运气好时，能打获几只斑鸠。这经常惹得许世友不满，抱怨广州这么大却找不到打猎的地方。

到北京时，许世友有时会派身边工作人员夜间到南苑机场去打野兔。南苑机场是空军的专机机场，占地面积很大，场内草高过膝，周围戒备森严，里面是野兔繁衍生息的乐园。到了夜间，野兔出来觅食，被汽车大灯一照，只顾顺着车灯光柱直跑，一枪打一个准。南苑机场本来禁止打猎，但对许世友却大开绿灯，我们每次去都会满载而归。有一次许世友去北京开会，会议间隙他的瘾头又上来了，便带领我和警卫干事等人手一枪，驱车赶往密云水库。汽车爬上一个高坡，左前方出现一大片稀稀疏疏的杨树林。许世友喊停车，他判断像这样的林子里一定会有猎物，至少会有

斑鸠。许世友指挥随行人员间隔三十米，一字摆开，向树林深处搜索前进。果然，进入林子不远，就发现一群斑鸠在地上觅食。那群斑鸠刚好在我的正前方，我手起枪响，击中一只。随着斑鸠群的飞起，我又是一枪，又一只斑鸠扑腾了几下，哀叫着落地。其他人因没发现猎物，都无功而返。我拎着战利品走到许世友面前，面色有点得意，心想一定会得到许世友的夸奖。

许世友围着我转了半圈，把斑鸠瞥了两眼，煞有介事地说："胖子，枪法不错嘛！你看这两只斑鸠，一只感冒了，另一只看气色就知道是病得不轻，你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啦！"听了许世友的挖苦，我挂在脸上的几分得意顿时减了颜色。车子继续往前走，当发现新的猎物时，许世友只是站在车前观望并不举枪，他把枪交给我，嘴里嘟囔着："胖子枪法好，还是让胖子打吧。"

许世友打猎就是这个脾气，工作人员陪他打猎，必须在他眼前露两手，才能赢得他的信任，否则，他绝不肯把猎枪交给你打。以往打猎，当发现猎物时，许世友要么自己打，要么让警卫干事打，在他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军区保卫队队长李经林，跟他将近一年，也没摸过他的猎枪。1974 年底，我们跟随许世友到海南三亚视察工作。那天，警卫干事不在家，我和李经林陪许世友打猎到了三亚市的北山上。刚到山边，就发现前面树杈上蹲着一只毛鸡。可能是许世友有意要考验李经林，顺手把枪递给了他。李经林眼疾手快，"砰"的一枪，打了个正着。许世友看了李经林一眼，没有吭气，算是对他的枪法默认了。接下来，又两次发现猎物，许世友都让李经林开枪，连发连中。从此后，许世友改变了对李经林的看法，再外出打猎时，有时会主动把猎枪递给李经林。

第二次去密云水库打猎时，车子走了很远也没有发现猎物，许世友不高兴，脸色有些难看。返回的路上，我发现前面许世友乘坐的车子突然停了下来，但片刻又继续前进了。我乘坐的车子到了许世友停车的地点后，发现右前方50多米外的树枝上站着一只喜鹊，便一枪命中。返回驻地后，我兴冲冲拎着唯一的战利品去向许世友“请功”，谁知许世友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妈的，打猎的不打喜鹊，你懂不懂？喜鹊是报喜的!”许世友的一番训教，使我的兴奋荡然无存，打那时起，我懂得了打猎不打喜鹊的规矩。

跑了一只野猪虽有些遗憾，但许世友还是像指挥打了一场胜仗那样高兴

夏季的广州，骄阳似火，酷暑难耐。这时候，许世友一般会选择到市郊白云山脚下一处叫“老虎洞”的别墅居住。1975年8月的一天，住在“老虎洞”附近的一个农户报告说，他地里的玉米和地瓜被野猪拱得乱七八糟。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俨然就像指挥员接到了敌情通报。他亲自安排观察地形，然后又作出周密部署。然而，几个工作人员按照许世友的精密安排，夜间在野猪出没的山林里整整埋伏了一个星期，不但没见到野猪的影子，还被蚊虫咬起了满身的红疙瘩，大家滋生了“厌战”情绪，准备撤退。

“你们这帮兔崽子，这点儿苦就吃不了了？一点耐性都没有，要是在战争年代，你们准当逃兵。”被许世友一顿臭骂之后，大家又乖乖地继续前去埋伏。



老将军攀到了高处

“你们埋伏的这几个晚上月亮大，野猪不会出来的，月黑风疾的夜晚才会出来。”还是农户比较了解情况。经过这一点拨，大家总算明白了一些狩猎的道理。果然，到第九天凌晨 2 点左右，两只体型较大的野猪，领着五六只小野猪借着夜色走进埋伏圈，大家憋足了劲一起开火，结果一只强壮灵活的大猪冲回了深山，另一只倒地毙命，所有小野猪被大家赶到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全部生擒。

跑了一只野猪虽然有些遗憾，但许世友还是像指挥打了一场胜仗那样高兴，第二天不仅杀野猪犒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把野猪肉分送给军区的其他首长品尝。许世友又吩咐把活捉的小野猪，送到部队的嘉禾农场的猪圈里饲养。谁知这些失去双亲的小野猪未经驯化，性情暴烈，只顾撞墙，什么食物也不吃，后来一只一只地自己在墙上撞死了。

● “不许打猎，打鸟总可以吧！”当年许世友在白云山上随口讲的一句话，后来却成了他在“禁止打猎”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不许打猎，打鸟总可以吧！”这是当年许世友在白云山打猎时，随口和白云山森林警察讲的一句话。谁都不曾料到，一句平常话，多年后却成了许世友在军区“禁止打猎”文件上的重要批示。

那是1974年5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又随许世友上了白云山。当年的白云山，已经列为广州市的重要旅游景点。盘山路两侧，古树参天，浓荫蔽日。除了山东坡的几处悬崖峭壁能见到裸露的陡峭岩石外，满山遍野都被高大的乔木和茂密的灌木丛覆盖着。与保持完好的原始生态相比，旅游设施却比较简陋。除了摩星岭、能仁寺、天南第一峰等几处能吸引人的景点外，方便游人的生活服务设施寥寥无几。上山的路也不像现在这样宽敞平缓，铺了沥青的路段，因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没有铺沥青的路段，路面被雨水冲刷出道道沟坎。道路狭窄处，只能容一车通过。

我们分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上山。保卫队长李经林带三名警卫战士坐第一台车在前面开路，并负责发现猎物。我和警卫干事陪许世友乘坐第二台车跟进。我们约定好，前车发现猎物时，只

发信号不停车，后车跟上来，由许世友开枪射击。

汽车沿山路盘旋而上，一路上几乎没见到一个游人。那个年代的国人，没有休闲和旅游的概念，人们习惯于长年累月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忙碌，游山逛水往往被看成不可思议的奢侈。过了山半腰的能仁寺，右前方是一片稀稀疏疏的小树林，林中草地上，有一群斑鸠在觅食。许世友连连开枪射击，打中了两只斑鸠。

枪声惊动了在山上值勤的森林警察，他冲出来站到路中央，挡住了前车的上山之路。

先是严格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接着盘查为什么开枪。当他弄清楚是开枪打斑鸠时，便严肃地告知我们白云山禁止打猎的规定，并要求我们调转车头，按原路下山。应该说，这位警察看在我们是一群军人的分上，做这样的处理算是比较客气的。一直在跟警察交涉的李经林，出于对许世友的行动安全保密考虑，开始没有告知许世友坐在后面车上，只是讲在跟随一位首长执行任务，要求警察立即放行。可这位忠于职守的警察态度坚决，怎么说都不肯通融，坚持要我们调头下山。李经林见做不通工作，又不能在这里长时间耗下去，只好照实告知许世友司令员就坐在后面车上，要求他马上放行。

李经林不提许司令还好，一提许司令，这位警察立刻火起来。他以为李经林是在拿许司令吓唬他，态度越发强硬起来，大着嗓门吼道："别拿许司令来吓唬我！我也是部队转业的，白云山就是不让打猎，今天就是许司令真的来了，也不让打！"

双方互不相让的僵持着，这一切都被许世友看在眼里。他下

了车，不声不响地走到警察背后，轻轻拍了拍警察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小同志，你说不许打猎，我打鸟总可以吧？"

警察回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竟然真是许世友，他一下被惊呆了，额头渗出丝丝冷汗。他连忙给许世友敬了个礼，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您不但打鸟可以，您打什么都行，白云山上您随便打，随便打。"

许世友又轻轻地拍了拍警察的肩膀，算是对他这番回答的赞许，两台车又继续上山了。

跟随许世友外出打猎或郊游，常常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次在白云山上和森林警察发生的一幕，只是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事情过后，谁也没往心里去，很快就忘到脑后去了。

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出了人类和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要求，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野生动物，日益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走向立法，许世友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在军区机关拟定的禁止打猎杀生的文件上，所有首长都签署了同意的意见。文件最后送到了许世友的案头，让他最后签发部队执行。许世友看完文件，既不签同意，也不签不同意，他提笔在文件上批示："不许打猎，打鸟还是可以的。"

禁止打猎的文件下发后，许世友依旧外出打猎。对此，军区机关颇有微词。但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打猎者毕竟是许世友。

五

农桑篇

能够把一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的精巧别墅，改造成一个菜苗翠翠、鸡鸣狗吠的农家大院，这恐怕也只有许世友能够做到

20世纪70年代的许世友，可谓身居高位。但从他的好恶以及生活习惯中，人们还是不难发现根植于他骨子中的那份深厚的农民情结，以及勤俭质朴等传统美德。许世友自己常说："不能忘本啊！"但是他的"不忘本"总是太彻底，总能给人留下一些难以言表的感受。这一点，我感触尤为深刻。



不爱鲜花爱庄稼

许世友喜欢郊游，他常去的地方就是农村，他对农村情有独钟。车子在田间土路上行驶，看到两边长势良好的庄稼和果实累累的果树，他就会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些农业知

识，诸如“人勤地不懒”、“谁家没有三大堆（农家肥），种好庄稼尽是吹”之类的农谚也会随口而出。如果看到荒地和长势不好的庄稼，他也会感慨地讲一些“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骗地皮，地骗肚皮”之类的农谚。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部队的嘉禾农场，那里的猪圈、鱼塘、稻田，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的指点下，农场越办越好，每年都为部队提供大批的粮食、猪肉和鲜鱼。

许世友喜欢自己动手干农活。身为大军区司令员，他常常挽起袖子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荒种地。他说参加劳动一举三得，既能保持本色，又能锻炼身体，还能有所收获，是最快乐的享受。他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住中山陵8号，这里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的别墅，是一个很大的院落。许世友带领工作人员把其中的空地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和瓜果蔬菜；又在院子四周砌起猪圈鸡舍养猪喂鸡；还在鱼塘里放养了鱼苗。工作之余，他和工作人



在部队农场收割庄稼

员一起管理庄稼，种植蔬菜，喂养家禽，撒网捕鱼，尽情享受着田园生活的乐趣。

许世友在广州的住所留园7号，原来是接待中央首长的地方，三面环水，楼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微风乍起之时，一阵婆娑之声；楼前是一片规整划一的草地，那草地经过花工的精心打理，就像平铺的一张柔软的绿色毛毯，花工们还在草地上栽培了各色花卉，可谓姹紫嫣红；院落里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风采各异，这里的环境即便不是巧夺天工、人间仙境，也绝对优雅怡然。

许世友进入留园7号后，东瞅瞅、西瞧瞧，又背着手绕楼房转了几圈，然后把所有工作人员叫到一起："把楼后的竹林圈起来养鸡，水里面养鱼，楼前的草坪开出来种菜，楼顶上搭棚养鸽子，就这么定了，你们抓紧行动。"说完，他自己慢慢踱回楼上。工作人员怎么也不敢相信，要把这优雅的环境毁掉去种菜养鸡，起初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个个站在原地发呆。

军令如山，1974年2月的一天，当许世友下部队到海南岛去以后，我发动在家里留守的所有工作人员，并从军区警卫营借了一个警卫班，木耙、铁锹、镐头齐上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我们狠狠心拔去那些美丽的花草，往下挖土时就遇上了"硬骨头"，当初建楼时，废弃的大石头和烂水泥板全填在表土下面，非常难挖。带领警卫班帮助垦荒的排长车文全，是和我一起入伍的胶东海阳人，他身高力大，带领战士们硬是用镐头和钢钎，把石头和水泥板一块一块的撬出来，用板车拉走。一块不大的草地里，撬出来的石头和水泥板足足装了十几板车。我们只用一个星期时间，就把那块美丽的草地翻了个底朝天，又到嘉禾农

场拉来一车猪粪覆盖一层，再翻一遍地，原来的一片花红草绿很快就变成了三分良田。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又骑自行车，到郊区菜农那里找来小白菜、菜心、辣椒、茄子等菜苗及时种上去。院子里路两边的草地也开垦出来，准备种地瓜、玉米、高粱、黄豆等。

许世友海南之行持续了二十余天，回到留园7号时，那些栽种的菜心、小白菜在精心呵护下已经返青，青翠欲滴地泛着油光。许世友的心情好到了极点，本来就很阔的一张大嘴，更是笑得合不拢。他围着菜地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字："好！好！好！"

"种菜不施肥，等于瞎胡混。"冷不丁许世友冒出一句话来："施肥最好还是农家肥。"我们知道，许世友这是在催促我们要给菜地上肥了。于是在广州市最繁华的东山区的闹市街头，就出现了这样一景：我带着管理员、司机，三个军人推着一辆拉粪车，大街小巷里四处转悠，寻找公共厕所淘粪浇菜。老百姓见了好生奇怪：别的淘粪车装满粪后由市内往市外拉，而这几个军人，却把粪车拉进了百姓心目中非常神秘也非常神圣的军营别墅小区。这种场景每星期都会上演一次，吊足了百姓的胃口。

因为给菜地上肥，还引来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盛夏的广州，暑气浓烈，而留园7号的院子里却是地肥苗壮。菜地里刚浇上的大粪被太阳一晒，粪水蒸腾，臭味扑鼻。有一天，军区一位首长偕夫人来拜访许世友，菜地是他们进门的必经之地，路过菜地时，那位首长的定力还算不错，顶着臭气，强作镇静，脚步也算平稳。而首长夫人显然受不了这种刺激，掏出手帕捂着鼻孔，小步跑过菜地。恰好，这一幕被许世友看在眼里，他不高兴了：



在农场视察稻田

“你这个臭资产阶级分子，看你躲躲闪闪的熊样，你以为就你干净？你也是一肚子屎。”

尖刻之至，直羞得这位夫人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后，到许世友家去的客人，再也没有人敢做出轻率之举，大都憋足了气，边走边俯视着菜苗，一副怜惜的神情。

因为许世友“治菜”严格，他的菜地里一根杂草也找不到，因为养分充足，灌溉及时，很快就迎来了累累硕果。那些菜苗开始生长较为缓慢，但成熟季节一到，就像疯了一样猛长。许世友家人连同全体工作人员，自给自足已绰绰有余，剩下的菜就大筐大筐地送人，军区首长、警卫连都享受了我们的劳动果实。

“看看，摆弄蔬菜就是比摆弄花草实惠得多，什么狗屁高雅，高雅能当饭吃吗？”抚弄着满地的菜苗，许世友振振有词。

●“妈巴子的，竟敢钻到老子的地盘上分享劳动果实，消灭老鼠！”许世友又指挥了一场持久的灭鼠“战役”

秋天到了，地里的玉米结出了又粗又大的玉米棒子，大豆的秸秆上挂满了子粒饱满的豆荚，沉甸甸、红彤彤的高粱穗迎风点头。看着这一派丰收景象，许世友高兴地笑了。

路边的地瓜也渐渐成熟，地表已经被慢慢长大的地瓜撑出了条条裂缝。一天，在挖地瓜时，发现一个老鼠洞，老鼠在地下把一个地瓜啃去了一大半。许世友见了非常生气：“妈巴子的，竟敢钻到老子的地盘上来分享劳动果实，消灭老鼠。”于是，他又指挥了一场持久的灭鼠“战役”。但许世友没想到这个“敌人”远比他想象的要聪明。

先是使用耗子药，药死几只后，狡猾的老鼠就再也不去碰。

许世友又提出用笼子套。费了半天劲，准备了一大堆诱饵，可那些狡猾的老鼠在笼子周围转来转去，就是不往笼子里钻，这使许世友很伤脑筋。他在地瓜地边上踱来踱去，寻思灭鼠新方。

一天，他看着茂密的地瓜叶突发奇想：老鼠敢在大白天到地里啃地瓜，就是因为有茂密的地瓜叶做掩护。如果没有地瓜叶子，老鼠失去掩护，也就不敢来了。于是，他下令摘掉地瓜叶子。

“不行啊首长，叶子摘光了，地瓜也不长了。”我赶紧提醒道。许世友沉思半晌，又想出了一个“高招”：在地瓜地里埋几根竹

竿，竹竿间拉铁丝，铁丝上挂铃铛，风吹铃铛响，老鼠必然受惊吓而逃走。他把游击战中骚扰敌人的战法，创造性地用来对付老鼠。工作人员按照他的法子一试，果然有效。但好景不长，老鼠在习惯了风吹铃铛响的动听音乐之后，又大摇大摆地在地瓜丛中尽情啃噬。



自豪地抱着亲手种的地瓜

许世友于是大发雷霆："给我放狗出来！"许世友家里养了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平时束缚在狗圈里，这次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威风凛凛的狼狗在地瓜地里巡视之后，就再也不见了老鼠的踪迹，几番周折，灭鼠战役终获全胜。

● 许世友不仅种菜有招，而且养鸡有术，"生财"也有道，这些方面他很讲究，只是他的坐骑是完全用不着讲究的

许世友在南京时养鸡就很出名，据说他家里养了一群良种鸡，

下的蛋七个就有一斤。

来到广州后，许世友早就盯上了别墅后面的那片竹林，命人围好后，他就从南京把那一百多只良种鸡运来，圈在竹林里放养。因为这些鸡他都侍弄过，所以哪只快生蛋了、哪只身体不适，他指指点点的如数家珍。他还亲自示范，教工作人员把吃剩的骨头和鱼刺用锤子敲碎，拌在饲料里喂鸡，每天至少给鸡喂一次青菜。果不其然，他养的那些鸡个个精神焕发，生的蛋又多又大。我记得有一只蛋居然有三两，打开里面有三个蛋黄。这件事后来越传越神，慕名前来参观许世友养鸡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来联系买鸡蛋。

“我这里又不是养鸡场，参观什么！”许世友虽然拒绝参观者，但对军区机关干部和部队农场的人来参观，他还是持欢迎态度。对于来买鸡蛋的则区别对待，他告诉工作人员：“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买鸡蛋去吃，多少钱也不卖，如果是用来孵小鸡的，无偿奉送。”许世友喜欢养鸡，也支持机关



和江渭清在农村锄地

干部养鸡。

如此自力更生、种菜养鸡之后，一大家子人还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为国家节约了不少开支。在那个买什么物品都要凭票的困难时期，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留园7号的院内道路两旁，耸立着一排排葱茏繁茂的白玉兰树。这种适合在南方生长的乔木，高达十六七米，其花蕾好像毛笔的头，花开八瓣，白如皑雪。玉兰花含有芳樟醇、苯乙醇、甲基丁香酚等成分，收集起来可供做熏茶、酿酒或提炼香精。现在好多表现白玉兰香型的香水、润肤霜、雪花膏等，都常用白玉兰花为配料。每到白玉兰开花季节，留园7号院内清香扑鼻，满园生辉。许世友看到园丁每次都将飘落的花瓣收拾起来带走，觉得奇怪，就问其缘由。园丁不好意思地回答："卖掉，换几个零花钱。"许世友好像又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一般，急速号令工作人员集合，采摘玉兰花。他坐镇指挥，大家一起动手，有上树摘的，有在地上用钩子钩的，搞得白玉兰树光彩顿失，只有高处的树梢上，还有零零散散的几朵羞答答绽放，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想冒险爬上去摘。

"兔崽子，当年三百多丈高的树我也爬得上去，看你们这群熊样！"许世友边骂边露出一脸的不屑。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即使翻遍吉尼斯大全，恐怕也难以找到三百多丈高的树啊！

大家将采下的白玉兰花卖到收购站，一个花季就赚了五六百元，在20世纪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许世友安排给每个工作人员买了一件时髦的确良衣服，剩下的就用来改善伙食了。

养鸡种菜自然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其实许世友节省的地方何

止这些。比如，他睡的床就是木板床。那床板只有三尺来宽，在床的四条腿上，固定四根竹竿，用来挂蚊帐，这跟连队普通战士的床铺没什么两样，谁见了都难以相信这是堂堂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军区司令员的床铺。军区管理局几次要给他换张有弹性的棕床，他坚决不同意，还说："睡硬床可以把腰杆睡直，那些松松软软的，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不知不觉就能把人的筋骨睡垮了。"他家的大小凳子也全是硬的，客厅里那些宽敞舒适的沙发，是专门给客人坐的。多年来，许世友一直乘坐两台普通的北京吉普车，只不过前挡风玻璃改成了防弹的。许世友常说："卧车软绵绵的不够劲，人和车一起颠簸是最好的运动。"但是他那两辆旧吉普车在参加大型活动时，不仅有碍观瞻，而且还常常因为马力小而影响整个车队的速度。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商量后，报主管部门同意，乘许世友下部队时，为他弄了一辆当时在国内比较时髦舒适的苏产吉姆车，停放在离留园7号较远的一个车库里，准备在接送外宾时再动员他坐。可不等外宾来，这辆车就被他发现了。那天，我陪他去参加军区的一个会议路过这个车库，他问这车是哪个部门的，我只好照实说了。他一脸怒气，命令我立即把车送走，我刚想解释几句，就被他大声训斥："什么迎送外宾？屁话！要是你们几个老爷想坐好车就直说，别跟老子耍心眼。"

我和工作人员的一番好心，招来了许世友的一顿猛剋，我赶快通知管理局把那辆吉姆车开走，以后不敢再提换车的事了。之后，许世友依然坐那辆旧吉普，依然陶醉于那种上下颠簸之乐。

六

饮酒篇

● 许世友与酒，这是个不能不提的故事，因为酒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大都与喝酒有关

世人都说许世友好酒量，在我看来，许世友的确与酒有缘，他不但酒量大，而且酒风好。他喝酒喝的豪爽、喝的壮烈、喝的机智，堪称酒场豪杰。

“酒能增勇，能打仗的人一定能喝酒，敢喝酒。打仗首先要不怕死，不怕死的人还怕喝酒吗?”许世友这样解释喝酒的理论。喝到尽兴之时，许世友常情不自禁地向我们谈起他人生几次重大转折，大都与喝酒有关的故事。

许世友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26年8月。21岁的许世友以酒为媒，结识了共产党员傅孟贤，傅孟贤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那一年，许世友在旧军队湖北省防军一师一团任招兵委员。他认钱不认人，专抓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壮丁，以此捞取赎金。如果这些富家子弟逃跑被抓回，格杀勿论。尽管许世友所抓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们，但他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捞钱和显威风。他确实捞了大把的钱，但他没有独吞，全分给了手下的弟兄们。

正当他迷迷糊糊地干着这与土匪“绑票”没有多少区别的差事时，遇上了一位共产党员，引导他走上了正路，开始了新的人生追求。

这个共产党员名叫傅孟贤。一天上午，许世友在街上闲逛，

无意中认识了同乡傅孟贤。言谈中，许世友流露出弃戎经商的想法，引起了傅孟贤的注意。傅孟贤有心要引导他，便和他称兄道弟，以酒为媒，频繁往来。

一天晚上，傅孟贤请许世友喝酒。酒过数巡，傅孟贤有意将话题扯到共产党身上。

傅孟贤问："你们的蒋总司令为什么要杀共产党呢?"

许世友答："不知道。"

"如果上级要你杀共产党，你杀不杀?"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要我杀我就杀。"

"共产党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知道。"

"不知道就滥杀啊？如果共产党是好人，你杀不杀?"

"这个……"许世友一时答不上来。

傅孟贤因势利导，告诉许世友什么是共产党。苦大仇深又极富正义感的许世友，迅速接受了傅孟贤的革命宣传。他当即表示："真想干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专为穷人着想的共产党，这比我当这个兵强多了。"

后来，傅孟贤又请许世友喝酒。席间，傅孟贤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并介绍许世友参加了共青团。在傅孟贤的教育下，许世友离开了旧军队，回到家乡闹革命，担任了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炮队"队长。1927 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危急关头，许世友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 11 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在南京陪朱德视察工作

许世友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39年底。许世友用酒打开了朱德总司令的“后门”，同意派他到山东“打天下”。

1939年秋天，担任三八六旅副旅长的许世友，被调到中共华北局党校学习。一天上午，他和陈锡联等人结伴到党校附近的小饭店“打牙祭”，老远看到朱德带着警卫员也向这边走来。

许世友神秘一笑：“今天的酒钱有人出了，我们掏朱老总的腰包。”说罢，他飞身下山，从山坡下搬来一座大石狮子，严严实实地堵在小饭店门口。这石狮子又大又重，一人搬不动，两人抬不走，被堵在饭店内外的人哇哇乱叫。许世友却和陈锡联等人，早已悄悄地躲在一边观察动静。

朱德来到饭店门口，见一座石狮子把门，好生诧异，高声询

问："这是谁干的?"

"报告总司令，是我干的。"许世友从藏身处，几个腾跃跳到朱德面前，得意地说。

"还不赶快给我搬走!"朱德佯装嗔怒。

"朱总司令请客我就搬。"许世友乘机"敲竹杠"。

朱德忍不住笑道："你是存心要掏我的腰包啊！好吧，看在你指挥香城固战斗有功的分上，今天我就犒劳你。"

香城固战斗是许世友在1939年2月，和旅长陈赓一起指挥三八六旅对日军打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他们利用日军骄横跋扈、受挫必要报复的情绪，用小部队连续袭扰，惹恼日军，引诱其进入三八六旅在香城固的预设阵地。一举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擒八人，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

香城固战斗，本来是许世友的光荣和骄傲，但提起来却又引发他心中的不快。许世友因清算"张国焘路线"受牵连，他的一些老部下有的当了旅长、分区司令，而他却还是副旅长。尽管他尽心尽力指挥作战，并创造了香城固战斗的光辉战例，但一些人仍然对他存有偏见。许世友这样的血性硬汉，岂能受这份窝囊气!终于有一天，他与三八六旅政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动了拳脚。

今天遇到朱德，许世友借着酒劲，"哗啦"一声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在桌子上，对朱德说："我还有几个钱，今天都把它吃了，三八六旅我是不想回去了。我要求到山东去，你把我许世友放出去看看，看我能不能打仗。"

朱德很理解许世友的心情，把他的要求报告了毛泽东，获得

了批准。在党校学习结束后，许世友被任命为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千里迢迢到山东“打天下”去了。

许世友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次饮酒，当数1971年9月11日，为了掩护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驶离上海，他设计“宴请”林彪一伙在上海的党羽。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为了坐上国家主席的位置，唆使其党羽在会上发难，反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的阴谋被毛泽东及时识破，为清除林彪反党集团，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外地视察，同各地高级干部打招呼，做准备工作。8月31日，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召到南昌，给他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告诉许世友：林彪等人在庐山发难，这件事还没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后，我还要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毛泽东的谈话，使许世友进一步认清了同林彪一伙斗争的严重性，提高了警惕性。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许世友连忙乘军区值班飞机于11日上午，从南京赶到上海“保驾”。下午1时，他从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回到锦江饭店，立即张罗“宴请”林彪一伙在上海的党羽。林彪一伙阴谋在上海附近，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但不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他们猜想许世友一定会为毛泽东送行，只要许世友在，毛泽东就不会走。许世友出面请他们喝酒，他们自以为正中下怀。

“宴会”上，许世友施展英雄海量，频频举杯，与林彪党羽百般周旋，拖延时间。当林彪死党自以为得计之时，毛泽东的专列

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估计毛泽东的专列已经远行，许世友丢下林彪党羽拂袖而去，乘飞机赶回南京与毛泽东会面。

这次饮酒，许世友巧妙地掩护了毛泽东的安全，使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落空，避免了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这酒喝的大智大勇，喝得惊心动魄，彪炳史册！

● 许世友不但酒量大，而且酒风好。我目睹了他喝酒的豪爽和“认真”

1974 年春节，是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过的第一个春节，他高兴地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团圆饭，菜肴摆满了半个乒乓球台，工作人员围台而坐。许世友取出几瓶存放多年的老茅台酒招待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也是第一次见到茅台酒。三四十年前茅台酒的装潢，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外包装不像现在用纸箱子装酒，而是用结实的原木板打制的木箱子。和现在一样，每箱装 12 瓶。当时的内包装极其简陋，不像现在用制作精美的硬纸盒。那时，只用一层簿得几乎透明的浅白色的麻纸，把瓶身裹住。瓶盖比较讲究，选用质地优良的软木做瓶塞，为防止蒸发和泄露，塞紧后，又在塞子上齐瓶口处，用木工胶水封住。喝酒时，必须先仔细除去胶封，然后开塞。许世友拿出的这几瓶茅台酒又非同一般，酱色的瓷瓶，瓶身上布满了细细的裂纹。许世友说，这是他一直舍不得喝的陈年极品。

许世友命人开酒。工作人员用火小心翼翼地烤化胶封，木塞拔出，琼浆飘香迅速溢满整个屋子，许世友很惬意地深深闻了几口，然后开始喝酒。许世友喝酒是有规矩的，他不发话，别人是不能乱举杯的。他先端杯和大家喝一杯团圆酒，然后再从工作人员到家人一个一个碰杯，杯不离口，不一会儿十几杯酒已经下肚。毕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担心他喝多了顶不住，便上前劝他少喝几杯。许世友正喝得起劲，哪里理会："妈巴子的，少见多怪，我才喝这么一点就多了？我过去喝酒一喝就是一脸盆，长征到陕北时有人跟我打赌，我一顿吃下了七斤羊肉，喝下五斤白酒，还吃了三十二个羊肉包子，结果那人输了，乖乖地替我付酒钱。"一扬脖，又是一杯下肚，"告诉你，别看我老了，两斤白酒别想放倒我。"

我很知趣地坐回自己的位子，继续看着许世友痛快淋漓地豪饮。

其实，我不仅领略了许世友喝酒的豪爽，也领略了他喝酒的那股认真劲。那是许世友调任广州不久，他在家里设宴招待和他一起下部队看地形归来的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作战科长等一行。那是一桌别具特色的菜肴，红烧野兔、麻辣野鸡、宫爆斑鸠、油炸麻雀，还有一大盘凉拌野猪肉等，酥的、脆的、香的、辣的，清一色野味。桌子上并排摆着五瓶茅台酒。

大家落座之后，许世友示意警卫员倒酒。许世友喝酒，是绝对没有女招待的，一般都是工作人员负责斟酒。这时，许世友对座上客人环顾一圈，开始发话："这些野味是我在南京打的，酒是我的陈年老货，今天我请客，八人五瓶不算多，谁喝酒也不许耍

滑。”他用挑战似的目光把他请来的客人扫描一遍，伸手把一只大碗放在桌子中央：“谁耍滑，罚一大碗，大家先干三杯。”说罢，许世友来了个先干为敬，喝罢酒，杯倒垂，滴酒不落。

在座的领导各自酒量及饮酒习惯不同，大多第一次和许世友面对面喝酒，有的明显地显出紧张之情，都在面面相觑。副司令毕竟在抗战时期在胶东就是许世友的老部下了，也是酒场高手，他一句“许司令不减当年啊”，也一饮而尽，其他人跟着把第一杯喝光。第二杯，尽管大家左推右让，最后还是全部饮尽。正当大家喝完酒抿嘴的工夫，许世友的第三杯酒又已经下肚。

坐在许世友斜对面的是作战部的一位科长，此人军事素质过硬，深得许世友赏识，许世友每次下部队，总要把他带在身边。此刻，他看到今天这阵势有些咄咄逼人，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想留一手，就乘许世友仰脖喝第三杯的时候，迅速把喝到嘴里的第二杯酒又悄悄吐到小毛巾上。他刚把杯子放好，对面就传来许世友劈头盖脸的骂声：

“妈的，一开始就耍滑，还算不算个男人?”这位科长没想到许世友虽在一杯接一杯地喝，但他的眼睛却始终在巡视着满座的人员。

许世友让警卫员当场验证后，将早已放在桌子中央的大碗倒满酒。许世友把大碗往科长面前一推：“我就知道有人喝小杯不过瘾，恭喜你第一个用上大碗。”

科长为难地说：“我酒量小，实在喝不了这一大碗。”

“吐了敬酒喝罚酒，你这是自找的哟。”许世友毫不松口。

科长似乎早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药片：“我的老胃病又犯

了，医生嘱咐不让喝酒。”

许世友更不含糊：“酒是消炎良药，喝下这杯酒，胃病自然好。”

“首长，我晚上还要赶写报告，真的不能喝了。”科长还在极力争取宽大。

“一碗酒放不倒你，就算放倒了，我放你三天假。”许世友没有一点姑息的意思。

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位科长有些酒量，跟着一起起哄附和。万般无奈之下，科长憋着一口气，“咕咚咕咚”把一大碗酒喝光。掌声四起，掌声中科长光荣地瘫软到沙发上。喝到最后，菜光酒尽，看着有人扶墙而立，有人摇摇晃晃，有人话语模糊，许世友显得兴高采烈。

这就是许世友，喝不倒人誓不休。

● 许世友有时把喝酒作为看人忠厚不忠厚、老实不老实的标志，较起真来，难免伤和气

上面讲到作战科长喝了许世友罚的一大碗茅台酒，当场瘫软到沙发上，这只是许世友喝酒较真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许世友在酒桌上把邀请来的客人连劝带罚而喝倒的，何止作战科长一人。相比之下，许世友对职务比他低的客人算是客气的，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而对那些职务和酒量与他不相上下的老战友、老酒友

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老战友、老部下都喜欢与他喝酒，常常以“许司令又请我喝茅台了”为荣。但又打怵跟他喝酒，害怕他在酒桌上说罚酒就罚酒，常罚的人谈酒色变。

有一次，许世友邀请同是大别山出来的四位老将军到家里喝酒，按老规矩，把一只空碗放在酒桌中央。许世友端杯敬酒：“能喝不能喝，三杯以内倒不了人，三杯以内，滴酒罚一碗，三杯以外，各随其便。”言罢，一饮而尽。

“酒风代表作风，喝酒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忠厚老实。”许世友将手中空酒杯倒垂，杯里没落下一滴酒。

四位将军面面相觑，或咕咚直吞，或慢吸而尽，痛快不痛快地先后干了杯。其中有位酒量不大的将军，乘许世友不注意，把自己杯中酒倒给了他身旁的一位将军，自己装模作样地喝下了杯中酒。

“不忠厚不老实，不是条汉子！”许世友倾身抓起酒桌中央的大碗，哗哗倒满酒，推到那位将军面前：“第一杯就耍滑，你这是自找哟！”

“倒吧，杀头我也不喝。”老将军决心不喝这碗酒。

“留下人头干革命，留下这碗酒可不好做人。”

“不做人也不喝。”

“吭！”许世友往椅子背上一靠，闷闷地发出一声咳。这时，许世友身后那个人高马大的卫兵应声出来“劝”酒了。这卫兵其实是个监酒的角色，他一口一声“首长好”，连敬带灌让这位老将军喝下了那一大碗酒，直把老将军喝得烂醉如泥。

其实，许世友在酒桌上也不是动不动就罚酒，许世友喝酒自

有规矩。纵观许世友在酒桌上对客人的态度，他最看好酒量大、酒风正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喝得烂醉，他也会伸出大拇指，夸他“能喝，敢喝，是条汉子”，他对这种人从不罚酒。他最看不起喝酒扭扭捏捏、推三推四的人，他说“跟这样的人喝酒，看起来别扭，喝起来没劲”。历经“淘汰”，他的酒桌上很少有这样的客人。他最厌恶喝酒做假耍滑的人。酒桌中央放的那只大碗，专门用来“伺候”这样的人。一旦被他发现有人做假耍滑，必用大碗“伺候”无疑。

许世友的这种酒风格，与他战争年代的喝酒经历，以及他的性格和对喝酒的理念不无关系。

红军后期，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任军长，解放战争初期，在胶东军区华野九纵任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他常常摆酒庆功，把战绩显著的师长、团长们叫来“小聚”。喝的是农家酒，吃的是农家菜，酒具一般用碗。大家坐下来，每人面前倒一大碗，许世友二话不说，端起碗来先干为敬。照他的规矩，每人先喝完自己的酒，谁喝不干净不准吃菜。接下来，各人互敬，一碗一碗地“干碗”。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喝酒是愉悦的，也是庄重的，谁也不知道下次再聚时会“消逝”掉哪一位战友。大家相互“干碗”，谁也不会劝谁少喝，谁也不会扭捏推辞，更不会做假耍滑，每次必喝的尽欢而散。许世友把这种酒风格一直承传下来。和平时期条件好了，农家酒换成了名酒，大瓷碗换成了小酒杯，许世友认为更应该痛痛快快地喝，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做假耍滑把酒浪费掉，他会很痛心，以其特有的方式用大碗罚酒，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可否认，在喝酒的理念上，许世友确有一些让人难以接受

的东西。例如，他要求客人酒量大小的一致性，有的客人就难以做到。许世友酒量大，他喝多少，要求客人也要喝多少，否则就是“不给面子”，这就有点强人所难。许世友喝酒不管大杯小杯，都是一口一杯，要求别人也要一口一杯，若分几口喝，就“不是条汉子”，这使许多人就难以接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有时把喝酒作为看人忠厚不忠厚、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较起真来，难免伤感情，失和气。

然而，许世友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喝酒本是快活事，怎么能喝伤感情呢？因而，他始终如一地贯彻他的酒风格。为让客人喝足喝好，他独创了一套“劝酒令”。“劝酒令”通常只有三句话，虽简短，却有效。时隔三十多年，许世友巧用劝酒令，把客人一个个喝得晕晕乎乎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酒宴开始了，许世友先端起酒杯，像战争年代那样，不管客人喝不喝，自己先一口喝干，叫做“先干为敬”。

接着，他眼睛直直地盯着客人：“干！”

如果客人解释说：“不会喝。”

“你怕老婆！”这是他的第一句劝酒令。

如果客人解释说：“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

“你怕死！”这是他的第二句劝酒令。

“怕老婆”本不光荣，“怕死”更不光彩，直劝得你躲无门，退无路，不喝也得喝。一旦你喝下第一杯酒，他第三句劝酒令紧跟而来：“你明明会喝却不喝，弄虚作假，罚酒三杯。”

连喝带罚，连罚带喝，就是有些酒量的人，不醉也喝的晕晕乎乎。为了不伤感情，有的甚至喝得影响了身体，耽误了工作，一

听说许世友请喝酒，唯恐避之不及。

● 周恩来“以酒制酒”，劝说许世友不要强迫客人喝酒，不要对客人罚酒

许世友以罚酒强迫客人喝酒的事，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有几个老将军恳请周恩来出面劝劝许世友。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矛盾的周恩来深知，对烈性如火、义气深重的许世友来说，一般的劝一劝无济于事，批评重了又可能适得其反，要让他心服口服，还得用酒来说话。于是，周恩来上演了一出“以酒制酒”，劝说许



与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南京军区原司令员聂凤智合影

世友不要强迫客人喝酒和罚酒的故事。一位著名作家在他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对这一故事有详细记叙。

一次，乘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周恩来热情邀请他喝酒。酒桌上，摆着四菜一汤，两瓶茅台，周恩来和许世友分宾主相对而坐。

周恩来边倒酒边和许世友聊天："听说南京有四大喝，都是谁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还有我。"许世友如实回答。

"那你们四人中到底谁的酒量大呀？"

"算我大吧。"许世友自豪地说。

周恩来淡淡一笑："许司令是老实人，可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酒量不行还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巴的，我去找他！"许世友就怕人激，怕人说他不行，一激就急："我喝酒不是吹牛，还从来没遇到过对手。"

"这样吧，"周恩来说得平静："今天就咱俩喝，你若喝得过我，就不是吹牛。"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难："可我怎么能跟总理比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酒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讲酒量大小，许司令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就给您磕三个响头。"许世友真的被激起来了："我要是喝过您，只请总理讲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许世友顺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这瓶我包了，总理您

随意。”

周恩来取过另一瓶，两人一瓶对一瓶。

许世友站起身，端起杯，双手举过头顶：“总理，我敬您，立地三杯。”他连干三杯，每杯都倾倾空杯，滴酒不落，以显示其诚心和豪气。

周恩来平稳安静，一边慢斟慢饮，细品酒香，一边和许世友聊天，好像早就忘了比酒的事。

许世友却没忘比酒的事，此事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脾气急，喝不得慢酒，干两杯，歇口气，再干两杯。他总是在周恩来看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的动作干净利落的干杯。他不是为了喝酒，他要让周恩来看看：这就是我许世友。

“总理，您看！我这瓶已经喝完了。”许世友站起来，手里的空酒瓶倒垂，没落下一滴酒来。这时，许世友虽然喝得眼睛红了，却故作轻松地望着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向杯里倒去，那酒瓶居然也垂直，流出的酒竟然只有小半杯。

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小时才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慢斟细品也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千真万确的是原装原瓶当场看着拆封开盖的啊！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就是点到为止，今天的酒就喝到这儿，好不好？”周恩来面不改色，话语柔和。

“不行，不行，总理请客不让喝好可不行。”大概是酒涌上来了，许世友大声吩咐服务员：“拿酒去！”

服务员看看周恩来，周恩来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还是一人一瓶。这次许世友自己开瓶，闻一闻，狐疑尽消："两瓶都一样，随便拿。"说着，拿起一瓶，朝酒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顿，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口气，再干两杯。不同的是，周恩来越喝酒兴越浓，谈笑风生。而许世友越喝间歇的工夫越长，干杯的动作也不像先前利落。

第二瓶酒喝了两个多小时，当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时，不再大声呼叫讨酒喝，只是摇晃着身子看着周恩来，而周恩来那瓶早已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周恩来柔和地吩咐。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他的眼皮也耷拉下来，又尽力翻上去。

这次是周恩来开瓶，他柔声地问："许司令，你要哪瓶?"

没有回答。许世友粗壮地身体仰靠着椅子往下溜，他想坐起来，但力不从心，一下子滑落到桌子底下。

周恩来又斟满一杯酒，起立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留着脑袋干革命，留下这杯酒可不好做人；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都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完，干了杯中酒。

周恩来这些话，全是许世友平时劝酒用的语言，被周恩来一一搬出来还给他。许世友听了心里自然明白，但喝成这样子，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要给周恩来磕头，被周恩来一把扶住。

"总理，我许世友服了。今后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那好，今后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个大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们高兴了一起喝杯酒本是好事，可你这样搞，就容易伤和气。”

“是，是，我听总理的。”

从此，许世友喝酒不再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劝酒也适可而止。而遇到喜庆事，喝到高兴时，他偶尔也会对作假的客人，善意地用大碗罚酒，以此作乐，作战科长便是一例。

周恩来请许世友喝酒的故事，许世友从不轻易讲起。许世友生性好强，在武场和酒场上，他从未遇到过对手，这“走麦城”的事他不可能主动讲。但有一次聊天时，他曾提到过周恩来的酒量。他说：“中央领导中酒量最大的，要数周总理，不是一般人可比。他一般情况下不喝，真喝起来，我也喝不过他。”

● 许世友把饮酒之道运用得精妙之至。他以酒会友，结交了众多英雄豪杰。晚年他又别出心裁地喝酒选将，给后人留下一段美谈

许世友一天也离不开酒，他六七十岁时，一顿喝一斤茅台酒比较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以酒下饭，没有酒他就吃不下饭。他常常自己把握酒瓶，自斟自饮，一顿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一人一瓶，喝完为止。但过了70岁以后，他喝酒受到了限制，不能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为了保

证他的健康，保健医生曹国徽通常控制他喝酒，监督他每顿只能喝四小杯，喝够四杯就把酒瓶子拿走。这让刚刚喝到兴头上的许世友大伤脑筋。每当保健医生把酒瓶收走，许世友就会抱怨："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知道这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有酒伤心啊。"有几回，许世友试图用好言好语感化医生放宽规定，允许他多喝几杯，但并不奏效。忠于职守的保健医生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许世友终于发火了："你敢拿我的酒瓶子，你滚，你现在就滚！"保健医生一点也不含糊："滚也不准你多喝，组织上交代的任务我必须完成，我要对首长健康负责！"软硬兼施不奏效，这一下，许世友也没辙。

不过，许世友有时会使点小智术，用些小伎俩，使医生防不胜防。比如，在喝第二杯或者第三杯的时候，他会寻找各种借口支走医生，等医生返回时，许世友早就痛痛快快地过足了瘾，还装出一副没解馋的痛苦样子。至于医生是否洞悉了其中的小玄妙，天知道。

自古人们把饮酒豪爽且酒量过人的人，赞誉为酒圣、酒仙。这美称用在许世友身上恰如其分。许世友不但酒量大，而且把饮酒之道运用得精妙之至。他以酒会友，结交了众多英雄豪杰；打仗时他用酒送部队出征，用酒为部队庆功，指挥部队打了无数胜仗。到晚年，他又别出心裁地用喝酒选将，给后人留下一段美谈。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战，许世友受命担任东线作战的总指挥。临战前，他想选刘昌毅中将当他的副手。刘昌毅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1973 年 11 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原以为又可以与许世友共事，心

里非常高兴。没想到他到南京不到一个月，许世友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去了广州。1975 年，刘昌毅又由副司令员改为顾问，实际上处于“半退”状态。许世友想，刘昌毅是我向军委要求调到南京军区的，于是，他又向中央军委点名要人，让刘昌毅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协助他指挥作战。

刘昌毅虽然到了广州，但多年不打仗了，他的体力和精力还行不行？许世友心里没底，他要当面“考察”，考察的方式是请刘昌毅喝酒。这场“考察酒”喝得惊心动魄，壮怀激烈，两人一口气喝光了三瓶茅台还让上酒。

许世友话中有话：“还能喝吗？”

刘昌毅毫不含糊：“许司令能喝我就能陪！”

“考察”结束了，刘昌毅醉了两天。许世友心里有底了：“还是一条好汉，能喝，敢喝，不怕死，身体也可以，副帅当之无愧！”

● 王建安笑着说：“喝就喝，跟许司令喝酒，图的就是个痛快！”

许世友戎马生涯几十年，他在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与许多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友结下了深厚情谊，那是一种同甘共苦的患难之交，那是一种披肝沥胆的生死之交。他们之间结下的那份情意，就像一泓潺潺流动的清水，纯洁、清澈而透明。

许世友的老战友来广州，都要抽空亲临拜望他，尤其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华东野战军的老战友，如李先念、王建安、陈再道、宋时轮和李德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都曾多次到许世友家中做客。每逢老战友到来，许世友总是喜出望外，设家宴盛情款待。

一天下午，在广州疗养的王建安来到许世友的家中。一见面，两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停地摇动，许世友还觉得不过瘾，一巴掌拍在王建安的肩头上，粗门大嗓地说："几年不见你还像个儿童团啊！"两人哈哈一笑，进了客厅。

我按惯例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正欲离开，许世友说："胖子，你别走，陪我们两个喝酒。"

几碟简单的菜肴端上桌来，自然都是许世友和工作人员种的农家菜和猎来的野味。许世友把两瓶茅台酒往桌子上一放，冲着王建安说："今天咱俩一人一瓶，把它统统干掉，喝个痛快！"

王建安笑着说："喝就喝，跟许司令喝酒，图的就是个痛快！"

许世友和王建安是多年的拍档。红军时期，两人同属红四方面军，一起指挥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许世友时任第四军军长，王建安任政委；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一起指挥了济南战役；抗美援朝战场上，许世友和王建安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的司令员。多年来，两人常有来往。

但鲜为人知的是，许世友和王建安也曾翻过脸，骂过娘。后来，是许世友亲自导演了一出"瓶酒释前嫌"的"将相和"，二人才重归于好。

那是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在清算“张国焘路线”时，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受牵连，许世友和王建安等因咽不下这口气，密谋私自出走。在他们的出走计划将要演化成事实的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向组织作了“举报”，使许世友等人身陷囹圄。为此，许世友同王建安闹翻了脸，从此二人再也没有来往。

济南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任命许世友为攻城部队总指挥，并调王建安为副总指挥。当许世友听说毛泽东对他们二人能否同心协力指挥作战存有疑虑时，为让毛泽东放心，他以大局为重，主动请王建安喝酒，摒弃前嫌。据有关资料介绍，许世友在桌上摆了两瓶高粱酒，他打开一瓶，举瓶对王建安说：“老伙计，自从延安分手，咱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我先干了，过去的事谁也不许再提！”说罢，一仰脖把一瓶酒喝了个瓶底朝天。王建安被许世友的真诚和豪气所感动，也一口气把瓶中酒喝得一滴不剩。事后有人赞曰：“许世友‘瓶酒释前嫌’。”

此刻，酒桌上的两位老将军，又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充满着激情和斗志。两人杯来杯去，几乎杯不落桌。酒，激发了两位老将军心中永不言败的激情；酒，让他们重温战争岁月的往事。他们一下子就像年轻了几十岁，遥想当年，追忆起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许多往事。说到激动处，两位老将军几乎同时举杯：“来，再喝下这杯。”几个回合之后，饭桌上酒空菜稀，两个人面颊上都泛起了红晕。

秋夜的天空气爽云稀，繁星点点。那天晚上，两位将军喝的都有了几分醉意。我陪许世友送走王建安，许世友意犹未尽，他颇有几分感慨地对我说：“当年，在延安抗大组织清算张国焘的问

题时，有些人非要把张国焘的问题和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连四方面军的官兵。当时有些人想不通，就想离开延安，到外面去干出个样子看看。当时要不是王建安同志及时反映情况，可能有许多同志要犯大错误啊！”

接到陈毅派人送来的茅台酒，许世友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喝，要喝就和宋时轮一起喝。”

许世友和宋时轮两位老将军是战友，也是酒友。二人同属华东野战军，解放战争时，并肩作战解放济南，抗美援朝时，两人再次并肩作战反侵略。

宋时轮酒量大，有百杯不倒、千杯不醉之称。宋时轮自称“酒将军”。老将中酒量与许世友不相上下的，恐怕宋时轮是一个。

早在济南战役时，两位将军之间就发生过一段有关两瓶茅台酒的故事：

1948 年，中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北方战场。华东野战军趁势发起济南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毛泽东说：济南战役“关系甚大”，是一次重要作战。中央军委要求用 20 天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济南战役的任务。担任攻城部队总指挥的许世友说：“只需 12 天，就可以解决。”实际上，济南战役只用了 8 天 8 夜，解放军就打进了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宣告胜利。

济南战役打响后，我军连连告捷，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深感快慰，特意让人给许世友送来两瓶茅台酒。寓意是早日打下济南，喝庆功酒。

许世友接到陈毅送来的茅台酒，高兴地说："还是陈老总了解我。"他却舍不得喝，想到了担任西线攻城指挥的十纵司令员宋时轮，他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喝，要喝，就和宋时轮一起喝。"继而，他拨通了宋时轮的电话：

"老伙计，你给我狠狠地打，陈老总送来了两瓶茅台，酒我留着，等拿下济南，我请你喝。"

"有酒你早就喝光了，还会有我的份？"

"妈巴子的，信不过我？等打下济南我让酒跟你说话。"

宋时轮怎么也没有想到，嗜酒如命的许世友，竟然真把两瓶酒留下来了。

战役胜利结束了，红彤彤的太阳跃出了山岭，阳光透过缕缕云霞，照耀着大地。许世友虽说几天几夜没合眼，此时，却毫无倦意。他突然想起床头的两瓶茅台酒，立即通知宋时轮，来住处一聚。两人见面，许世友拿出了保存完好的两瓶茅台酒，得意地说："我说留着一起喝，你还不信，我可是强压着酒瘾，才没舍得喝掉它。"

按着老规矩，两人一人一瓶，不劝不让，一会就瓶底朝天了。

几十年过去了，战友加酒友，两人之间的友谊越加深厚。可能是缘于两人相同的做人的豪爽、喝酒的豪气，加之两人共有的活跃、好动的性格，他们只要凑在一起，就打打闹闹，俏皮话说个没完，变着法子寻开心，就像一对"老顽童"。

1975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的领导都住在京西宾馆。许世友和宋时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两人的级别都比较高，被安排在同一层楼两头的两个最大的套房。我和警卫干事、保健医生，作为随同人员住在许世友的隔壁。

许世友和宋时轮遇到一起，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礼貌的握手、寒暄和问候。见了面，两人就没有了“正经”。许世友时常得手抓住宋时轮的胳膊，一下子就拧到了背后，宋时轮每每都痛的喊叫不停。

这天晚饭后，许世友回到卧室，对我说：“胖子，给我拿张白纸和红蓝铅笔过来。”

我纳闷，不便问，又不敢怠慢，随手将纸和笔递了过去。

许世友在桌子上铺开纸，先是重重的画了一个大圆圈，一边画还止不住嘿嘿地笑出声来。我站在旁边看着，一脸的迷惑，不知道许世友想做什么。但见他又是几笔勾勾画画，竟然在纸上画了一个形象夸张的小乌龟。画完之后，许世友问：“画得像不像?”

我笑着说：“像。”

“像就好，再去找点糨糊来。”

接着，许世友在纸的背面涂了些糨糊，把纸对折了一下，轻轻放进了衣袋。

我看着这一切，头脑中一头雾水。

走廊里响起了宋时轮的脚步声。

许世友立马走出房间，紧走几步，拍着宋时轮的后背说：“散步去啊。”顺势把那张画有小乌龟的纸贴上了宋时轮的后背。

宋时轮在走廊里大摇大摆地走，那张画有小乌龟的纸在他背上忽闪忽闪地跳跃，许世友悄然放慢脚步溜在后面。宾馆的工作人员看到宋时轮背上贴有一张画着小乌龟的纸后，十分惊奇，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想不到这么大的领导还有人敢跟他开这样的玩笑。可没有人敢当面告诉他，实在忍不住，就捂着嘴偷偷笑。参加会议的老将们见了这幕情景，也窃笑。宋时轮不解地问：

“你们笑什么?”

大家还是忍不住地笑，并用手指点着他的后背。宋时轮意识到了什么，反手往背后一摸，就扯下了那张画有小乌龟的白纸。不用猜，他就知道是谁干的了，冲着许世友说：“又是你干得好事。”

许世友禁不住一仰头，狂笑起来，那神情，活脱脱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精心设计的恶作剧终于得逞后，才有的那般开怀与得意。

望着许世友那副孩童般的神情，宋时轮也笑了：“你可是越来越像个儿童团了。”

● 许世友连连举杯劝酒，还发动工作人员轮流敬酒，我第一次喝醉了，是被许世友“灌”醉的

许世友喝酒虽有“喝不倒人誓不休”的气概，但一般不“整”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当 1976 年 8 月我要调离他时，却被他“灌”了个酩酊大醉。

那一天，许世友在“老虎洞”的住处设宴为我送行。他请来

了军区机关有关领导、他身边的全体工作人员，还有我爱人。许世友请人喝酒有时喜欢搞热闹，喝到一定的时候，他会锁定一个对象，连续发动几个高潮，直到把这个人喝醉，他才开心。因为他平时从不“灌”工作人员，因而我就没有思想准备。

酒宴上，大家互相敬酒，彼此讲一些临别祝愿的话，气氛热烈而平和。酒过数巡，许世友突然把目标指向了我，他笑嘻嘻地与我连喝三大杯，又鼓动其他工作人员：“孙胖子要离开我到新的单位工作了，你们要多敬他几杯。”许世友的话就是动员令，工作人员站起来排着队向我敬酒。我意识到不妙，但为时已晚。和首长碰杯岂能不喝？战友们敬酒怎能谢绝？我只好硬着头皮，一杯一杯地把酒吞下。本来，跟随许世友多年，我的酒量锻炼得还算不错，但也抵挡不住这连番的“攻击”。我第一次醉酒了，是被许世友“灌”醉的。其实，那一天不只是酒量的原因，还有战友间的情谊，对首长的牵挂等，使你无法不醉。

许世友喝酒历来是公私分明，自己喝的酒，自己掏钱买，自己保管。工作招待用酒，由管理员保管。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茅台酒每瓶不到十元，但还是花去了他不少的工资，也幸亏许世友没有其他的额外嗜好和消费。

酒伴随了许世友一生。许世友一生究竟喝了多少酒，没有人能准确估量。陪许世友散步聊天时，他曾跟我说，他是在旧军队里喝酒上瘾的，一生只有喝多过，没有喝醉过。年轻时，他喝两斤白酒不影响指挥打仗。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许世友例外。别人有意见，说许世友能喝我们也可以喝。张国焘说：“你要是敢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以许世友过人的酒量，如果一天以一

斤计，他一生喝的酒至少有两万斤，足能装三卡车。许世友也不像人们所说的一生只喝茅台酒。红军时期多数是喝打土豪缴获的酒，后来南征北战，打到哪里就喝当地酿造的酒。他多次跟我说，他喝过山东的张裕金奖白兰地和安徽古井贡酒，并赞美这两种酒都是好酒。抗美援朝时，他带到朝鲜喝的酒，就是张裕金奖白兰地。专喝茅台酒那是他晚年的事了。

许世友一生与酒有缘。酒，为许世友壮了胆气，长了豪气，增添了人生传奇。然而，过量饮酒也损伤了他的身体。许世友晚年，为了他的健康，许多中央领导都劝他少喝酒，保健医生也严格控制他的酒量。但喝到兴头上的许世友哪里能劝得住？许世友常说“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可他唯独不讲酒喝多了伤身。依照许世友的体格，如果饮酒适量，远不止活 80 岁，是长期过量饮酒伤及身体，减短了他的寿命。

七

武功篇

许世友抡起哨棒，捅、打、劈、扫，连破四门，堂堂正正地打出了少林寺，成为少林寺少有的人杰而名扬天下

世人皆说许世友武功盖世，称其为真正的少林豪杰。提起许世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少林武功，联想到许世友自小出家到少林寺学习武艺，不少人还能随口讲出几段许世友在少林寺练功习武的故事。

许世友到少林寺习武这段经历，许多文本都有记叙，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许世友8岁时，在他的家乡遇到云游到此的少林寺武僧。从小就立志学武，长大后要为被土匪打死的爷爷和被恶人逼死的父亲报仇的许世友，迷上了武僧高超的少林武功，在武僧面前长跪不起，苦苦哀求武僧收他为徒，跟随武僧跋山涉水上了少林寺。进少林寺后，许世友想到日后要回家孝敬老母，便不肯受戒为僧，就在少林寺作了一名杂役，专干那些打扫卫生、砍柴挑水、烧火做饭、给师父倒尿壶的杂活。由于许世友不肯受戒，师父一直在生他的气，也不教他习武。他只好一边干杂役，一边偷偷地看师父们练武，潜心学艺。由于许世友悟性高，又能吃苦，常常半夜三更爬起来练功。三年下来，他的武功竟比那些专门跟师父练功的武僧还要高。他的举动感动了师父，终于正式接纳他为关门弟子，一心一意地向他传授少林真功。许世友得到师父的真传，没有辜负师父的苦心栽培。在少林寺习武八年，不仅把刀、枪、

剑、戟、棍等十八般武艺练得精通，还练就了过硬的铁砂掌、飞檐走壁、贴壁功、铁筷功等，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林高手。

对许世友的这段经历，还有另一种说法。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钱钧也曾在少林寺学习武功，是许世友的师兄弟。他说，他当时是杂役，习武的时间不多。而许司令在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习武的机会比他多，武功也比他好。离开少林寺时，许司令是打出山门的，而他是从后山的小道上溜走，参加了红军。据传少林寺也对外宣称，许世友当年确实在这里剃度为僧，甚至还查出了他出家时的法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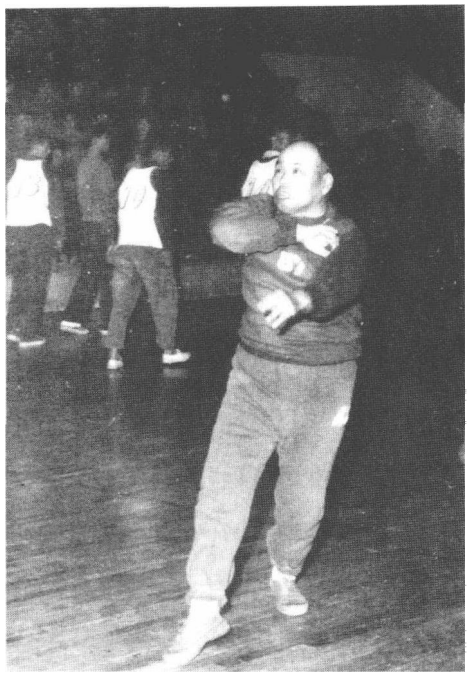
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我们且看最具权威性的文献和许世友本人是怎样说的。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并公开发表的《许世友同志生平》是这样说的："许世友同志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泗水店许家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生平中没有讲许世友在少林寺出家当和尚。

许世友本人也否认他当过和尚。一次，看完电影《少林寺》，许世友兴致很高，主动和我们讲了他在少林寺的一些故事。工作人员围坐在他身边，询问他少林寺和尚在练功时，是不是真像电影里演的那么苦。许世友说："吃不得苦，学不到艺。我八岁到少林寺当杂役，直到16岁离开，虽然没有出过家，但也吃了不少苦。当时，主要是想学一身好功夫，长大后能当除暴安良的英雄。当然，也是因为家里穷，到少林寺能吃上一顿饱饭。现在日子好了，你们年轻人没吃过那份苦。"

“少林寺也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那得有人保荐，还得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的科目就是‘贴壁’。”许世友兴致勃勃的给我们讲起了考“贴壁”的故事。

“‘贴壁’就是在墙上钉几根很短的木桩，参加考试的人要侧着身子，紧贴墙壁，全身绷直，在木桩上睡几个晚上不掉下来。如果打瞌睡或身子发软掉下来就不合格。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我当时年少体轻，咬咬牙就过关了。”



投球也带着“少林架势”

“少林寺武僧的功夫真的有那么神奇吗?”那天，见许世友高兴，我们就毫不掩饰的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

“那还有假！‘功夫’、‘功夫’，那全是靠下工夫练出来的。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在少林寺练了六年，我在少林寺练了八年，比武松还多两年。”说到得意处，许世友又把他在少林寺如何刻苦练武；后来如何思母心切，迫不得已遵从寺规，打出寺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许世友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他更娴熟的还是少林刀、少林拳和少林棍，而最拿手的功夫当是少林棍。相传当年十三棍

僧救唐王后，少林棍就成了少林寺第一位的传家功夫，要求每个武僧都必须精通，甚至连少林寺的方丈继承人，也多从佛法造诣高深、善使少林棍的高僧中选拔。许世友是众武僧中公认的少林棍王，他不仅多次在少林寺举行的比武大会上夺魁，而且在离开少林寺时，也是凭一条少林棍，捅、打、劈、扫，连破四门，冲破了方丈精心安排的围、打、堵、截，堂堂正正地打出了少林寺，成为少林寺少有的人杰而名扬天下。

那一年，许世友16岁，已在少林寺学艺8年，正当他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的时候，家里捎来老母病重的口信。许世友如雷轰顶，心急如焚，找方丈请假回家探母。方丈一心要留住他，便以“既入佛门，应守佛规”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倔强的许世友则以“八年前未曾受戒”为由，执意回乡探母。方丈见拗不过他，只好按寺规办事。

少林寺有一条寺规是：凡出师的弟子如投他处，或者有回乡之要求，必须从大门打进，以此经二门、三门，最后从后门打出，须闯过重重险关。方丈见许世友去心已定，一声令下，把全寺院一百多名武僧，分派到一、二、三门和后门，分头把守。一门有十个武僧把守，二门有二十个武僧把守，三门有四十个武僧把守，后门有八十个武僧把守。真是步步设防，门门把关，要想打出寺门，难上加难。在少林寺的历史上，就没听说有几个人能打得出去。

许世友也不含糊，他想到打出去就能与日夜思念的慈母团圆，顿感浑身是胆。他抖擞精神，凭借勇气、智慧和一身硬功夫，喊一声“俺来也!”抡起少林棍，前劈后捅，左挡右拨，一路向前打

去。霎时间，“乒乒！乓乓”的棍棒碰击声，像炒黄豆似的爆响不绝。他的棍棒所及之处，如风卷残云，似霜打败柳，把昔日的师兄师弟们一个个打的东倒西歪。

许世友一口气打到后门，早已守卫在此的80个武僧手持棍棒，凶神恶煞般地把他团团围住。此时的许世友已是大汗淋漓，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势，他知道要想打出后门，只能智取，不可硬拼。他定神一思，计上心来，虚晃几棍，便使出轻功本领，纵身一跃，跳上一个和尚的头顶，紧接着又“噌、噌、噌”连续踩着众和尚的头顶，越过了众人的严密防守，一鼓作气打出了后门。

这段少林寺学艺的经历，许世友讲得精彩，我们听得入迷。以往大家只是从传说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不完整的故事，那次听了许世友亲口讲述，真是大饱了耳福。

许世友虽没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央领导表演过少林武功，但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曾为毛泽东表演过少林拳

世上广泛流传着许世友到北京开会时，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领导表演少林功的故事。传说开会前，与会领导齐声要求许世友为大家表演一段少林功。许世友推辞不过，就表演了一个“贴壁功”。他请与会领导先离开会议室，关门闭灯，两分钟后再回会议室找他。两分钟过后，大家返回会议室，只见桌椅板凳摆放依旧，却不见了许世友的踪影。门窗都关得好好的，许世友不可能从门



为战士表演少林拳

窗出去，难道他会土遁从地下钻走了？正当大家莫名其妙的时候，许世友哈哈一笑说：“我在这里呢!”大家循声往会议桌下一瞅，原来许世友四肢分开如“大”字，身体紧紧地吸附在会议桌的下面，与会领导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没有人去验证。到许世友身边工作后，终于有了验证的机会。一次，陪许世友散步，乘他高兴，我就把这个传说讲给他听。许世友听后淡淡一笑说：“少林功我过去时有表演，到北京开会却不曾表演过。你说的‘贴壁功’，我在少林寺练

了三年，当年能像壁虎一样趴在墙上掉不下来。红军时期攻打大山寨，我被敌人从两丈多高的城墙上打下来，昏迷了两天两夜，伤了真气，‘贴壁功’就做不起来了。”

尽管许世友没有像世人传说的那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央领导表演过少林功，但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曾给毛泽东表演过少林拳。那是1952年，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在济南游完大明湖后赴曲阜，许世友作为山东军区司令员随行。在专列上，许世友应邀表演了一套少林拳，毛泽东很感兴趣，跟在后面一招一式地模仿，学的非常认真。多少年以后，毛泽东对此事仍记忆犹新，他到浙江视察，对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我喜欢运动，在山东还跟许世友学过少林拳。”

许世友注重练功习武，尤其推崇武功在战斗中的作用。他常说，练功习武，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提高杀敌的技能。红军时期我军缺少武器弹药，为节省子弹，常常在阵地上跟敌人拼大刀。许世友背大刀，从战士背到军长。他当师长时，除了常规武器外，还给



凳子也可以当武器

全师官兵每人配备一把大刀，他亲自担任教练，把少林刀功中最直截了当的杀敌套路传授给官兵。战斗打响后，他常常手舞大刀，亲率官兵杀入敌阵。许世友回顾说，阵地上，大刀、长矛闪着银光，短兵相接处，枪缨、红刀布、鲜血，红花花地连成一片，红军战士手持这些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冷兵器，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大显神威。

“打得时间最长、最残酷、最激烈的，要数万源保卫战中的大面山阻击战。”许世友回顾说：“1934 年 11 月，四川大军阀刘湘调集一百四十多个团向红四方面军的万源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我当时是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带领部队在大面山方向抗击敌人主力的进攻。战斗打到最激烈时，我撸起袖子，带领敢死队就冲上去，敢死队每人一把大刀，寒光闪闪地杀向敌人。一个敌军官见状狂奔而逃，我紧追上去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因为大刀锋利加上用力过猛，那具没头的尸体居然还向前冲了几步才倒了下去。”

许世友打下了少数民族寨主摆设的擂台，令寨主敬佩不已，置酒盛情送红军过山

红军时期，许世友带领部队借助武功打胜仗的故事，给世人留下许多美谈。更值得称道的是，红军长征时许世友凭着一身高超的武功，打破了少数民族寨主摆下的擂台，令寨主敬佩不已，

置酒盛情送红军过山，为红军摆脱军阀刘湘的追袭立了奇功。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的，新华社发表的《许世友同志生平》中，是这样评价许世友长征时的贡献：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是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后，许世友率领的骑兵师，作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到了四川的党岭山下。党岭山海拔五千四百多米，山上有个少数民族村子叫云雾寨。此寨凭险而居，是红军北上通往甘南的必经咽喉之地。寨主武功高强，智勇双全，手下有一百多名能骑善射的勇士。由于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寨主误以为红军要来抢夺他的地盘，派人给红军捎信说：“我摆擂台一见高低，红军若破了我的擂台，我以礼相待送红军过山。若破不了，一个也别想过去。”

许世友将情况报告了总指挥徐向前，徐向前指示：“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通过打擂比武让少数民族了解红军，支持红军。”许世友连夜挑选了以侦察科长和作战科长为骨干的十二个功底较好的人，组成一个“红军破擂敢死队”，他自己亲自担任队长。第二天上午，许世友带领破擂队上了云雾寨。寨主早已搭好了擂台，擂台上，一位长者宣布打擂开始的话音刚落，一个铁塔似的汉子一个“鹞子翻身”，从后台跃到台前。此人年约五十，虎背熊腰，豹眼狮鼻，正是云雾寨寨主。寨主命人抬上一块石条，他以手作刀，“嗨！嗨！嗨！”连吼三声，将石条砍成四截。台下观众齐声



向工作人员传授少林棍术

喝彩，寨主在喝彩声中跳起了民族舞，显示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

这可把红军打擂队员激火了，一个年轻队员跃上擂台与寨主对打起来。可没打上十个回合，就被寨主打下擂台。侦察科长和作战科长先后上台打擂，开始二十多个回合还不分胜负，但终究不是寨主的对手，最后都败下阵来。寨主越发得意起来，在台上傲慢地说，红军玩枪玩炮还可以，要动真功夫，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还吹嘘说，他一拳就能打倒红军一个营。

打到傍晚时分，通信员送来总部急电：刘湘大军正日夜兼程追袭红军，如果明天过不了党岭山，我们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许世友心急如焚：必须迅速拿下擂台，确保红军明天通过党岭山。

此时，许世友这位战场上的英雄，武场上的豪杰，“呼”的一声跳上擂台，他向寨主和观众施礼后，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开始了！两人各自施展出平生的武艺，一个如猛虎下山，一个似蛟龙出海，他俩一口气斗了七七四十九个回合，不分胜负。许世友越打越勇，他不断变换拳路，使出了少林真传“十八罗汉拳”。他拳起脚落，有板有眼，一拳快似一拳，拳拳凌厉之极，打得寨主眼花缭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忽然，许世友收招敛势，寨主以为有机可乘，飞步上前，抡起左拳向他打来。许世友将身子一偏，左手抓住寨主的右腿，一个“顺手牵羊”，顺势把他举过头顶，在台子上旋了十多转。寨主大惊失色，如果许世友把他抛下擂台，他不但在自己的寨民面前丢人现眼，今后可能连寨主也做不成了。然而许世友没有往下抛，而是轻轻地把他放在擂台上，抱拳向他致歉。这一招使寨主又惭愧又感激，他佩服许世友的武功，更敬重许世友的武德。他当众感谢许世友的宽宏大量，并当场声明：“今天我输了，晚上我请客，宴请红军破擂英雄，宴请少林豪杰许将军。”

寨主的晚宴隆重而热闹。好胜的寨主擂台比武输给了许世友，他自恃酒量大，提出要与许世友比酒挽回面子。他让许世友用小碗，自己却换成了海碗，这海碗起码能盛一斤酒。殊不知喝酒正是许世友的强项，他也换成了海碗。寨主一口气喝了一海碗，许世友一口气喝了三海碗，镇得寨主双眼圆睁，嘴巴大张，连声惊呼：“许将军真是英雄海量，佩服！佩服！敝寨主甘拜下风。”

第二天天刚亮，寨主就打开寨门，亲自护送红军过了党岭山。

“没有武功的人抓人，只能扯破衣服。我抓人能连衣服带肉抓下一大块来。”许世友高兴时，常炫耀他的武功了得

许世友晚年不常练武，但他简陋的卧室却布置的武气耀眼。他的卧室里常年摆挂着三件兵器：一件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大刀，是那种东洋指挥刀，是他抗战时缴获的战利品。此刀用优质的合金钢打制而成，长一米有二，重十七八斤，臂力小的人双手才能举得起来。第二件是床头立着的一条磨的油光锃亮、五尺来长的少林棍。许世友因当年曾用少林棍打出少林寺山门而对其情有独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作紧急情况下防身之用。第三件是放在他枕头底下的一把手枪，一年到头子弹上膛。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房间里的这种布置仍记忆犹新。

有段时间，香港地区的武打片在内地流行起来，片子从香港引进内地路过广州时，先在一定范围里放映，称之为“过路片”。许世友对这类武打片很感兴趣，但看后又常常表示不满。他批评那些演员的打斗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批评导演“只会摆花架子，不懂真功夫”。一次，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厨师大佬，以手中的一条布面袋子作武器，舞动得呼呼生风，把一群操枪使棒的武林好汉打得丢盔卸甲。许世友看了就评论说：“对付面袋子何须用刀枪剑戟，如果是我，用一把竹扫帚就能把他的面袋子搅缠下来。”

“胖子，没有武功的人抓人，只能扯破衣服，我要是抓住一个人，能连衣服带肉抓下一大块来。”许世友高兴时，常炫耀他的武功了得。

“我在少林寺练了三年铁砂掌。第一年，五个指头伸直，能穿透一桶黄豆，第二年能穿透一桶小米，第三年能穿透一桶沙子。铁砂掌练成了，抓人一把肉，叉人五个洞。”

其实，许世友在少林寺还练过铁筷功，伸筷能夹住弹弓射来的钢珠。有的资料介绍，许世友初入少林寺时，师父为训练他的灵巧，烧火做饭时，命他用铁筷子夹住松果送进灶里，练熟后，又命他用铁筷去夹飞舞的苍蝇。许世友连夹几次没夹住，气得他拂袖将苍蝇打死。师父见了哈哈大笑说：“徒儿，你不理解师父的用意，你小小年纪，身单力薄，应该先练灵巧，再练桩功拳手，这是老僧特意为你安排的。”听了师父的话，许世友豁然开朗，开始了不寻常的夹蝇训练。苦练三年，他的铁筷功终于练成了。对空中飞来的目标，他眼力快、出筷快、透力大，不但能准确夹住眼前飞舞的苍蝇，还能稳稳夹住弹弓射来的钢珠弹。

尽管传说中许世友的武功神乎其神，但我跟随他三年，看到他练武的次数并不多。有一天中午，许世友突然兴起，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到二楼平台集合。他要求每人手握一根一把来粗、五尺来长的竹棍，列队两边站好。他自己运一口气，手持那根少林棍舞动起来。只见他随步出棍，棍飞步舞，棍飞刚劲有力，步舞敏捷轻盈，一招一式及其规范扎实。他越舞越快，或抡，或打，或挑，或捅，或劈，或扫，或挡，或架，棍头点点，如巨蟒吐信，棍身横扫，似苍龙摆尾。一根棍子在他手中舞动的呼呼有声，缓时有力

拔千钧之势，疾时则有水泼不进之态。那阵势，你根本感觉不到舞棍者竟然是一位古稀老人。

“好！好！”大家看得眼花缭乱，情不自禁击掌叫好。

“这算什么？就值得你们大呼小叫的。”许世友停棍收势，气定神闲，“年轻的时候，碗口粗的树我一口气能捋断好几棵，十二个铜子摞起来，我一刀下去能劈成二十四片，一丈多高的房子，我一跃而上片瓦不碎。”得意之时，许世友的话匣子也就很夸张地随意打开了。

“听说首长能刀枪不入，能不能表演一下？”一个胆子大的警卫战士兴奋地发问。

“刀枪不入？那是胡扯！我也是凡体肉身，哪能刀枪不入？不过，作战时你越不怕死，就越不容易被枪子儿打中，你越贪生怕死，畏畏缩缩，枪子儿就会专往你身上钻。什么刀枪不入，扯淡，我身上还留着敌人的枪眼和刀伤呢。”一边说，许世友边撩起上衣向大家展示身上斑斑点点的战场留念。

这一天，许世友真让我们工作人员开了眼界，他表演完棍术，又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精湛的少林拳。我进入留园 7 号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领略了许世友的“武侠”风采。尽管他向工作人员展示这种风采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几年下来，我们还是从许世友身上学到了几手。

八

力量篇

● 当许世友把关公庙里一把重八百斤的大刀扛回驻地时，众人皆称奇不已。一老者赞曰："真神人也。"

许世友不但武功超群，而且力量过人。他个头不高，五短身材，虽无大力士的高大块头，却有压倒大力士的力量和气势。他全身隆起的疙瘩肉，显示出他深厚的训练功底，加之他有一身绝顶的武功，突然发力时，确有千钧之势。许世友跟我们说，他年轻时，五百多斤重的大石磙子，他弯腰抱起绕场一圈，面不改色；他当骑兵司令时，策马飞驰，伸手把住头顶上横着的树枝，双腿用力一夹，一猫腰，能吊起奔驰的战马；战斗中，他双臂夹住两个伤员，跨越战壕如履平地。一位熟知许世友的老首长曾对我说："许司令的力气究竟有多大，无人知晓。我亲眼见到几个大力士，包括国际友人同他角力，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1974 年，我随许世友到某炮兵部队视察。阵地上，战士们正在训练装填炮弹。近五十公斤重的弹头，小个子战士搬起来有点吃力。许世友走上前去，鼓励战士们说："要多练，功到自然成，练多了气力就大了。"说着，他双手轻轻地托起炮弹，又轻松地举过头顶。在场的战士们对年近七旬的老司令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陪同的领导怕闪了许世友的腰，连忙上前扶住他。许世友开心一笑："比起当年关帝庙扛大刀，一颗小小的炮弹又算得了什么！"在场的官兵听出许世友的话中有故事，都非常好奇，纷纷要



许世友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兵！"

求他讲一讲"扛大刀"的故事。许世友正在兴头上，索性就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许世友所说的扛大刀，是红军时期他当师长时，发生在川东地区的一件往事。那是1933年10月，许世友奉命率红九军七十三团和红四军二十八团，支援中共川东军委领导的川东游击队，消灭退至宣汉以东南坝场地区的敌人。一日，他正在检查部队训练，一个侦察兵向他报告说，毛坝场附近的山上，有座关帝庙，庙里有把关公大刀，奇重无比，四个侦察兵都抬不动。许世友听后心动了，带上警卫员和那个侦察兵，走了七八里山路，到了关帝庙。果见一把青铜铸造成的大刀，横躺在关公身旁的石桌上。许世友命四个警卫员和那个侦察员合力去抬那刀，五个人使足了劲，大刀却纹丝未动。许世友叫他们让开，他紧紧腰带，运一口气，双手抓住大刀的中部，大喝一声"起！"竟将大刀提离石桌。

他又运一口气，大喝一声“上!”将大刀稳稳当当地放在肩膀上。在五名随从的簇拥下，许世友面不改色的将大刀扛回驻地。他的这一壮举，惊动了当地，众人皆称奇不已。一位老者向大家介绍了此刀的来历：五十年前，为供奉关帝爷，镇里用八百多斤青铜，铸成了这把大刀，是由八个壮汉抬到山上去的，这把大刀在关帝庙里躺了整整五十年，无人能动。老者一边介绍，一边向许世友竖起大拇指：“许将军真神人也!”

● 村民们被许世友双手同时举起两把百斤石锁的壮举惊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山东省胶东半岛腹地的现海阳市郭城镇西古现村，在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曾把指挥部设在这里。该村现任党总支书记于笃平曾多次向我讲述，当年许世友组织八路军利用战斗间隙，带领村民疏通河道，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发展生产的故事。如今的西古现村，已建设成农、林、果、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周围三千多亩自动喷灌的苹果园，成为胶东半岛远近闻名的苹果基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万元。

西古现村当年有两把大石锁，每把重达近百斤。西古现村至今还流传着当年许世友用大石锁练功的故事。这个村 80 岁以上的老人，大都亲眼见证了许世友举石锁的大力士风采。如今，提起许世友和大石锁，老人们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述起当年许世友练功



轻松地把大铁锁举过了头

的情景：

1941 年，侵华日军加紧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诱降活动。一时间，胶东地区大小二十多个反共顽固派的司令，或明或暗的打起膏药旗，当了投降派，勾结日本鬼子专打八路军。为打击投降派的嚣张气焰，胶东地区成立了以许世友为总指挥的反投降指挥部。这一年，许世友把指挥部安到了西古现村的家庙里。

西古现村当年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一千五百多人的大村子。村里的家庙建造得非常气派，家庙的大堂里，摆着两大两小四把石锁，大石锁每把近百斤，小的每把近八十斤。按照村规民俗，每年大年初一到十五，村民们就会把石锁搬到家庙前的大操场上，进行举锁比赛，让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显身手。村里规定：凡双手能同时举起两把小石锁的，被称为“好汉”，受到村民们的青睐；双手能同时举起两把大石锁的，则被尊为“英雄”，大受村民们的敬重。据老人们讲，比赛年年搞，好汉年年有，英雄却未曾见过。



抱起近一百公斤重的小麦包过称

许世友走进家庙，看到这四把石锁，兴奋地两眼直放光彩。他把军务安排停当，便命警卫班把四把石锁搬到操场上，让警卫员比试举锁。许世友的警卫员，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人高马大，颇有气力。经过几轮比试，大多数能单手举起小石锁，只有几个人能双手同时举起两把小石锁，而双手能同时举起两把大石锁的，却没有一人。这时，前来看热闹的村民，站满了大半个操场，他们不停地给八路军鼓劲加油，希望能亲眼看见双手举起两把大石锁的英雄。

这时，许世友出场了。他踢踢腿，伸伸臂，又做了几个下蹲运动。一番简单的准备动作之后，许世友走到两把大石锁中间，弯下腰，双手握紧大石锁的石把，运足气，大喝一声“起!”迅速将石锁提起，提起的一刹那，双手腕一个翻转，将石锁送到肩头，两臂再一撑，把两把大石锁稳稳当当地举过头顶。他举着石锁在围观的村民面前绕了一圈，又稳稳当当地把石锁放回原地。

村民们被许世友这气壮山河的一举惊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许世友举石锁的故事不胫而走。有的村民说："八路军里有个大官，个头不高，力量奇大，举百斤石锁，就像举小鸡一样轻松。"有的说："八路军里英雄多，这回我们可亲眼看到双手举起两把大石锁的英雄了。"还有的说："那个举大石锁的大官有神功，一刀能砍倒鬼子一个连。"

许世友的指挥部设在西古现村的那些日子里，应村民们的邀请，许世友经常表演举石锁，让村民们大饱了眼福。许世友举石锁的神功，也传到了投降派的耳朵里，吓得他们心发慌，腿发软，打仗时听说许世友来了，就吓得屁滚尿流。没过几年，许世友就



和苏联顾问跳起欢快的舞蹈

领导胶东军民，把胶东地区二十四个投降派司令收拾得干干净净。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许世友与苏联大力士比气力，更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故事。这个大力士是苏联军事顾问，住上海沧州饭店。此人身高体壮。那天许世友陪他外出，他看见饭店门口蹲着一对大铜狮子，一时心血来潮，弯腰合臂抱起一尊，挺了几秒钟，又“嘭”的一声放回原地。尽管这个大力士使出了吃奶的劲，憋得满脸通红，可他还是抬手摸了摸两撇山羊胡子，一脸傲气地朝许世友努努嘴，意思是说：“你行吗?”

许世友虽已年过半百，可依照他好胜的性格，怎肯示弱！只见他迈步向前，只用单臂搂定铜狮子，一运气，起！一扭腰，走！一条胳膊夹着铜狮子就地转了一圈，然后轻轻地放回原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

苏联大力士目瞪口呆：“许将军的神功果然名不虚传。”他再想想自己刚才班门弄斧，使的那点蛮力，简直羞愧的无地自容。他双手向许世友伸出大拇指，用俄语赞叹：“赫啦索！赫啦索！噢赤尼赫啦索!”

事后，沧州饭店的领导说，那尊铜狮子至少有三百斤。

● 许世友晚年雄风犹在，其力量远非一般年轻人可比

许世友盛年时，喜欢与战士练对刺，一条木枪神出鬼没，常把战士的木枪挑上天去。到了晚年，他仍然喜欢与战士较量。对

刺时，普通战士不是对手，他专找强者比试。面对许世友，那些训练有素的“尖子”也不免发憷，何况他又是大军区司令员，还没出枪，战士就先怯了三分。所以比试的结果，总是许世友胜利。实在说，许世友练对刺，除了有臂力过人的优势外，他手里确实还有些“绝活”。比如，对刺时挑飞对方手中的枪，就是类似关云长的“拖刀计”和岳飞的“回马枪”一样的“绝活儿”。不过，在他70岁高龄时，仍能把战士的木枪一条条打飞，其中也有战士相让的因素。这一点，许世友心里自然明白。每当许世友打飞战士手中木枪，战士们夸赞他“宝刀不老”时，许世友就会开心地哈哈大笑。

许世友到了晚年，也是功不离身，雄风犹在，其力量远非一般年轻人可比。

晚年许世友经常锻炼气力的科目，还是他的优势项目——举



身先士卒，雄风不减当年

重。广州留园7号大门两旁，原来是经过精心打理的花草地。许世友入住后，把右边的草地开成了菜园子，把左边的草地改造成一个器械场。场地里单双杠、山羊、木马、杠铃、沙袋等器械一应俱全。许世友常教育工作人员："干革命要有一个好身体，好身体是练出来的。"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到器械场训练至少一小时，有时他亲自督阵，指导训练。许世友爱好举重，我们工作人员也跟着他练举重。别看许世友已七十高龄，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谁也举不过他。工作人员中举得最重的是管理员张传亮，他能举起一百四十多斤重的杠铃，其他人大都只举得起一百二三十斤。每当我们举起的杠铃，在头顶上不稳地晃动时，许世友就会



将军、战士都要有强壮的体魄

挖苦说："看你憋得脸通红，举起不到二两重。"

一天下午，许世友的心情特别好，他在器械场看了一阵工作人员练举重，感到不过瘾，就把军上衣一脱，亲自上场一试。工作人员劝他先从一百斤开始举，重量逐渐往上加。许世友哪里肯依？他要把重量直接加到一百五十斤，并要工作人员先举。这个重量从来没有人举起过，众人都试举了三遍，无一人能举得起。

许世友上场了，只见他走到杠铃前，扎稳马步，双手握紧杠杆，运一口气，大喝一声"起！"在把杠铃提离地面的同时，又像当年举大石锁一样，双手腕一个翻转，把杠铃稳稳当当地提到胸前，接着一个挺举，又稳稳当当地举过头顶。一片喝彩声过后，许世友缓缓地把杠铃放回原地。

"举重不能光使蛮力，还要用巧劲。"许世友边讲要领边示范，又一次把杠铃举了起来。这一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许世友的大力神风采。七十高龄的老人，竟能从容举起一百五十斤重的杠铃，令工作人员惊叹不已。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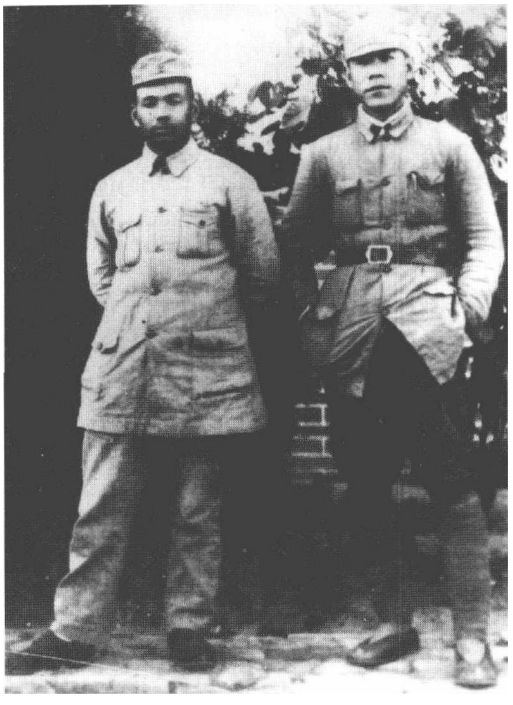
性格篇

● 胆大好强敢碰硬，是许世友性格的显著特色。他在强敌面前不示弱，危险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低头。在许世友的字典里，找不到个“熊”字

许世友逝世后，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在向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和政委郭林祥传达邓小平关于对许世友丧事的批示时指出：“许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发许世友的特殊通行证（土葬），这是特殊的特殊。”许世友的性格究竟特殊在哪里？

儿时，在深山老林用树棍打跑蟒蛇救出小伙伴而成为“孩子王”；8岁抢过土匪的盒子枪而豹胆初显；入少林寺习武八年，凭一身胆气和武功，堂堂正正打出少林寺，威震众多武林高手；在红军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当敢死队长，四次负伤，当师长时还跟敌人拼大刀，威名远扬；只身赴胶东“打天下”，一句“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令敌人闻风丧胆；五十多岁下连队还跟年轻的战士飙着攀登悬崖峭壁；古稀之年乘车登南岳山至无路可行时，他坐在车上命司机在陡险的荒岭上开进，直开到祝融峰下，把司机惊出一身冷汗……

这就是许世友。熟悉许世友的人都知道，胆大好强敢碰硬，是许世友特殊性格的显著特色，他天不怕地不怕死不怕，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个“熊”字。



和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在一起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这些颇含军事哲理的口头禅，常挂在许世友的嘴边。许世友要求他的官兵，打起仗来个个都要成为不怕死的勇士。他为什么多次当敢死队长，当师长时还上阵拼大刀？因为他笃信，不怕死的指挥员，能带出不怕死的兵，有了不怕死的兵，才能打胜仗。情况危急时，他右手举着驳壳枪，左手一把鬼头刀，大吼一声，带领部队冲入敌阵。他那把沉重的大刀一旦抡开，砍着者死，撞着者伤，常把敌人杀得尸横遍野，人头滚滚。

“死并不可怕，人死了就像睡觉一样舒服。”许世友经常诙谐地对我们这样说。他指的是1930年他当敢死队长时，攻打大山寨战斗中的一件往事。

大山寨是河南光山县西南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寨子，寨主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个上校团长，叫张胜元。此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专与红军作对。为使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决定拔除大山寨，大山寨一除，其余寨子就会不攻

自破。

许世友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奉命攻打大山寨。大山寨确实坚固，寨墙高约两丈，厚约四尺，全用青条石垒成，一般的枪弹只能擦破它一点表皮。战斗打响后，许世友率领敢死队员冲到寨墙下。敌人一面射击，一面推下滚木雷石，敢死队多次强架云梯，都被推倒了。当时红军没有大炮，不但迟迟攻不下来，反倒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世友急得两眼直冒火，他急中生智，命人找来一张方桌，在上面蒙上浸过水的棉被，做成一个土盾牌。他一手持土盾牌，一手提鬼头刀，踏上云梯，凭借一身武功，“蹭、蹭、蹭”几步跨上寨墙。一个守寨的团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刀砍掉了脑袋。乘敌人混乱，众敢死队员呼喊着一跃而上，攻进寨门，杀得守寨团丁人仰马翻。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混战中，许世友的头部突然被躲在暗处的敌人重重地打了一闷棍。他自觉得头一懵，身子一晃，从两丈多高的寨墙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

红军部队收尸时，把许世友抬了回来，大家以为他牺牲了，都失声痛哭。等许世友醒过来，已经是两天两夜过去了。许世友望着周围的人不解地问：“你们哭什么?”队员们擦擦眼泪告诉他：“都哭你阵亡了。”时任团长的王树声，看到许世友醒了，高兴地说：“你没有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啊，原来是在睡大觉呢!”许世友听了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他摸摸后脑勺说：“团长，我这一觉睡的真舒坦！下次打仗，我还当敢死队长。”

许世友常和工作人员讲起这段故事。他说：“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七次参加敢死队，当了两次敢死队长，挂了四次彩，当

敢死队长当出了名。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了不起。”字字句句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使许世友能打硬仗恶仗出了名。他参加红军三年，就由普通一兵提到班长、排长、直至当了团长。三年能连升五级，作战不怕死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胆大好强敢碰硬”，许世友自有其独到的理论见解。他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写到：“面对强敌，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人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不能打的兵，只有不能打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也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许世友到胶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奇袭牙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胆大好强敢碰硬”的性格特色。

牙山位于胶东地区腹地，原来是我党胶东抗日根据地，由于胶东党组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被胶东投降派的二号人物蔡晋康给夺了去，使胶东抗日形势一度落入低潮。许世友一到胶东，就决定把牙山夺回来。

1941 年 3 月 15 日，胶东区党委和反投降指挥部，在蓬莱县吴家村召开干部动员大会，许世友到胶东后首次公开“亮相”。当年参加过动员大会，现都已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参加大会的领导都是在主席台上坐着讲话。轮到许世友讲话时，只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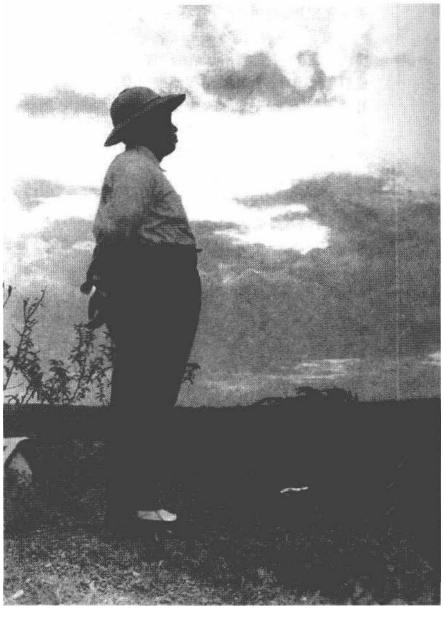
他身子一跃，“腾”地一声跳到桌子上，双手有力地挥打着手势，提高嗓门讲到：“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决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胶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讲了七个“打”字，在简短的讲话里，“打，打，打”之声不绝于耳，讲得会场上群情激昂，不断高呼：“打回牙山去，活抓蔡晋康！”

白天刚开完会，许世友当晚就指挥部队打上了。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围攻牙山。出发前，他黑着脸，咬着牙，对三路指挥员说：“这是我们在胶东打的头一个硬仗，只许进，不许退。全体官兵都必须牢记：动摇军心，杀头。消极避战，杀头。见死不救，杀头。临阵逃脱，杀头。”

许世友指挥三路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远程奔袭，直奔牙山。16日清晨，三路大军同时出现在牙山山麓蔡晋康的驻地，将敌人分割包围。经过三天激战，全歼蔡晋康部。蔡晋康，这个曾猖狂一时的胶东投降派的“二号司令”，就这样被许世友给灭掉了。蔡晋康一灭，其他投降派的嚣张气焰顿失。他们纷纷收缩地盘，加固工事，唯恐许世友来攻。而这一仗，大大提高了胶东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使胶东抗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我们困难大，敌人困难更大，现在就看谁硬过谁，胜利往往就是在最后五分钟取得的。”



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在济南战役中，许世友把“胆大好强敢碰硬”的性格，展现得尤为彻底。由此，也成就了他军事指挥上的一次重大成功，为许世友的军事指挥风格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1948年9月，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济南战役，要求华东野战军在二十到六十天内攻下济南城。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许世友为攻城总指挥。

济南是蒋介石固守中原的堡垒，也是护卫南京的门户——徐州的主要堡垒。济南一旦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南京也势必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亲自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下达死命令：“济南是战略要地，必须固守！”王耀武早就知道解放军要攻打济南，他精心修筑了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的五道防线，

并吹嘘说："济南的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

战役打响前，济南守敌有十一万人，随时准备支援济南的援敌有十七万人。面对强大的敌人，身经百战的许世友深感责任重大。怎样才能打得赢？许世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考虑攻城战役的指导方针，一天两夜只吃了两顿饭，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深思熟虑之后，他形象地提出了"牛刀子战术"。他把设防坚固的济南城，喻为一头强硬健壮的大牛，把东西两线攻城部队，喻为两把杀牛刀。他号召攻城部队要像"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搅乱敌人的五脏六腑，置敌人于死地"。

9月16日24时，许世友庄严地下达了攻城的命令。激战七天七夜，到23日凌晨，攻城部队摧毁了敌人外围的所有防线，锋芒直指济南守敌的内城核心阵地。济南内城城墙高十二米，厚十至十二米，明碉暗堡密集成群。城墙上每隔十米就修一子堡，隔三十米修一母堡，隔七十至一百米修一炮台。护城河宽五米，最宽处有二三十米。此时，王耀武手中还有精锐主力三四万人。王耀武判断，解放军由于连战疲惫，不经三五天休整，不会发起对内城的攻击。他23日午后，在内城门楼上召开决战会议，给他的部下撑腰打气，妄图取得"坚守待援"的胜利。

然而，许世友没有命令部队休整，他不给敌人一丝一毫喘息的时间。他命令部队当晚即发起了对内城的攻击。东西两线两把"牛刀"，同时向内城——敌人的心脏捅去。然而，两把"牛刀"没有戳进敌人的心脏，却戳到了硬骨头上，捅不进，拔不出。攻打内城的部队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而攻城最高指挥员许世友，也面临他当军事指挥员以来最难决断的一次考验。

原来，攻打内城的部队，一开始就遇到守敌的拼死抵抗。攻城突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跃过护城河，迅猛冲向城墙根，用五十斤重的大炸药包，将城头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梯子组的战士，抬着四丈多高，三百多斤重的云梯过河，将云梯靠上了城墙。突击组的战士们正准备登城之时，城头上的敌人投下大量集束手榴弹，许多战士负伤、牺牲，云梯被炸断。有的突击队员冲进突破口，和敌人拼杀，全部壮烈牺牲。

反复攻击，反复失利，我突击部队全线受挫，被阻在内城城下。一场恶战之后，战场上出现了七天七夜以来第一次死一般的沉寂。

面对突如其来的沉寂，王耀武迅速估量了双方的形势。他分析，共军攻城部队在数次失利后，很难坚持到天亮，说不定要连夜撤退。而他的精锐主力损失不大，又有牢固的城防工事、充足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他决心与共军决一死战，坚守到援兵的到来。

此时，在攻城兵团的指挥部里，也出现了撤与不撤两种意见。不少领导同志提出，攻城官兵鏖战七天七夜，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有些主攻部队的建制被打乱了，伤亡大，缺员多，这样继续攻下去恐难以奏效。如果僵持到天亮，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火力之下，将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根据中央军委用二十至六十天的时间攻下济南城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们坚决主张将攻城部队连夜撤下来，进行休整和补充，然后再组织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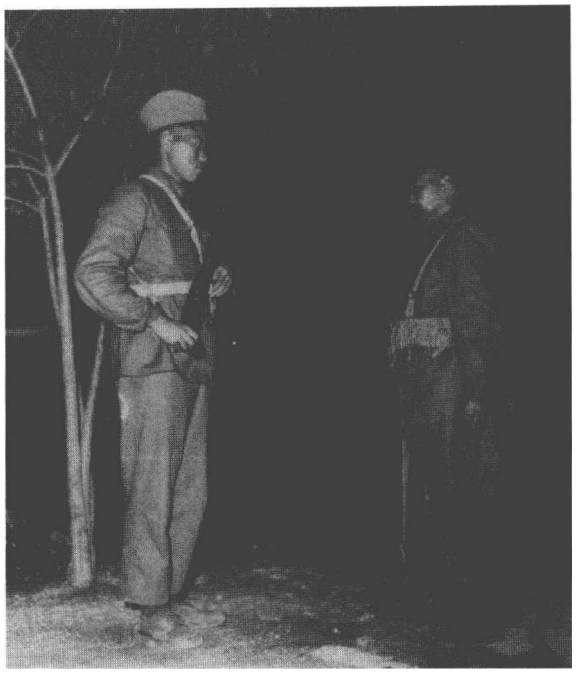
此刻的许世友，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紧盯着作战地图，锁紧双眉，脑子里紧张的思考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激战关头的每一秒钟，对指挥员来说，都极其宝贵。如果决断不准，就会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许世友迅速分析了战场局势，认为：仗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攻城的决心决不能动摇。如果撤，敌人来个反冲锋，我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将前功尽弃。关键时刻，需要咬紧牙关，哪怕是血流成河也不能动摇。

决心已下，许世友遂于深夜命令攻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他对各路指挥员说："我们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是在最后五分钟取得的。"

果然不出所料。东西两线攻城部队万炮齐轰，济南内城刹那间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敌人动摇了。东线突击队首先突破，把红旗插上了济南内城城头。西线突击队也在拂晓前一举突破内城。9月24日，济南彻底解放，守敌十一万人全部被歼。

● "看我的！"许世友说完，抓住绳子，双脚一跳，敏捷地向山崖上攀去

和平时期不打仗了，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危险少了，已高升为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也已年过半百。他在不知不觉中发福起来，可他"胆大好强敢碰硬"的性格丝毫未改。遇到苦、难、险、



下连当兵，午夜换岗

重的任务，他还会身先士卒。若部属劝他几句，他以为别人嫌他老，心里很不服气。

1958年，已53岁的许世友下连当兵，他和年轻的战士一样摸爬滚打、武装泅渡、攀登悬崖。连队进行攀登训练，连长把队伍带到大山下，战士们抬头一看，山顶缭绕着如烟似雾的云彩，情不自禁地惊叫："这山又险又高，怎么爬?"指导员对许世友说："您年纪大，身体胖，攀登不方便，就不要爬了。"

许世友就像没听见指导员的话，两眼紧盯着攀登的战士。他发现一个战士胆怯，抓绳子的双手直发抖，便走向前，对那个战士说："看我的!"说完，抓住绳子，双脚一跳，敏捷地向山崖上攀去。他边爬边回头大喊一声："上!"众战士顿时勇气倍增，紧紧地跟了上去。许世友攀到山腰凹处时，攀绳被紧跟其后的战士拉紧，许世友突然脱手，身子悬空了。站在地面上的官兵，顿时大惊失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身子一斜，一手抓住了攀绳，一脚登上了岩石，身子向上一蹿，另一只手又抓住了攀绳，一

瞬间化险为夷，继续向上攀去。崖下的官兵莫不惊叹："若不是许司令武功高超，遇险不惊，这一险情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下连当兵，和战士一起训练攀登悬崖

许世友登上山顶，挥手鼓励山下的战士："同志们，加油啊！"返回营房的路上，他又自豪地说："你们看到了吧？姜还是老的辣嘛。再训练一下，我就能恢复当年的功夫，行走如疾风，爬山如履平地。"

许世友不高兴了，厉声说："我看能上就能上。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上！"

1974年，许世友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时，已是70岁高龄，他还是不服老，也不允许别人说他老，他争强好胜的性格愈发明显。有两件事，一件发生在陆上，一件发生在海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件是1974年上半年，我跟随他到驻湖南部队视察，下榻衡山山麓某部队。视察结束后，随行的其他首长提议许世友就便到南岳衡山一游。许世友虽出身名寺少林，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开始他不愿意去，后听说南岳山如何如何巍峨陡峭，险峻难登，便产生了去看一看的兴趣。

盘桓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逶迤八百余里，纵横七十二峰。巍峨雄伟的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堪称"南天一柱"，傲视三湘四水。

上午9点整，许世友的登山车队出发了。六辆清一色的老式北京牌吉普车，顺着崎岖的盘山路迤逦而上。路两侧，古木参天，幽径重重；古刹如林，景观栉比。许世友似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要领略的是南岳山究竟有多陡、有多险。

越往上走，路越窄、越陡、越险。过了山半腰，"胳膊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上山的路还没铺沥青，车队在简易的土路上

绕行，一边是直立的石壁，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好像盘行在古栈道上。这时，许世友来了兴趣，他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惬意地欣赏着两边的险景。

再往上走，满山遍野弥漫起大雾。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艳阳天，霎时间被浓雾笼罩得阴沉沉的，能见度不足5米。车队全部打开大灯，后车看着前车的尾灯，继续向上盘行。

快到祝融峰时，头车停了下来。在头车上带路的保卫队长李经林向许世友报告："前面无路可走了。"许世友下了车，到前面一看，只见一块三米多长的巨大条石，横挡在路中间。石条右侧立一木牌，上面写着公安局的告示："危险！严禁一切车辆通行！"石条左侧，顺着山势，开出了一片面积不大的小型停车场，是供上山的车辆到此调头下山用的。再看那条上山的土路，宽约三米，左边是直立的石壁，右边是陡峭的深渊，路面崎岖，坡度很陡，因不走车，路面上长满了滑溜溜的茅草。据游人介绍，过去这条路从没有上过车，汽车把祝融峰上用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等运到这里后，再用人工背上去。

许世友绕过大石条，沿着上山的路边走边观察。我和李经林紧随其后，也边走边看。这段通往山顶的小路确实弯多陡险，路面紧巴巴的只有一车宽，万一车头顶到左边的石壁，或车轮在草地上打滑，后果都不堪设想。不用说雾大能见度差，就是清朗天气也不敢开车上山。我和李经林都认定许世友不会乘车上山。谁知许世友返回来，命人搬开石条，坚持要开车上山。这可急坏了随行的其他首长，他们一齐围上来，劝许世友说："开车上山太危险，还是步行上山吧。"

“怕什么，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许世友一脸的不屑，坚持要乘车上山。但不管他怎样坚持，大家还是不同意。在当地驻军选来给许世友开车的经验丰富的驾驶员老李，也说不能开车上山。

许世友不高兴了，厉声说道：“怎么不能上，我看能上就能上，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上！”

这时，随行的首长和李经林都把目光投向我，意在让我做最后的劝阻。我走上前还没开口，许世友就对我吼道：“你也是怕死鬼，你就留下吧！”说完，跳上车，命令司机开车。

劝是劝不住了，随行的首长都表示愿随许世友乘第一辆车先上，被许世友一一劝住。许世友只允许他一辆车上，其余车辆都停在那个小停车场上，全体人员步行而上。

这下可急坏了李经林，他急中生智，找人在草深易打滑处，填上一层沙土，又组织随行人员中的年轻者在路右侧的险要处一字儿排开，一旦车向右倾斜，他们就会拼力用肩膀顶住。而这一切在许世友看来，都十分可笑，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车子启动了，司机推上加力挡，握紧方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一步一步地向上挪动。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许世友，镇定自若，他不时地鼓励司机：“不要怕，只管大胆往上开。”

奇迹出现了！许世友乘坐的汽车终于开上了上祝融峰，稳稳地停在“老圣殿”下。

许世友胜利了。他当是乘车登上祝融峰的第一人。

据说，许世友乘坐的这辆吉普车，后来被封为“功臣车”，存放在南岳山下的解放军某部。

许世友以征服者自居，双手叉腰，立在祝融峰上，脸上荡漾

着胜利的笑容。而那位开车的老司机，此刻却瘫坐在驾驶室里，惊吓地浑身直冒冷汗。许世友把司机请出驾驶室，伸出大拇指夸他是好样的。他跟司机又握手，又合影，可他没有看到，司机后背的衬衣早就被汗湿了一大片。

在祝融峰顶，许世友不经意讲的几句话，给随行人员上了深刻的一课。他说："稳妥不等于保守，谨慎不等于胆小。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股敢闯的精神，如果唯唯诺诺，这也不能干，那也不敢干，就会一事无成。我今天的实践证明，是可以乘车上祝融峰的，如果不大胆去试，祝融峰可能永远是通车的禁区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海上。1974 年下半年，我随许世友到外伶仃洋上的万山群岛看地形，海军派了一艘军舰保障。出发前，气象部门预报，伶仃洋上中午将有八级大风。舰艇领导请示许世友是否按计划出航，许世友答复："只要不下刀子，就准时出航。"

军舰出航了，许世友站在指挥室里，手持望远镜，从海上逐个逐个地观察每一个岛屿。边看边听陪同的守岛部队领导汇报各岛的地形、设防和周围的海域情况。

风越刮越大。上午 11 点，洋面上刮起了八级大风。霎时间，山呼海啸，波涛汹涌。吨位不大的军舰，忽而被掀上浪峰，忽而又跌进浪谷，舰上有一半官兵开始晕船呕吐。舰长担心许世友等首长受不了颠簸，请示返航。

许世友反问舰长："你能受得了吗?"舰长还没来得及回答，便"哇哇"地呕吐起来。许世友趁机调侃道："原来是舰长大人想返航了。"

军舰在风浪中继续颠簸前进，许世友的随行人员，除了李经

林队长、警卫干事和我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都晕船了，有的呕吐得直不起腰来。许世友却精神倍增，就像神话中怀揣着避风珠的神仙，稳稳地站在指挥室里，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形，大风大浪对他似乎不起作用。中午时分，风力增大到九级。军舰剧烈地晃动，使人根本无法站立。为保证许世友等首长的安全，舰长第二次请示返航。

许世友又反问舰长："你能喝酒吗?"舰长回答："能有机会在军舰上给首长敬酒是我的荣幸。"

顶着九级大风，跳着"摇摆舞"，酒宴开始了。大家晕了半天船，肚子里的东西全吐空了，一闻到酒味，忍不住又想吐，谁还敢端酒杯？几个平时酒量大的首长和舰长一起，陪许世友喝了几杯后，也不能再喝了。许世友的兴致却很高，谈笑风生。他一会儿嘲笑我们随行人员"弱不禁风"，被一阵小风就刮得东倒西歪。一会儿说"大风大浪是纸老虎，八、九级大风我们都顶过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许世友用小杯喝似乎不过瘾，索性换上大杯，自斟自饮，一瓶茅台酒一会儿就让他喝了个底朝天。

是什么力量使70岁高龄的许世友，能在九级台风的军舰上立如泰山？是体力，功力，还是意志力？都是，但主要还是意志力。"胆大好强敢碰硬"的性格，始终是许世友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

权贵面前不奉迎，强势面前不折腰，敢于匡扶正义，不怕惹火烧身，是许世友特殊性格的又一显著特色。他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救助了不少落难之人

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靠“打、砸、抢”起家而风靡全国的造反派在政治上还很吃香。而在“文革”初期饱尝造反派冲击之苦的许世友，对造反派深恶痛绝。他在各种场合公开骂造反派“是祸害、是流氓，不是什么好东西”。谁能想到，当年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曾落难躲进了大别山。

“文化大革命”之初，南京地区军内外造反派串联在一起，冲击南京军区机关，“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局势愈演愈烈。性格刚烈的许世友对此很不理解，他心情焦躁不安，直接给毛泽东和林彪发电报。电报大意是：地方不能乱，军队更不能乱，军队要保持高度稳定，不能受冲击。中央要尽快有个章法，如果你们不管，我被逼急了，就要开枪。开枪了，就会血流成河。电报发出后，各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势头，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北京反而传来了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揪出来示众的坏消息。许世友火急火燎，心绞痛、神经性呕吐病又犯了。军区其他首长担心许世友的

火暴脾气被逼急了，会捅出什么娄子来，都劝他离开南京，避避造反派的锋芒。

“惹不起我躲得起。”在战场上从不言退却的许世友，在那场特殊的“革命”中，被迫退步了。1967 年春天，他先是退到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部里避难，南京的造反派跟着追到无锡，扬言要“活抓许世友”。许世友一看，在野战军也待不下去了，就向军委请病假，躲到大别山去了。

许世友到大别山之前，把他的两员爱将，一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一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召到无锡会面。这一海一空两位将军，都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又是军区党委常委。他们在本单位处境险恶，随时可能遭遇不测。许世友见这两位老部下灰头晦脸，心里非常难过，一时又想不出话来安慰他们。沉默了一阵儿，许世友说：“你俩和我一起进大别山吧，如果部队乱了，就在大别山上打游击。”聂、陶二人没法应承许世友的好意，他俩明知回到部队凶多吉少，但也不能跟许世友进山，他们担心会拖累许世友。许世友最后悲凉地说：“你们既然不跟我去，就各奔前程，好自为之吧！”结果陶勇回去没多久，就被造反派整死了，尸体丢到一口深井里。聂凤智回去也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把他装在麻袋里打，头发被抓掉，牙齿被打掉，还要装在麻袋里扔进长江，幸亏被许世友派人救下。

许世友在大别山避了一阵子，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亲自给南京的造反派打电话，严肃指出“许世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你们揪许世友同志”。造反派这才停止了揪斗许世友的阴谋。

许世友在避难之时，一刻也没有放松抓军区部队的治乱促稳工作，同时，还时刻挂念着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和他们亲属子女的安全。一天，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向他汇报，说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被造反派整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流浪街头，无人照管。当时，总政治部刚下发了“叛徒陶勇畏罪自杀”的通报，东海舰队以党委常委名义，签发了《开除叛徒陶勇党籍、军籍，取消一切革命军人待遇》的通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谁有胆量收留“叛徒”的三个儿子呢？那要有不怕惹火烧身的大无畏政治勇气啊！许世友义无反顾地把这件事揽了过来。他把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叫到身边，亲自交代肖永银要把这三个孩子，送到比较偏僻的部队里保护起来。

三个孩子被带到许世友面前，他们跪着求许伯伯救命。在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他安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也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都要管你们。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咱们当兵的又不办工厂，你们还是当兵去吧。”本来那一年部队不招兵，经许世友特批，把包括自己的孩子在内的四十多个落难领导的子女，统统送进了部队这个“红色保险箱”。

一起被送进“红色保险箱”的，还有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的女儿聂梅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聂凤智就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发配到广西一个偏僻的山乡去“劳动改造”。他的夫人何鸣也被监督劳动，在南京军区空军门诊部洗药水瓶、打扫卫生。原先住的“将军楼”换了主人，她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无人知晓的小平房里。面临绝境的何

鸣，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灾难，甚至做好了以死抗争的准备。他们的全家都跟着遭了殃，几个子女失踪的失踪、离家的离家，只剩下聂梅梅一个，在军内外备受歧视和欺辱。正当社会上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的时候，许世友不避风险，不怕牵连，向落难的聂凤智一家伸出了援手。他亲自出面请何鸣吃了一顿饭，并安排聂梅梅去当兵。席间，许世友安慰何鸣："现在是坏人神气，好人受气。说聂凤智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相信。老聂受冤枉是暂时的，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你一定要坚强啊！"在那个人妖颠倒的特殊年代，许世友一席话，使何鸣增添了好好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她感到这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慰藉，更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何鸣备受感动，这件事一直讲了二十多年。

位高权重的许世友，越升官越仗义，对落难弱者一次次伸出救助之手

许世友落难之时不畏强势，济人危难不避风险。他位高权重之时，更敢仗义执言，救助了不少落难之人。

1967 年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他一生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几个月后，毛泽东亲自解救了他。这年 9 月底，毛泽东亲自请他到北京欢度国庆节，10 月 1 日，许世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8 年春，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许世友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 年 4 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好

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此时的许世友，正所谓位高权重，春风得意。

位高权重的许世友，越升官越仗义。他看不惯那些阿谀奉迎、趋炎附势之辈，对那些落难的老干部，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救助之手。

1969 年 4 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毅元帅和许世友都分在华东组。林彪、江青一伙故意挤兑陈毅，他们的喽啰们发言时，对陈毅含沙射影，恶语攻击他是“老机”、“一贯右倾”、“一贯反对毛主席”，整得陈毅灰溜溜的。每次开会他都到得较早，在后排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造反派故意冷落他，一些老熟人迫于压力，也不敢接近他，把他一个人晾在角落里。许世友对此看不下去，他每次到场，都主动和陈毅握手问候，叮咛他保重身体。许世友还找来两包毛主席像章，在会场上当众恭恭敬敬地赠送给陈毅。以毛主席像章相送，在当时是最珍贵的礼物。陈毅两手握住许世友的手，连声说：“许司令，谢谢你！谢谢你！”许世友当众送像章，无疑是对落难的陈毅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是对那些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的藐视。

许世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还利用进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之机，向毛泽东进言，救了他落难的两位老部下，在世人特别是在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许世友的两位老部下，一个叫王近山，一个叫周志坚，两人都是老红军，战争年代都是许世友手下的得力战将，都于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近山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公安部副部长，周志坚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20 世纪 60 年代二人都因有关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处分。王近山下放到河南一个县农场当

副场长，周志坚下放到河南省军区任副参谋长。

王近山和周志坚下放所去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很同情这两位为人民打天下多处负伤的老红军，认为对他们的问题处理得太重，帮他们写了申诉材料，可不知道材料怎样往上送。当时，二人想到了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老首长许世友。

申诉材料到了许世友手里，他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寻找机会解决。正巧，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还谈到老同志犯错误的问题。许世友乘机向毛泽东进言，说有几个战争年代很能打仗的人，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请主席过问一下，并把申诉信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信，说："看来处理过重了。"



在南京陪同周恩来接见民兵代表

许世友见有转机，连忙点头说："他们虽有错误，但处理确实过重，应该恢复职务。"

毛泽东问："让他们到哪里工作呢?"

许世友说："就到南京军区，两个我都要。"

康生在一旁插话："他们两人都被开除了党籍，怎么回部队当领导呢?"

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先到生产建设兵团当副参谋长，过渡一下，恢复党籍后，再回军区机关。"

毛泽东同意了许世友的意见。1970 年 8 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近山和周志坚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当王近山见到许世友时，第一句话就说："许司令，您是我的救命菩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在南京军区机关干部大会上，许世友亲自安排王近山和周志坚的"第一次亮相"，详细介绍了他俩在战争年代的突出战功。在工作分工上，许世友又直接插手，让王近山分管作战，周志坚分管直属队，使他们有职有权，便于开展工作。王近山和周志坚知恩图报，工作尽职尽责。

王近山重新工作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78 年 5 月病故时，年仅 63 岁。王近山病故的消息传到广州，许世友既痛惜又着急。中国人是讲究规格的，盖棺就要定论。他不能看着老战友按三十年前的正军职待遇安排后事。他给军委负责同志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电报，"强烈要求"恢复王近山原有待遇。中央军委又一次同意了许世友的意见，在王近山去世三天后下了命令，任命他为南京军区顾问。这可能也称得上是一次"特殊中的特殊"。王近山的

后事是按照大军区领导的待遇办理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这让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非常感动。

王近山和周志坚安排了工作后，许世友又为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上将王平落实了政策，推翻了强加在王平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使他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像王近山、周志坚、王平这类事，在许世友身上举不胜举。

十

廉洁篇

许世友位高权重，但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没有个人的家业，唯一的家产，是一口老式樟木箱子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这句话用在许世友身上恰如其分。作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军队高级将领，许世友经常牵挂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军队建设的大事，从没有想到为自己置办什么家业，也没有想到为子女留下什么财产。

许世友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他和夫人田普生活中使用的，全是公家按规定配发的。他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口镶着铜边的老式樟木箱子，箱子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几套军装、几双布鞋，再就是他自己亲手用布条打的布草鞋。许世友把这口樟木箱子从南京带到广州，离开广州时，带走的还是这口樟木箱子，没有增添其他财物。

这种情况，就是在具有良好的艰苦朴素传统的我军高级将领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许世友对钱看得很淡。他常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年他拿的是行政五级工资，每月 379 元，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确是一个大数目了，但他从来不到银行存一分钱。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10 元钱让我去交党费，再拿出 60 元让我或管理员交房租费（许世友在留园 7 号的房租当时按规定应交 59 元），剩下的钱大都用来买了茅台酒和猎枪子弹。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许世友简朴的春节“家宴”

许世友对茅台酒的价格很关注。来到广州后，他得知一瓶茅台酒从3块4角钱涨到4块3角钱，后来又涨到了8块钱，就抱怨说，广州物价太贵，还是南京的茅台酒便宜，便托南京军区管理局帮他代购茅台酒。其实，在计划经济年代，茅台酒在全国各地的价格是一样的，许世友买的茅台酒的差价部分，是南京军区管理局代他垫付的。当许世友知道了内情后，严肃批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早告诉他，他坚持要将南京军区垫付的差价补回去。从此，他再也不到南京去买酒了。

许世友对家属要求也非常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沾光谋利。他的夫人田普，是抗战早期参军的老同志，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田普担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她相随到广州。为了安排好田普的工作，当时军区政治部的领导曾提议，要让田普在广州军区干部部继续

担任副部长。这本属对口平职安排，可许世友就是不同意。许世友认为，干部部是要害部门，安排自己的亲属去担任领导不合适。后来，田普被安排到北京工程兵某科研所担任副政委，仍是平职安排。

在用车问题上，许世友要求田普严格按照机关的规定办。许世友平时乘坐的是两台老式北京牌吉普车，田普用车则由司令部汽车队派遣。那时，车队的乘坐车数量少，档次也低。少数几台进口“吉姆”车，主要用来接待外宾和总部首长。不同级别的首长，在用车上大致也有个标准。司令部首长通常坐“伏尔加”牌轿车，机关二级部长坐“华沙”牌轿车，二级部副部长大都坐北京牌吉普车。田普是二级部副部长，但因她资格较老，车队一般会照顾性地派“华沙”车，田普也做到车队派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一次，田普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要求车队给她派一辆好一点的车。这事让许世友看到了，他立即指示把派来的车退回去，还批评田普不该搞特殊化。事后，许世友又指示我，以他的名义给管理局和车队领导打电话，让他们严格执行机关的用车派车规定，对他的家人也不能特殊照顾。

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许世友不但大事分得非常清楚，小事也从不含糊，绝不允许家里人搞特殊，沾公家一点便宜。一次，田普见到某宾馆花工种养的花姹紫嫣红，娇艳的花儿竞相绽放，阵阵花香袭人肺腑，禁不住连声称叹。宾馆领导见田普如此喜欢，就让工作人员从中挑选了两盆放在田普的汽车上。许世友下部队回广州后，得知这两盆花是田普从宾馆搬回来的，非常恼火，批评田普是贪公家的便宜，让立马把花送回去。田普认为许世友是

小题大做，很不服气，说花本来就是让人观赏的，再说，这也不是自己要的，是他们主动送的，你何必发这么大火。许世友一听，更加生气了，大声批评她说："你这是翻了身，忘了本，纯粹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

接着，许世友气呼呼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建议你们马上召开党小组会议，让田普也参加，对她好好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她认识错误。"

我说："田普同志是领导干部，我们不好批评啊！"

许世友愤愤地说："你只管大胆管，大胆帮，我给你们撑腰。"

我听后，感到非常为难。一是带两盆花回来，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用不着上纲上线；二是田普和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党小组的，怎么能召开党小组会，去批评帮助她呢？

也许是因为工作太忙，许世友后来没有再过问和追究这件事。但因为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让许世友发如此大的火，使人感受到了许世友公私分明的高尚品格。

许世友把七个子女全送去当兵，但他从来不允许给子女特殊照顾

许世友共有七个子女。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七个孩子全部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

锻炼。

子女参军后，许世友从不给特殊照顾，用许世友的话说：孩子参了军就是部队的人了，是组织的人了，好坏由部队去管，路子由他们自己去走。他的七个子女，有的当了军队的基层干部，有的当了团职干部，有的当了将军，靠的都是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

许世友的大儿子许光，解放初期入伍当了海军。他在战友面前从没有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勤奋扎实，从不怕苦怕累，深得所在部队领导的赏识。许光本来有机会到海军院校深造，将来会有好的发展。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对许光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光按照许世友的吩咐，由海军改为陆军，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武装部工作。由于一直在家乡武装部工作，许光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兵已三十多年的许光还是个副团级干部，与同期入伍的人相比，职务明显偏低。一次，许光在话语中稍微流露出一点情绪，就遭到许世友连珠炮似的责问："你当过几次敢死队，受过几次伤，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要老老实实工作，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后来，许光在武装部副部长位置上转业，到了该县县人大担任副主任。

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夕，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女儿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狗屁蜜月！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

下落，限她三天之内赶回部队，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因为子女问题发这么大的火。女儿接到指示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

许世友对待子女是这样，对待孙子辈以及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态度。

许世友的大孙子许道昆从部队复员后，指望爷爷能说句话，安排个好工作，没想到许世友不但不安排，开口还是批评：“你只当了三年兵，肯定不是个好兵。还是回家去种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三孙子许道江高考未被录取，想通过许世友在南京找个学校复读一年再考，许世友又板起脸说：“考学要靠自己努力，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回家劳动。”

许世友的一个远房堂孙许道炎，在部队当了九年兵还是个战士。一次，他利用休探亲假的时间特意绕道军区机关见爷爷许世友，要求许世友帮忙说情提干部。许世友不仅不帮忙，还批评他趁早打消这种靠关系往上爬的邪念头，要用自己的真本事说话。结果，许道炎最终复员回了老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田普的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的年龄，从老家跑到广州，要求姑姑和姑父想办法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当了兵，另一个又回了老家。

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谁因为自己在首长身边工作而得到特殊关照。不管是秘书、警卫，还是医生、管理员，离开许世友时，大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什么级别来，还是什么级别去。这在许世友那里，已经成了惯例。

● 许世友不给别人送礼，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我在许世友身边三年，只见他收过三次“礼”，送过一次“礼”

第一次“收礼”是1974年秋的一天，许世友到军区机关嘉禾农场视察工作，恰逢农场砍下了一些甘蔗，于是，农场工作人员将一捆甘蔗放在了许世友吉普车的后厢里，说是让首长尝尝部队官兵自己种的甘蔗。许世友没有推辞，欣然接受，回来后分给工作人员吃了。

第二次是军区一位副参谋长送他两瓶越南产的山葡萄酒。这位副参谋长和许世友是同乡，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75年，这位副参谋长到越南访问，给许世友带回了两瓶越南产的山葡萄酒，许世友收下后将酒送到了食堂，让工作人员享受了。

许世友收的第三份礼是老家的公社党委书记带来的一袋板栗、核桃和一桶麻油，这是许世友一向喜欢吃的家乡特产。可许世友没有独享，将板栗、核桃全部分给了工作人员，将那一桶麻油拿到了工作人员用餐的小食堂，大家一起分享。

公社书记这次来，一是代表家乡人民看望许世友，二是想通过许世友为家乡弄一辆汽车。

许世友见到家乡的公社书记，显得格外亲热和高兴，设家宴招待，并让我陪酒。酒照例是茅台酒，菜是他打来的野味。许世友端起酒杯，亲切地说："家常便饭，越吃越甜，茅台连心，越喝越亲。我敬家乡人民一杯酒，咱们干了！"公社书记见许世友情绪很高，便寻找各种理由连连向许世友敬酒，整顿饭吃得非常高兴。

饭后，许世友留公社书记小坐，详细询问起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当听公社书记说，家乡这几年收成不错，乡亲们都能吃上饱饭时，许世友说："共产党领导闹革命，就是让穷人吃上饭。"他又接着说："不过，有点小成绩绝不能翘尾巴，你们不仅要让乡亲们有饭吃，还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公社书记乘机说，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家乡正在学大寨，修水利，搞机械化，公社想买一辆汽车，可是没有钱，想请许司令帮忙想想办法。

许世友听后说："妈巴子的，我哪来那么多钱买汽车，部队的车是保障打仗用的，又不能送给你。"

看到场面有些尴尬，我在一边插话说："部队有些报废车，战备用不上，闲在那里也是浪费，是否可以找一辆给家乡应应急？"

许世友点头同意："胖子，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我马上给军区后勤部有关部门打电话找报废车，几经周折，找到了一辆报废的"解放"牌。我到现场看了那台车，大厢板是断的，轮子是瘪的，只有发动机勉强可以发动，确实是一辆废车。如果不维修，可能连广州市也开不出去，更不用说开回河南老

家了。

我把车况报告了许世友。许世友当即指示："要把车修好，修理费从我工资里扣。"我找有关部门连日加班维修了发动机，翻新了大厢板，更换了新轮胎，交给那位家乡来的公社书记，把车接走了。

公社书记临走时，许世友将自己种的地瓜装了整整一麻袋，对公社书记说："这麻袋地瓜你带回去，让乡亲们尝尝，就说这是我许世友种的，是我的一番心意。"

给公社书记送地瓜，是我跟许世友三年见到他第一次"送礼"，也是唯一一次"送礼"。送走了公社书记，许世友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家乡办好事是应该的，可那些没出高级干部的地方的老百姓怎么办，那不是干吃亏？许世友心中想的不但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他还时刻想着全国的老百姓。

十一

警觉篇

● 世人传说许世友办公桌上放着一把手枪，谁进门不报他甩手就是一枪，曾经打死好几个老婆，这是谣传

民间流传着许多许世友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充满了传奇色彩。有的故事说，许世友福大命大，数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是因为有天上的神灵相助；有的则说，许世友后脑勺上长着一只眼睛，有人想在背后暗算他，他抬手一枪，就把那人给撂倒了；还有的说，他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要进他的办公室，必须先报告。如果不报告，他甩手就是一枪，曾经打死过好几个老婆。

这些传说，有些是人们出于对许世友的爱戴，而对其美化和神化，有些则是捕风捉影的谣传。

许世友确实立有一规矩：凡进入他办公室的人，哪怕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敲门或喊报告，经他同意才能进去。我刚到许世友身边工作时，虽然知道这些规矩，但有时为避免打扰他，也有不报告就进门的时候，结果引起许世友的不满，惹来一顿训斥。一次，我给许世友送文件，看到他正在埋头看报纸，为不打扰他，就没有喊报告，且有意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走进了他的房间，把文件放在他的桌子上。许世友对此不高兴，批评说："为什么不报告，偷偷摸摸的，像个小偷。"

我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以后进入许世友的办公室，都会先报

告再进去。晚年的许世友耳朵有些背，喊报告的声音要适度，太大或太小，都会引起他的不快。有一次，我站在门口，连喊几声报告，可能因为声音低，正在专心看文件的许世友没有听到，他就批评说："你没吃饱啊，咙咙唧唧的，像蚊子叫。"还有一次，我大着嗓门喊了一声："报告！"可能声音过大，使许世友受到惊吓，许世友猛地抬起头，转身盯着我说："大声吼什么！想吓我吗？告诉你孙胖子，炮弹在我眼前爆炸我都不怕，我还怕你！"

我也感到刚才喊报告声音太大，太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进入许世友的办公室要报告，这是许世友亲自定的规矩。但传说中因进门不报告而打死了好几个老婆，就纯属谣传。

许世友一生结过三次婚，在战争年代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他的三任妻子，或散或离或白头偕老，没有一个是因为进他的办公



和夫人田普与高大山等在一起

室不报告而被他打死的。

许世友的结发妻子叫朱锡明，和许世友是同乡。朱锡明1901年生，比许世友大四岁。贫苦人家出身的朱锡明，勤劳、能干，又天生丽质，被许世友的母亲看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母亲的操办下，许世友按照家乡的习俗，雇一顶简陋的花轿和几个吹鼓手，把朱锡明热热闹闹的娶回了家。

许世友的蜜月只过了三天，就接到作战命令，告别了母亲和新婚的妻子上了前线。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许世友只能偶尔在深更半夜回家与妻子小聚。

后来，许世友参加了黄麻起义，随起义队伍离开了家乡。再后来，随红军长征队伍到了陕北。许世友和朱锡明共生了三个男孩，前两个都夭折了，第三个男孩叫许光，前文已经提到。

许世友离开家乡后，音信全无。后来，家乡传说他在战斗中被打死。为了不让儿媳独守空房，深明大义的许母左劝右劝，最后自作主张，把朱锡明改嫁给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而许世友随部队出征不久，就听到了反动武装对革命家属进行疯狂报复，母亲被迫离家逃难，妻子和儿子被杀害的传言。因误听传言，许世友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许母的头发全白了，老人家盼儿子的心也死了，她不再幻想许世友能活着回到她身边。就在这时，新中国成立了，许世友作为山东省军区的司令员，他的名字登在了报纸上。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不禁悲喜交织。喜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还活着，悲的是自己已另嫁他人。后来，许世友把母

亲在济南居住，每当老人向许世友提起儿媳朱锡明如何孝顺贤惠，不可遵从婆婆之命改嫁他人的往事，许世友就会唏嘘不已。

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叫雷明珍，四川达县人，是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雷明珍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长征到达陕北后，被组织部分配到延长县担任妇女部长。

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便对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介绍，两人相知相爱，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互敬互爱，感情很深。细心的雷明珍还把部队宰羊后丢弃的羊毛收集起来，搓成毛线，给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天有不测风云，没料到许世友和雷明珍的这段美好的姻缘，却因为许世友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中受到牵连和雷明珍一时的冲动而散伙了。

1937年初，许世友所在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从保安迁到延安。抗大在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一度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红四方面军在抗大学习的高级将领，与张国焘的错误联系在一起批，把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许世友对此倍感委曲。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此时竟然萌发了串联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逐步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错误想法，并在暗中做准备工作。事情败露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关了起来，并被戴上“组织反革命集团”、“拉枪逃跑”、“叛变革命”等罪名。许世友感到天大的冤枉，但又一时“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把一切看得很灰暗，只求一死了之。此时，他更加思念自

己的妻子雷明珍，他托人给雷明珍捎去口信，要雷明珍赶快来见他一面，他要为不能陪妻子白头偕老而当面致歉。

口信捎出后，许世友日思夜盼，盼来的却是雷明珍的一封绝情信。信上说："许世友，我恨你，我绝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签字！"。

许世友看完信，顿感五雷轰顶。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落难需要向亲人倾诉之时，心爱的妻子竟是如此绝情。这在许世友这位刚烈的汉子心灵上，留下了一生都难以抚平的创伤。

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批张"扩大化的错误，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一时冲动而做出的草率决定追悔莫及，她多次找许世友承认错误，希望复婚，可许世友不肯原谅她。雷明珍后来又请朱德、陈赓、陈锡联等许世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出面调解，许世友最终没有原谅她。

许世友的第三任妻子田普，是山东莱阳人，他们相识相恋在抗日烽火年代。田普1922年生人，比许世友小17岁。他们真正是一对琴瑟相合的患难夫妻。两人1941年结婚，相依相伴44年，育有两子四女，白头偕老。

1939年秋，许世友调入共华北局党校学习，不久经朱德推荐，毛泽东批准，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从此，拉开了他在山东战斗生活16年的序幕。而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也从这儿拉开了序幕。

1941年，许世友已36岁，却还是独身一人。因整天带兵打仗，无人照料，他的生活越来越马虎。许多老部下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私下里商量为他张罗对象。后勤部长高大山，在根据地的

兵工厂里，为他物色了一个品貌兼优的姑娘，陪着许世友骑马前去相亲。到了兵工厂车间大门口，许世友并不进门，还没等高大山开口介绍，许世友就指着里面一位正在专注干活的姑娘说："我看她就行。"说完，策马而去。

许世友所指的姑娘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她正是高大山事先为许世友物色的对象。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他们之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卿卿我我的依恋，而是闪电般的结了婚。用许世友的话讲，就是"见面互相问问同意不同意，双方都同意，五分钟就结婚，痛快干脆"。

许世友和田普结婚后，为照顾许世友的生活，组织上正式安排田普为许世友的生活秘书。田普对许世友的照顾体贴入微，两人相濡以沫44年。田普在回忆许世友时，曾深情地说："许世友那许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我，他是我的严师诤友。"而许世友生前也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侣，来世还要做伴侣。"

许世友的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许世友时时保持着超乎常人的警觉性，常年枪不离身。即使到北京参加一些限制携带武器的重要活动，他也枪不离身

许世友这种超乎常人的警觉性，是战争年代那种时时都会发

生意外和险情的特殊环境造就的。白天，许世友总是枪不离身，晚上就把枪放在枕头底下。“军人死不丢尸，活不缴枪”，这句常挂在许世友嘴上的口头禅，是他终生不渝的信条。这既是他革命坚定性的体现，也是他高度警惕性的体现。即使到北京参加一些限制携带武器的重要活动，他也是枪不离身。毛泽东逝世后，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许世友带枪进灵堂时被卫兵挡在门外。

卫兵给许世友敬了个礼，很有礼貌地问：“首长，您带枪了?”

许世友也不还礼，反问道：“我怎么不能带枪?”

卫兵说：“首长，这里有规定，进灵堂不能带枪。”

许世友问：“谁规定的?”

卫兵答：“中央规定的。”

许世友虎着脸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

此刻，早就对毛泽东的死因有怀疑而憋气的许世友，以为有人要缴他的枪，顿时火冒三丈。他嗓门很大，边说边往里闯。卫兵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见他大发雷霆的样子，谁还敢伸手阻挡? 任他直闯进去。在整个吊唁大厅里，参加守灵和吊唁的党、政、军领导人中，带枪的只有许世友一人。

许世友外出一般是两辆吉普车同行，五、六个随员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腰别手枪，手提内装长枪的精制皮箱，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个乐器演奏班子。而一旦有情况，他们就会迅速展开，其战斗力足能抵上一个训练有素的加强班。

为了考察警卫人员的警惕性和应变能力，许世友外出有时会中途突然改变去向，临时改去另一个地方。如果警卫人员情况不

熟，带错路或走了弯路，就会遭到他的批评。一次到肇庆军分区，走到三水时，许世友看到远处有一列火车，便问随行的保卫队长李经林："火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李经林一时回答不出来。许世友马上说："你这个保卫队长不行，情况不熟。当年我在县里当炮队队长时，每天晚上都要把全县的敌情汇总分析一遍。保卫队长应该对方圆五十公里内的社会情况了如指掌。"

许世友到广州后，更加睁大了警觉的眼睛。他说广州离香港、澳门近，资产阶级的东西多，特务也多。他在南京还没动身就给送他到广州的子女们打"预防针"："广州那地方乱，去了后不许上街乱逛、乱买东西，闷了就跟我出去打猎！"许世友要求工作人员无事也不要上街，大家做完了本职工作，或组织学习，或跟他外出打猎，或在院子里种菜养鸡。

当年，东方宾馆是广州最豪华的宾馆，经常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政要，有些回广州探亲的港澳同胞也在这里下榻以示尊贵。在群众眼里，这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场所。广东省和广州市有时在这里举行重要活动，凡邀请许世友出席的，他一概推辞不去，常使人感到不解。一次，广东省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登门拜访许世友，闲谈中讲到东方宾馆，那位领导建议许世友有时间去看一看。许世友张口说道："什么东方宾馆、西方宾馆，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有什么好看的！"

● 战争年代经历的太多险情，使许世友遇事总爱从最复杂的方面去作出判断。这种以防万一的警觉性不难被理解，但有时也会弄得人哭笑不得

许世友有时会把警觉性“高”过了头，弄得人们无所适从。军区保卫队队长、许世友的贴身卫队长李经林，就有这样一次难忘的经历。

李经林是1951年入伍的老同志，他从警卫战士做起，一直从事警卫工作，曾多次领导和参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州的现场警卫，堪称经验丰富的警卫工作专家。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经林护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到南京，又把许世友从南京接到广州。李经林是河南人，许世友常称他是“老乡队长”。许世友到广州后，李经林带保卫部三名干部和一个班的警卫战士组成一个警卫班子，专门负责许世友现场的安全工作。李经林每天早晨7点半钟准时到留园7号值班，行动不离许世友前后，晚上许世友就寝后他才离开，深得许世友的信任和赏识。

当时，军区机关正在开展揭、批、查运动，揭露清查林彪一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人和事，机关各部局的大小字报铺天盖地。一天，李经林因病住进了军区总医院。许世友早晨起来没见到他，便询问警卫干事，警卫干事以实相告。许世友的第一反应，就是



视察某装甲兵部队

有人要在运动中加害李经林。他驱车直奔总医院，径直来到李经林的病床前，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有人要害你？现在斗争很复杂，害了你我也就不安全了，千万要警惕啊！"说得李经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又过了一段时间，机关有个别人写了李经林的小字报，大致内容是：李经林过去警卫黄永胜和丁盛两任司令员时，都很卖力，这两任司令员都有问题，李经林不可能没有问题。把这样有问题的人，放在许司令身边负责警卫工作很危险，建议把李经林从许世友身边调走。

许世友看完小字报起了疑心，他没想到竟然会把一个有问题

的人派到他身边负责警卫工作。他把小字报拿到军区常委会上去宣读，以此说明揭、批、查斗争的复杂性。幸亏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和副政治委员肖元礼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才没有酿成调人风波。

当许世友在会上读完小字报后，江燮元和肖元礼先后发言说："小李子（指李经林）忠诚可靠，几十年来我们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他的任务就是警卫值勤，不管谁来当首长，他都要尽职尽责。黄永胜、丁盛有问题，不等于李经林有问题。"一席话消除了许世友的疑心。许世友当即说："没有问题就不要调走了。"

这件事后来传到李经林的耳朵里，令李经林哭笑不得。

类似李经林这样的情况，我也经历过一次。1974 年上半年，为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全国全军范围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各大军区积极响应，许世友在广州军区发动机关干部深挖林彪一伙在广州的死党，并在军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点了军区前主要领导人的名。与此同时，从广州军区调任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也在南京军区机关发动了揭、批、查运动，把矛头指向许世友，清算许世友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消息传到广州，引起了许世友的恼怒。正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机关一位许世友很熟悉的干部到广州出差，住进了军区珠江宾馆。南京军区来出差干部先是打电话表示对许世友的问候，并提出要到留园 7 号看望许世友。珠江宾馆和留园 7 号仅百米之远，我报告许世友后，正准备去迎接远方来访的客人。谁知许世友脸色一沉，指示道：这个人是南京军区某领导派来的暗探，你通知军区保卫部，马上把他抓起来！

我一下子被惊呆了，没想到许世友瞬间会做出这样异乎正常的判断和决定，弄得我一时左右为难。这事跟南京来的客人怎么说呢？跟保卫部又怎么说呢？通知保卫部抓人吧，没有任何根据；不通知吧，这是许世友亲口作的指示，怎么敢违抗呢？我回到办公室，静下心来冷静思考，试图找出处理这一难题的办法。我判断，许世友没做认真思考就指示抓人，此刻他可能正在反思自己所做决定的正确性呢？我决定先不给南京来的客人回话，也不通知保卫部，等缓和一下再跟许世友解释。我当即向跟随许世友从南京来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大家都说南京来出差的这个干部人品好，过去常鞍前马后地跟随许世友下部队检查工作，不可能是暗探，我心里更有底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再跟许世友说："南京来的客人来看望您，本身就说明他不是暗探，哪有找上门来自投罗网的暗探呢？"我停了一下，见许世友不作声，就大着胆子建议说："是不是先让保卫部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说呢？"

"不用了解了，不是暗探晚上就请他来家里喝酒吧！"许世友道。

我又一次被惊呆了，还是对那个人，一个钟头前说他是暗探要抓他，现在又成为座上宾要请他喝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转得如此迅速，如此坚定。

这就是许世友。战争年代经历的太多的险情，养成了他遇事总爱从最复杂的方面去作出判断的本能。尽管有时会让人哭笑不得，但全面分析，他这种以防万一的警觉性也不难被理解。

● 许世友也有警惕性不高的时候，他有时不按警卫规定办，常使警卫人员感到头痛

全面分析许世友的警觉性不难发现，他政治斗争警觉性这根弦时时绷得紧紧的，从不马虎。而有些个人活动，特别是到野外打猎和到河边撒网捕鱼时，他的警觉性就不那么高，甚至完全不顾警卫工作的规定我行我素，这常使警卫人员感到头痛。

按照警卫工作的要求，重要警卫对象不能离开警卫人员的视线，必要时警卫人员要身不离左右，一旦发生情况，便于及时处置。而许世友在野外有时却不允许警卫人员靠近他，可能是担心人多会惊跑他的猎物。打猎时，他把警卫人员赶得远远的，经常一个人端着猎枪，在凸凹不平的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搜索前进。毕竟是70岁的老人了，又是大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万一有个闪失，谁也负不起责任。

一次，许世友在广西邕江边撒网捕鱼，江边又陡又滑，警卫营长怕他滑倒，紧跟在他身后，随时准备拉他一把。许世友火了："你他妈的老跟着我，把鱼都吓跑了，到一边去！"警卫营长不敢违背，只好退到稍远的地方跟着他。不大一会儿，由于许世友撒网用力过猛，连网带人掉进江里。警卫营长不顾一切冲上去，跳进江里，一把拉住许世友，把他扶上了岸。鱼没捕到，还掉进江里湿透了衣服，许世友一脸的丧气，把鱼网一丢回去了。

尽职尽责、经验丰富的李经林，却有办法跟紧许世友。不管许世友怎么说，甚至发脾气赶他离远点，他总是笑嘻嘻地不离许世友左右。一次，在广州郊外的野地里，许世友猫着腰，两眼只顾盯着远处的斑鸠向前靠近。突然，脚下被一条突出的树根拌住，他一个趔趄，身子失去平衡。说时迟，那时快，紧跟其后的李经林，一步窜上去把他扶住。许世友嗔怒道："妈巴子的，都怪你，把斑鸠给吓飞了！"

不过，打那以后，不管打猎还是撒网，许世友不再驱赶紧跟他的警卫人员了。

十二

作风篇

● 许世友下部队检查工作，从不提前发通知。他说："等准备好了再去检查，就看不到真实情况了。"

作为打了一辈子仗的高级将领和军队管理者的许世友，深知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对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部队打胜仗的重大意义。他推崇扎扎实实、不尚空谈、不尚张扬的工作作风，反对好高骛远、不求实效、做表面文章的不良风气；他鼓励部属讲真话、道实情，对敢于讲真话，特别是敢于对存在问题实情实报的部属，经常给予肯定和赞赏，而对夸夸其谈、好大喜功、报喜藏忧的部属则常常冷面相对，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

许世友下部队视察工作，不喜欢兴师动众。他认为陪同的人多了，前呼后拥，车水马龙，像旧社会鸣锣开道出行的封建官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一贯的做法是：轻车简从，说去就去，说走就走，从不张扬。许世友下部队视察，也不允许提前给所去单位发通知。他常说：提前发通知，等准备好了再检查，是形式主义。那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免不了要涂脂抹粉精心打扮一番，就是一脸的黑麻子，也会被厚厚的白粉盖住，这样就看不到真实情况了。

我初到许世友身边任秘书，对这一情况不了解。认为首长视察部队，提前通知部队做必要的准备是秘书的工作职责。一次随



下连当兵，练习打背包

许世友下部队时，就提前通知了有关部门。

许世友一走进营区，迎面看到的是列队欢迎的官兵。他不但不高兴，反而非常生气，一脸怒容，厉声责问："这是谁干得好事？"

随从人员看到许世友生气的样子，面面相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我一看这架势，知道自己好心把事情办"砸"了，嗫嚅地说："是我通知的。"

"谁让你通风报信？你这是帮倒忙！"许世友说。

打那次后，许世友再到驻广州附近的部队视察工作，总要等随行人员都上车后再指示所要去的具体单位。那时候没有车载电话，更没有手机，他这样做，谁也没有法子再"通风报信"了。对许世友这样不打招呼的视察，尽管有些部队领导开始时不理解，甚至有些抱怨，但这样做，一方面避免了部队为应付首长检查而造成的忙乱，同时也确实了解了部队的许多真实情况。

● 许世友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到随机确定的单位去检查，常使那些平时工作不扎实，上级来检查时又突击做表面文章的单位丢丑

许世友到部队视察工作，从不搞“一听二看三谈四讲”（一听就是听所到部队领导汇报本单位全面建设的情况；二看就是对所到单位的一些岗位和场所的工作情况进行现场查看；三谈是召集所到单位的部分官兵开座谈会，听他们谈对本单位建设的意见；四讲是在听、看、谈的基础上，由工作组首长对了解到的情况进行综合整理，然后给所到单位领导成员进行讲评）那一套形式化的检查模式。许世友说：“听的、看的、谈的，都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再通过讲评又还给他们，这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从领导中来到领导中去’，是自欺欺人。”

不管是到军里，还是到师里团里，许世友很少进会议室听部队领导照稿子汇报工作，也很少到部队已经准备好的现场去检查，他要亲自看看部队的真实情况。他经常会到自己随机选定的单位去，边检查边讲评。一次，许世友到某军检查工作，快到军部的时候，他突然指示改变路线，要司机把车直接开到了离军部较远的一个连队。军里没想到许世友会一头扎到连队检查，事先没有通知这个连队做准备。许世友看了连队的农副



接见军烈属代表

业生产，菜地里，稀稀啦啦的蔬菜因缺少肥料而发黄；猪圈里的猪体瘦毛长，许世友便有几分不悦。他又到了连队饭堂，看到小黑板上公布的本周菜谱，还是半个月以前的，便对陪着他检查的连长、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伙食连着官兵的心，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啊！"

许世友结束了在该军的视察，临走前在给军里领导作指示时，专门强调了搞好连队农副业生产，改善基层官兵生活的问题。他幽默地说："部队生活有改善，等于半个指导员。"接着，他把在连队看到的情况通报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连队农副业生产搞好了，生活改善了，能解决官兵许多思想问题。从这点上讲，搞好农副业生产，关系到部队的思想政治工



下连当兵期满，给战士签名留言

作，关系到部队的全面建设，这项工作可不能小看哟。”由于许世友讲的是真实情况，又是这个单位的薄弱环节，且把这项工作由事入理地上升到了“部队全面建设”的高度，军里的领导听了连连点头。

许世友这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作风，影响着各级干部。脚踏实地干工作的干部爱他这一着，投机取巧、作风飘浮的干部怕他这一着。他常使那些平时工作不扎实，上级来检查时又突击做表面文章的单位当面出丑，有力地促进了部队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进。

● 许世友下部队照相，喜欢和部队家属、基层官兵、农场职工一起照，很少和部队领导单独照

许世友喜爱照相，每次下部队视察结束后，通常会跟部队的官兵合影留念，以示鼓励。和其他首长不同的是，许世友照相时，还要请部队家属一起来照。翻开许世友相册就会发现，他跟部队家属、军工厂女工、海岛女民兵的合影，占了一定的比例。小小的海岛，常常是被遗忘的角落，而许世友上岛却不忘和守岛官兵家属合个影。在部队视察工作后，有时临时通知家属照相，她们三三两两来得迟，许世友也会耐心等待。一次，在某集团军



与海岛战士合影

机关要照相时，许世友看到排列整齐的集团军领导和机关人员中没有家属，便问陪同他的领导："家属们怎么没来？快派人去请。"参加照相的人员见许世友要和家属一起照相，都感到很新奇。家属们大都没见过许世友，听说许世友要和她们合影，个个兴高采烈，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赶了过来。有个临时来部队看孙子的老太太，也乐颠颠地挤到家属队里和许世友合了影。后来，我逐渐发现，许世友下部队照相有个习惯，他不喜欢跟部队领导单独照，而喜欢跟部队家属一起照，跟基层官兵一起照，跟农场官兵一起照。对此，许世友也有说法。他说："部队家属是半边天，她们一心一意支持丈夫的工作，就是支持部队的工作。她们很崇高，理应关心她们；基层官兵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打仗主要靠他们，他们摸爬滚打很辛苦，理应鼓舞他们；农场官兵搞好生产，为改



小海岛常常是被遗忘的角落，而许世友却来到了这里

善部队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他们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理应重视他们。”原来，许世友照相也讲政治，他是要通过照相来鼓舞士气，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一起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啊！



与海岛官兵家属及子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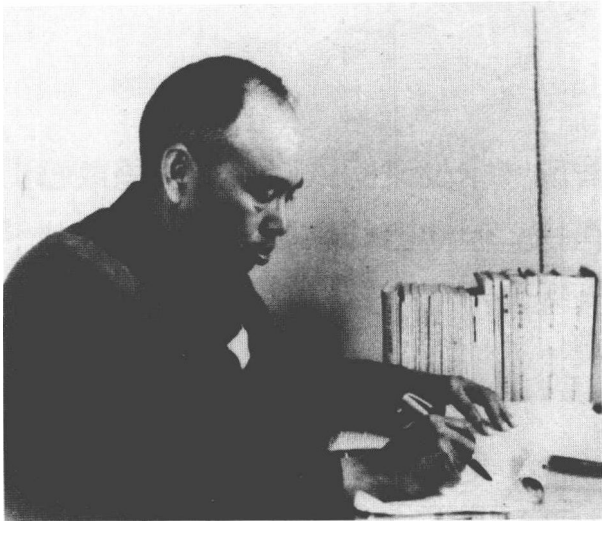
十三

读书篇

许世友总被人理解成一个少文的武将，一个勇敢粗犷的军人，这并没有错。但他自幼嗜书如命，并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认真阅读《红楼梦》等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透析许世友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最看得起能打仗不怕死能喝酒的人，而往往看不起那些文绉绉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在他的眼里，这些人会时不时摇头晃脑的夸夸其谈，或有意无意地流露出“酸溜溜”的“阴阳怪气”。有时候，针对个别可恶的人，许世友的话非常刻薄：“人屎可以喂狗，猪屎可以肥田，臭知识分子，屎都不如。”

许世友看不起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尊重知识。他知道要“整治”那些好为人师的知识分子，还是得用知识的力量。他从汉语词典上精心挑选了几十个生僻怪异的汉字，如：丌、卯、乍、寀等，一一记录下来，并把这些字的读音熟记在心。遇上那些爱夸夸其谈、好卖弄学问的人，许世友就会随手写出几个怪僻字，虚心向人家“请教”。说是请教，实则是善意作弄。凡被他“请教”过的人，十有八九因不认识这些怪僻字而十分尴尬。这时，旗开得胜的许世友会得意得开怀大笑，笑人家喝了一肚子墨水，连简单的中国字都不认识。接下来许世友会把这些怪僻字一一解读出来，那神态俨然是一个解疑释惑的先生。这一招常使



专心学习

好卖弄学问的人瞠目结舌，对许世友刮目相看，摸不清许世友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墨水。许世友的这一招，可能也是他对“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兵法的灵活运用吧！

尽管对一些知识分子有时会有些偏见，但戎马一生的许世友也是嗜书如命，即使在长征途中，他也会抽空看一会儿书。当然，他平时最钟情的还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古典书籍，最欣赏的就是古代那些倜傥江湖、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像“武松醉打蒋门神”、“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英战吕布”等章节，他百看不厌，甚至能倒背如流。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任司令员时，毛泽东曾托他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捎过书。那是一册合译本，包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及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毛泽东嘱咐许世友：“你也要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召见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毛泽东当众问许世友：“看没看过古典小说《红楼梦》?”许世友回答说：“看过了。”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一部

历史小说，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读一遍不行，要坚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许世友表示：“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只讲武，爱打仗，武官务文，还要讲点文才行啊！”

许世友调到广州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静下心来阅读《红楼梦》、《天体运行论》等书。毛泽东给他带了三十本《天体运行论》，他送给了军区常委，还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人手一本。无论会上会下，许世友总是颇为自豪地强调：“读这些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你们也得看一看。”



与文艺工作者座谈

这一段时间以来，许世友散步的时间明显减少，也很少去打猎了，没事就坐在屋里认真习读《红楼梦》。许世友看书也显得极

其耐心和投入，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红蓝铅笔，每天看完以后，就把精彩的诗词背下来，在大家面前“卖弄”一番。在开常委会的时候，许世友也会时不时宣布：“我已经看了第一遍了。”过一段时间，他又宣布：“我已经看了第二遍了。”说着，他会当场背诵“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等诗句，以示他真正看进去了。有的资料说，许世友去世后，他床头的《红楼梦》仍然翻在第一卷。能否理解为他临终前只读到第一卷？但据我亲眼所见，许世友把整部《红楼梦》至少读了一遍。“仍然翻在第一卷”，当不知是读到第几遍了。

许世友开始读的是一种小本子的《红楼梦》，后来中央给他寄来了线装本《石头记》。许世友年龄大了，眼神有些不太好使，看了一段时间后，一天，许世友把我喊到面前，把书往我面前一推：“胖子，你先看，把精彩的东西给我摘录下来。”他所说的“精彩的东西”，是指其中的诗词、典故、谚语、歇后语，以及精彩的段落。这一下，我接受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枯燥乏味的艰巨任务。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就是夜以继日地读《红楼梦》，抄《红楼梦》。为此我专门设计了一种稿纸，这种稿纸也是16开大，每页只可容纳120字，每个字有红枣大小。许世友对此相当满意。我离开许世友时，抄书的稿纸堆起来足有半尺多厚。许世友每次看完一部分，都会在稿纸空白处签上一个大大的“许”字。就这样，我陪伴着许世友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读《红楼梦》的任务。

● 他还认真阅读了《汉书·周勃传》，并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当了一回“周勃”

毛泽东叮嘱许世友读的几本书中，除了《红楼梦》外，他还认真阅读了《汉书·周勃传》，并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后来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当了一回“周勃”。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典故：“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特地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接着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重厚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典故中的随陆，指西汉时的随何、陆贾，两个人都是汉高祖刘邦的高级谋士，能言善辩。“绛灌”是指西汉时降候周勃和灌婴，两人都是刘邦手下功勋卓著的武将。

开始，许世友不晓得周勃是何许人，也不明白毛泽东要他看《周勃传》的用意。到广州后，我从新华书店给他买了《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他认真阅读了《周勃传》，才知道周勃是秦末汉初的名将，他为人厚道，没有文化，年轻时随刘邦起兵，平定了天下，建立了王朝，被刘邦封为绛侯。刘邦病重时曾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死后，吕后的死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和丞相陈平一起把诸吕灭了，保住了刘氏江山。



和夫人田普一起学习

读完《周勃传》，许世友反复琢磨毛泽东要他读这本书的用意。琢磨了半天，他意识到毛泽东这时要自己读《周勃传》，是把我当成周勃了，他是在指示我，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篡党夺权。可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又有什么人要篡党夺权呢？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思考的严重问题。许世友曾说："1974 年'批林批孔'中，'四人帮'不批林不批孔，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这就擦亮了我的眼睛。毛主席讲周勃，而江青却大讲吕后，分明是同毛主席唱反调嘛！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的篡党夺权野心，这就引起了我对他们的高度警惕。后来，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我心中更加有数了。"



1984 年邓小平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牢牢记住了《周勃传》中“周勃除吕安刘”的故事，牢牢记住了毛泽东对他的嘱托，如果有人胆敢篡党夺权，他就要做周勃。

1976 年春天，“四人帮”乘毛泽东病重，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邓小平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便恶意诬蔑陷害邓小平，把邓小平打了下去。许世友愤慨之极，他要给“四人帮”一点“颜色”看看，挥毫写下了声讨诗一首：

娘们秀才莫猖狂，三起三落理不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诗中的“诸葛亮”喻指邓小平，“娘们秀才”指“四人

帮”。这首诗痛快淋漓，不仅表现了许世友对“四人帮”的仇恨，而且明确表示了他要与邓小平一道，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决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成熟。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并以毛泽东的战友自居，要求大家以后要多“请示报告”。许世友越听越不对劲，他感到眼前这个张牙舞爪的江青，就是吕后式的人物。此刻，他猛然想到了周勃，想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嘱托。他厉言责问江青说：怎么从来没听主席说过“临终嘱咐”？是不是有人添油加醋？

江青当众受到指责，气急败坏，大骂许世友，还说：“你有种开枪打死我啊！”

许世友拍案而起，寸步不让：“你若再敢胡编乱造，老子就枪毙你！”

江青一伙被许世友咄咄逼人的架势震住了，他们深知许世友的脾气，一个个既恨又怕但不敢做声。

不久，北京传来重大喜讯，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拍手称快，许世友兴奋不已，连说两声：“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啊！”在庆贺酒宴上，他高举酒杯，操着大别山口音，背诵了四句诗：

世上生灵作孽多，功名富贵反成魔。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四句诗本不出自一首完整的诗或词，后两句是《红楼梦》里的词句，前两句出自哪里，我没有细考。许世友能够信手拈来，并恰如其分组合起来，用以讥讽“四人帮”的可耻下场，足见他在读书和运用上，确实有精妙独到之处。

十四

立場篇

● 戎马一生的许世友，几乎经历了我党我军所有的政治斗争事件，饱经世事沧桑，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

比起那些科班出身的领导人，许世友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但一生历经政治风雨的洗礼，养成了他超强的辨别真伪的能力，虽然很多时候他并不善于言辞，但他的心中有一杆秤，称得出轻重，辨得出真伪。

1975 年夏天，我随许世友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住京西宾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部署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积存的“肿、散、骄、奢、惰”五个方面的问题。复出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居中而坐。他主持会议，从他讲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要彻底整顿军队的决心。而同样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却始终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一副失意的样子，看得出他对整顿的抵制和不满。许世友和参加会议的老将军们早就对林彪、“四人帮”干扰部队工作所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军委决定对军队进行整顿，使他们倍感振奋，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可是会议快结束的一天晚上，许世友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那天晚上已经夜深了，许世友来到我的房间。坐下后，一改往日的神态，非常严肃也非常郑重地交代任务：“孙秘书，你代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就讲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有光荣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富的革命经验，这些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创造出来的。但是老同志越来越少了，乘着大多数还健在，要组织人抓紧时间写我们的党史、军史，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培养接班人的好教材……”许世友显得相当激动，我连夜写好信件，交许世友签字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送达毛泽东。几年后，党中央做出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写好组织史，中央军委也要求各级写好部队史，实现了许世友的愿望。

后来，我才知道，许世友当晚是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回来，指示我代他给毛泽东写信的。许世友说：“我到医院去看望周总理，他问我有没有看到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文章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我们老干部的，是对着我们这些人的。”

回到广州后，许世友大会小会讲革命传统，讲革命经验。他说：“先烈们的血如果是黄河水，也能流两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是我们的传家宝。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还会管用。打下江山不容易，巩固江山也不容易。反革命过去有，现在有没有？我看有，我们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守好南大门。”这些话无疑是针对“四人帮”的。

1975年底，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全国又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反经验主义”是“四人帮”射向老一辈革命家的毒箭，想借此打倒一大批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同志，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许世友接到“反经验主义”的中央文件后，闷闷不乐，一整天不出门散步，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不停地踱步，到了晚上也是辗转难眠。他把我叫到房间：“孙秘书，你给我写篇

文章。”

“写什么文章?”我问。

“什么反经验主义?我看是别有用心的。干革命没有经验能行吗?那些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的人能管理好国家吗?反经验主义无非就是反对老同志嘛!天下是老同志打下的,他们不就是要清理老干部吗?他们反经验主义,我就反教条主义!”许世友气呼呼扔下一堆疑问句走了出去。

按照许世友的交代,我反复思考,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毛泽东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论述,我在文章中陈述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强调“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东西,两个都要反,不能只反一个,大约3000字,用自己设计的120字稿纸誊写一遍,第二天上午与文件一起呈送给许世友。许世友看完后把所有文件都退回来,“文章先放在我这里,下午开会要用。”

下午开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反对经验主义”的文件。

“文件先放一放,我先给大家念一篇文章。”

会议刚开始,许世友就把那篇文章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参加常委会的领导面面相觑,有些发愣。看着大家难以琢磨的表情,许世友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早就说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东西,现在为什么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教条主义?老同志老革命都下去了,谁来领导革命?希望同志们认真思考问题,站稳革命立场。”一次常委会让许世友演了独角戏,其他人没有机会也不好再做什么表态。

反对经验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但事实证明，这次浪潮只不过是“四人帮”一手炮制的针对老同志的恶流而已。

1976年初，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和邓小平的被撤职，“四人帮”更加嚣张，政治局开会，常常不通知许世友参加。这段时间，许世友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说：“‘四人帮’利用合法权力整人，与他们斗不那么容易。他们在北京开会，通过了决议还让你表态，说同意是违心的，说不同意，他们就说你反对中央。”

1976年2月，中央办公厅给许世友寄来中共中央（1976）三号文件，内容是转发中央军委对1975年六、七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审查报告。我拆开信封，看到文件首页上方还注有一行小字：“此件已经在京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毛主席已圈阅，现征求许世友同志意见”。

对这行小字，我深感不解：许世友本是在军队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而三号文件涉及的又是军队方面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许世友到会讨论，而要用寄件的方式征求意见呢？不解归不解，我没有多说什么，就把文件呈送给了许世友。

“他们已经通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许世友气呼呼地把文件扔到一边。

“中央办公厅还等着您的意见呢。”我轻声提醒他。

对这个文件，许世友确有一肚子意见。他认为，1975年六、七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得很好，邓小平、叶剑英抓住了部队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会议的决定抓落实，使部队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又要审查，又要清理，清理什么？这显然有人在捣鬼！当然，他这些意见只能憋在肚子里，不能端出来。

“告诉他们，就说我看过了。”许世友说。

既不说有意见，也不说没意见。不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只是不明说而已。

● 江青攻击陷害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阴谋伎俩常使许世友恼火，只是碍于毛泽东的面子，他才没有发作

许世友到广州后，江青曾试图拉拢他，但没有得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江青派几个作家和诗人给广州军区送批林批孔材料，还给许世友和广东省委一领导写了一封亲笔信。江青在信中称她和许世友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不同的战线上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尽管江青在信中讲得非常动听，但许世友不为其所动，他对江青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和警惕。他看完信，只在信的开头“许世友”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就撂在一边了。军区有的领导认为，江青捎信送材料，是对军区的信任和关怀，建议军区党委组织学习江青的信，并把学习情况专题报告江青。许世友冷冷地说：“往前靠什么！信是写给我的，我不回信，也不用给江青个人写什么专题报告。”其实，许世友根本看不起江青。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表现，特别是她攻击陷害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阴谋伎俩，常使许世友恼火，只是碍于毛泽东的面子，他才没有发作。



1984 年和杨尚昆亲切交谈

1976 年 6 月，我随许世友在湖南视察部队。一天早晨，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绝密电报，送到了许世友的手上。电报通报了毛泽东日益恶化的病情，是专发给京外的政治局委员的。许世友看完电报，心情异常沉重，他取消了视察计划，提前返回广州。他把自己关在楼上，整天整天足不出户，连文件也看得不像以前那么用心了。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太深了，他无法相信但又不得不面对毛泽东病重的现实。终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亲自把门关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条递给我看。那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记录着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大概内容是：江青不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搞团结，却和上海的三个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帮”；江青积怨甚多，动不动就骂人，给人戴大帽子，骂人不是马列主义；江

青有野心，她想组阁，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她将来会闹事的；等等。

看完后我心里一阵惊悸。那年代，“四人帮”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传看这样的东西若被告发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我思量着是谁把纸条送给许世友的？是不是有人在向他打招呼？为什么许世友要把这样高度机密而又敏感的东西交给秘书看呢？这时，许世友重新把纸条折好，放回上衣口袋，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周总理被他们害死了，小平同志又被他们打倒了，如果毛主席不在了，他们可能要翻天了！”许世友一连说了三声“他们”，声声都直指“四人帮”的罪状。看来许世友确实已做好了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准备。如今毛泽东病情突然恶化，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提醒他：还得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吹吹风，让他们也要有所准备，在复杂斗争中站稳立场。

1976 年 9 月 9 日凌晨，许世友接到了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他当天乘专机赶到了北京。悼念了毛泽东之后，许世友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俨然以女皇自居的江青以为时机已到，在会上先入为主地说：主席逝世了，作为主席的战友，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今后，凡重大问题大家要多请示报告……

许世友听着江青不知天高地厚的发言，猛然记起毛泽东生前要他读《汉书·周勃传》的那次谈话，记起书里讲的那个吕后，又记起毛泽东“江青有野心，将来会闹事”的告诫，心想她果然跳出来了。许世友不由得怒火中烧，什么也不顾了，他“啪”地一拍桌子，质问江青：“你这话什么意思？”

江青一愣，狠狠地瞪了许世友一眼。

许世友正义的一声吼，顿时灭了江青的威风，也灭了“四人帮”的威风。

许世友给张春桥画像：“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定的《许世友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

许世友对“四人帮”特别是对张春桥，一直表现了强烈的反感情绪。“我早就看出张春桥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世友常挂在嘴边，讲了好多年。

“早就看出张春桥不是个好东西”，不是说许世友有先见之明，这话里多少带有一些感情色彩。许世友和张春桥，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俩的感情不会好，也好不了。虽然在一些场合见面时，两人也握手问候，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客套而已。1975 年 7 月，许世友和张春桥都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两人在走廊上见面时，张春桥主动上前跟许世友握手问好，甚至拥抱了许世友。对张春桥这种虚伪的逢场作戏，许世友反感至极，但他并没有把张

春桥当众推开让张春桥尴尬。

在“四人帮”里，张春桥不如王洪文地位显赫，但比王洪文老辣；不如江青地位特殊，但比江青奸猾，他是个摇“鹅毛扇子”的角色。对于专横跋扈的江青，许世友敢于当面说“要枪毙她”，但对老谋深算、藏而不露的张春桥，许世友却很少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1958年在南京聆听毛主席指示

张春桥总是在背后算计许世友，许世友则时时处处提防着他。

许世友和张春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结的怨。冤家路窄，两人多次发生碰撞，怨仇越结越深。

1967年春，南京军区党委就“三支两军”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中央做过一次检查。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指责南京军区的检查“上纲上线不够”，企图把许世友和南京军区党委一棍子打死。周恩来听说后指出：“上纲太高了，往军队脸上抹黑，只能使阶级敌人高兴。”由于周恩来出面说话，张春桥才悻悻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指挥造反派搞夺权，怕警

备区不支持，向党中央发电报，要求调二十七军进驻上海，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许世友坚决不同意，也给中央发电报，电文是他口述的："春桥建议不妥，如果二十七军进驻上海，将陷于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我的意见，二十七军仍留驻苏南，如果国外反动势力挑衅和干预，我带领七十九师，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可抵达上海，投入战斗。"

毛泽东在许世友的电报上批了两个字："同意。"

张春桥想把二十七军抓到手的目的没有达到，对许世友记恨在心。

张春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认为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惯于背后搞鬼，很瞧不起他。在军区一次工作会议上，许世友即兴编了一首顺口溜，讽刺张春桥："有人戴眼镜，提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这首为张春桥画像的顺口溜，惟妙惟肖，形象逼真，迅速流传到全国。尽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中，戴眼镜的不止张春桥一人，但大家只要用两只手圈成眼镜状一比划，都知道那是专指张春桥。

张春桥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不久，上海突然刮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张春桥的大字报：

"张春桥在历史上就是大叛徒！"

"张春桥是上海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

"彻底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心里有鬼，慌了神。他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名义，要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警备区领导请

示许世友，许世友说："贴几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部队要稳定，为个人的事不能派兵！"张春桥找江青告状，江青向林彪求援，林彪给许世友下了一道阴阳怪气的指示："你们要处理好这件事。"许世友和政委杜平商量后决定，兵还是不能派，只给部队发个电报讲一下。

机关起草的电报稿送到许世友案前："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极端错误的。"许世友一看就不高兴："写得这么啰唆！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拿起笔，把前两句划掉，又把"极端错误"改成"不对"，整句话就变成"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不对的"，签上名发走了。

"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是不对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是而非。不管怎么写，电报下发部队的同时，必定要抄送张春桥一份。惯于舞文弄墨的张春桥一看便知，电文绝非出自一般秀才之笔，肯定气不打一处来。

1968 年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通车典礼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片里有许世友的一些镜头。张春桥看过后，自以为抓住了攻击污蔑许世友的把柄，主动向许世友发起了一次攻击。

南京长江大桥 1958 年勘定，1960 年动工，由于多方面原因，干干停停，到 1968 年还只建了几个没完工的桥墩立在江水中。许世友当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决心恢复建桥。他在革委会提出：要排除一切干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机械给机械，在年内建成大桥，向国庆 19 周年献礼。

许世友言出即行，抓落实如闪电。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建桥大会战，把全省优秀的模板工都集中到大桥工地。施工紧张阶段，他把整团整团的工兵部队调上去，日夜施工，终于在1968年国庆节前夕，建成了大桥铁路桥。年底，又建成了公路桥，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建设的重大成就。通车典礼很隆重，也很热闹。许世友出席了庆祝大会，并在通车典礼上剪了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但许世友却一直没有看到。不久，许世友到北京开会，张春桥主动凑到许世友面前，阴阳怪气地说：“许世友同志啊，你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和庆祝大会上的镜头很突出嘛，你是想在华东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吧?”

许世友一听，毫不客气地厉声回击：“放你妈的狗屁！你别血口喷人，你才想搞‘以我为中心’，想当‘华东王’呢!”

张春桥本来就理亏，他看到许世友虎着脸，骂声不断，自知再说下去也沾不到什么便宜，便悻悻地走开了。

张春桥当面不敢顶撞许世友，便施展他的惯用伎俩，背后指示有关部门，不准放映这部纪录片，说这是为许世友树碑立传。

面对面污蔑许世友想当“华东王”却碰了一鼻子灰，对于老谋深算、藏而不露的张春桥来说，可谓是一次不多见的“冒失”，大概他是按捺不住自己的阴暗心理，冒了一炮。

而许世友则愤愤地斥责张春桥：“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想拉什么屎，他只会拉山头，搞宗派，臭架子不少，没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情面上，我一拳一脚就能打倒他!”

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是两人性格不合，也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从深层次上分析，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谋的斗争。张春桥虽曾权极一时，但总归邪不压正。许世友虽然说不过张春桥，讲理论更不在行，但他真理在手，敢发火，敢骂娘，再加上有毛泽东“偏爱”，张春桥始终拿他没办法。

● 许多人认为，许世友是个重武轻文的“粗人”，其实他粗中有细。他对政局的透彻了解和驾驭局面的高超技巧，远非常人能及

许世友曾被毛泽东格外倚重，授以高位，委以重任。在众人眼里，许世友是个“厚重少文”、没有多少谋略的周勃式的武将。

许世友曾怒骂江青、张春桥，也曾带枪进出人民大会堂。在众人眼里，许世友是个性格粗暴，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粗人”。

其实，这都是误解。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三年，深感许世友小事不在意，大事不糊涂，善于以特有的方式和技巧，轻车熟路地驾驭政治局面。在许世友的身上，体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的聪明和智慧。他看上去没有多少文化，但恰恰这一点，使他少了一些文化人的迂腐和执拗。他的脑子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但对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土生土长的、又特别管用的东西，却非常熟悉。这比那些表面上聪明，且能说会道的有理论的文化人，更多了一些优势。



遥想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情景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厚重少文”的“粗人”许世友，从中央委员一跃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引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瞩目。1982年9月，许世友在担任了三届共14年政治局委员之后，正式退出了中央政治局这一党的核心领导机构。14年中，我们党经历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灭亡，还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之初，党内在思想领域里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可以说，这是党内斗争最复杂、最频繁的时期之一。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都曾对许世友又拉又打。但许世友却拉而不去，打而不倒。历经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多少人在风云变幻中起起落落，而没有多少文化的“粗人”许世友，却稳稳当当，无惊无险。

其中奥妙何在？许世友自有规则。

规则之一，任何时候都绝对忠诚于最高领袖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在总结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

团的经验教训时，全党全军全国曾广泛流行两句“政治口号”。一句是：“不要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拉车”是指干工作，“看路”是指认清政治方向。这一口号警示人们，如果只顾埋头干活，而不认清政治方向，就可能会糊里糊涂犯错误。第二句口号是：“不要只跟人，不跟线。”这里所讲的“人”，特指林彪、“四人帮”一伙，“线”，是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句口号提醒人们，要正确理解并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能盲目紧跟某些个人，否则，就要犯错误，摔跟头。

在许世友看来，“拉车”和“看路”，“跟人”和“跟线”，一点也不矛盾。许世友认为，方向和路线都是全党公认的领袖毛主席制定的，紧跟毛主席，就是紧跟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而紧跟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必须紧跟毛主席，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许世友的这一认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成功的实践使他坚信，在中国，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无人可比，别人谁也不能代替。二是毛泽东曾两次救过许世友。一是在延安清算“张国焘路线”时许世友受牵连，有人主张要枪毙他，毛泽东行使了否决权；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受造反派冲击，避难大别山，毛泽东亲自指示把他全家接进中南海保护起来。两次相救之恩，让许世友一辈子感恩戴德，刻骨铭心，认为毛泽东是最值得信赖和拥戴的领袖。许世友多次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毛主席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就是我下辈子也报答不尽。我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生为毛主席生，死为毛主席献身”。

毫无疑问，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首推毛泽东。由于对毛泽东无与伦比的忠诚，许世友对毛泽东的话，都深信不疑，对毛泽东的指示，都坚决照办。有一则资料介绍如下：

1964年，毛泽东问许世友：如果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许世友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消灭他，不管他是谁！毛泽东大为满意，称赞许世友党性强。“文革”之前，毛泽东曾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我就带兵北伐。毛泽东又称赞许世友的屁股始终坐在无产阶级一边。

许世友初到广州时，我多次亲耳听他在大会上讲：“毛主席指到哪，我就打到哪。这次调动，毛主席要我一个星期内报到，我三天就来了！”

对于许世友的绝对忠诚，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自然是倍感欣慰和珍惜。毛泽东对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许世友了如指掌，因而对许世友就格外倚重和信任，绝不允许任何人加害他。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曾把许世友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绊脚石”，千方百计要清除他。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把他保护起来。

由此看来，还能说许世友是个“粗人”吗？他比那些整日琢磨“看路”和“跟线”的精明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规则之二，保持政治上的低姿态。

一生沉沉浮浮，在党的“九大”后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的许世友，深深懂得“高处不胜寒”。他经常说：“出风头，抢镜头，站前头，最后就要吃苦头。”他需要营造一种政治上的低姿态。

许世友在位高权重时曾声明："活着尽忠，死了尽孝。"退居二线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又声明："一不顾，二不问。"这两个"声明"，是许世友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的精明之作。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是许世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公开讲"忠"讲"孝"，很容易使人把他与封建时代的忠臣孝子联系起来而招惹非议。事实上，早年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许世友，始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红军曾经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许世友不可能"纯而又纯"。他和许多领导人一样，是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终究不能彻底摆脱掉中国农民的那种世俗人情的烙印。然而，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世友，毕竟与封建时代的"忠臣孝子"截然不同。许世友赋予"忠"、"孝"全新的意义。他解释说："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老母亲看坟。"他这种特定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饱含着悲壮，透露出机智。

从延安清理"张国焘路线"时许世友受审被毛泽东救下，与毛泽东结为生死之交，到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点将，委任许世友为攻城总指挥；从"文化大革命"许世友受冲击避难大别山，到毛泽东亲自发话，把他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从毛泽东请许世友参加1967年的国庆观礼，到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一生革命实践的轨迹，确定了他必定要把忠于全党的领袖毛泽东，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视为一体。而在老母亲面前，他感到亏欠的太多，他要当一名凡夫俗子，做一名普通孝子。

对此，有一位研究学者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见解："活着尽忠，

死了尽孝”，这句表面上涉嫌犯忌的话语，许世友敢于常挂在嘴边，除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在政治上的机警与精明，他对政局的透彻了解和驾驭局面的高超技巧。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话中有话，话外之意清清楚楚地表示：他这个人没有政治野心，对别人构不成威胁，用不着提防他。

粗也？精也？精明之至也！

还有“一不‘顾’，二不‘问’”。1980 年，许世友虽不再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但并未一退到底。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奉调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这一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之一。

进京做官，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但许世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却主动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请假报告。理由有两条：一是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到南京组织人员帮他写回忆录。许世友的请假报告，很快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他名正言顺地、远远地避开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北京，住进了南京他曾经住过的中山陵 8 号。

党的十二大，新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使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逐步过渡到退休制。会上，许世友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一职务的规格，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却在会上出人意料地声明：

一、我这个副主任是一不“顾”二不“问”。

二、我也不住北京，要住到南京去，找几个人帮我写回忆录。

许世友干脆来了个要退，就退个“一步到位”。

许世友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假来南京，理由是写回忆录。可回忆录写好并已经出版后，他依然住在南京，一直住到去世。

许世友这两个“声明”，也可以说两次重大选择，无疑是极其精明和睿智的，是一般的“精明人”难以企及的。许世友的“粗”，其实是一种高超的精细。

规则之三，“不发牢骚”。

牢骚，古今有之。为官常发牢骚者，下级哂之，同级避之，上级烦之。而许世友把“不发牢骚”，作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去把握。

这方面，他有深刻的体会。当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许世友亲身经历了那场残酷的“内斗”。许世友常跟我们说：“张国焘搞‘肃反’惊心动魄，一片白色恐怖，错杀了不少人，弄得人心惶惶。有时干部们碰在一起，免不了要议论几句，发几句牢骚。白天发牢骚的，夜里就被抓走，有的天不亮就被处决了。”

许世友在大“肃反”中，不但没有受牵连，反而步步高升，这在红四方面军中特别引人注目，其中有什么奥秘？许世友高兴时，会跟我们谈起那段往事。他说：“红军那阵子我提升得快，主要把住两条：一是打仗勇敢不怕死，与其被自己人杀掉，不如战死在战场上，还可以当烈士；再就是不发牢骚。打仗就打仗，不打仗就是喝酒、睡觉，不参与议论那些事，肃反就肃不到我头上。”

同时，许世友也有沉痛的教训。在延安抗大清算“张国焘路线”时，因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的言语，引起许世友的不满。一贯“不发牢骚”的许世友实在憋不住了，他主动跳出来，

不但大发牢骚，还组织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准备秘密出走，酿成一个“大事件”，差点丢了脑袋。若不是毛泽东出面相救，就可能没有许世友的后来，许世友对这次教训刻骨铭心。

由此，许世友把“不发牢骚”，一直作为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好习惯，无论政治斗争多么复杂，潮起潮落、沉沉浮浮，他始终遵循“不发牢骚”的原则。他惜言如金，尤其对敏感的政治话题，他更不在背地里说三道四。

有人曾说：“许司令在毛主席面前像个晚辈，不拘束，有话敢讲。周总理像个大兄长，许司令在周总理面前比较随便，有话也敢讲。在林彪面前，许司令从来不乱讲话，问一句，讲一句，毕恭毕敬。”

“不发牢骚”，就远离是非，远离是非，就远离灾祸。许世友的一个老部下曾直言不讳地评价：“不要以为许司令是个粗人。他是倚粗卖粗，粗中有细，特别精明。对世态万象，别人不容易看透，他心里却明镜似的。关键时刻，他知道该怎么做。许多干部也很精明，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上精明，跟许司令比起来，比不了，不在一个档次上。”

此话极当。

十五

作战篇

西沙之战爆发，许世友一改往日在家里办公的习惯，整日守在作战室里，胜利地指挥了这场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的战斗

许世友在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任上，指挥了保卫西沙和自卫还击两次作战。

许世友来广州不到一个月，西沙之战爆发。在这之前，南越军队在我南沙、西沙群岛频频挑起事端。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该国版图，甚至在岛上竖起“主权碑”。

1974 年 1 月 15 日，该国当局悍然出动军舰、飞机，侵犯我西沙群岛的领海、领空，强占永乐群岛，并向我军正常巡逻的舰艇和岛上渔民进行轰炸和炮击。为捍卫我国主权，坚决打击敌人的武装挑衅，广东省南渔 402、407 号渔轮和驻岛民兵与南海舰队、海南军区有关部队，对武装入侵之敌进行了英勇抗击，击沉敌舰一艘，击伤三艘。这次海战，是我海军第一次同外国海军作战。20 日，我舰队航空兵出动数十架次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潜艇在水下游弋巡逻，水面舰艇混合编队运送步兵登陆，一举收复了被占领的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许世友作为广州军区司令员，指挥了这场一定程度上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的战斗。

平时，许世友很少到军区办公大楼上班，他的卧室兼办公室，



与叶剑英在南京长江大桥上

一般情况下在家中处理公务。西沙之战爆发，他一改往日的习惯，整天坚守军区作战室，随时掌握前线情况，实施正确指挥。当时，来自前线的电报特别频繁，几乎十几分钟就有一份，前线的每封来电许世友都要亲阅。军区上报军委的电报也特别多，每报都要许世友签发。许世友精神焕发，要求军区机关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切莫误了军情。

一天凌晨3点多钟，我忙碌了大半夜刚进入梦乡，加密电话响了起来。在寂静的深夜，铃声格外清脆和急促。我一翻身从床上跳下来，抓起了话机。电话是中央军委一号台打过来的，指明要许世友司令员亲自接听，说叶剑英元帅找。许世友的卧室兼办公室在二楼。他的办公室从不装电话机，这是他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何人来电，需要他亲自接听时，由秘

书叫他。有些重要电话，即使深更半夜打来，搅醒了他的睡眠，他也从不生气。此时，我跑上二楼敲响了许世友的门，已经入睡的许世友听了我的报告，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件衣服，快步走下楼来拿起了电话机。我则按照惯例，守在一边，根据许世友的通话内容进行电话记录。

“喂，是叶帅吧?”许世友大声连问两次。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通信设备差，影响通话质量，加上晚年许世友的耳朵有些背，声音小了他听不清，因此，他说话时也总是怕别人听不清，声音特别高。

待听清对方是叶帅后，许世友说：“叶帅，我是老许，请您放



视察海南军区某炮兵部队

心，收拾这一小撮侵略者，小菜一碟，我很快就把他们赶回老家去，西沙是我们的，请您转告毛主席，也让他老人家放心……”

我军民在短短的时间里，收复了被占岛屿。西沙保卫战的胜利，打灭了该国当局企图侵占我领海、领空和岛礁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许世友以74岁高龄，亲自指挥了广西方向的自卫还击作战，再一次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立了新功

西沙保卫战五年后的1979年2月份，我国又胜利地进行了一次自卫还击战。这次作战分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许世友作为广西方向的总指挥，再一次为捍卫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立了新功。

早在自卫还击战前的好几年，该国当局就蓄意在边境闹摩擦，屡屡制造骚扰事件。为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地区和平稳定，我国政府一再忍让，有时还强调“同志加兄弟”，要巩固“牢不可破的友谊”。但该国当局却变本加厉，在边境地区抢我耕牛，毁我庄稼，杀我边民，偷偷地把界碑向我国境内推移。这时的许世友，以他独具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准确地观察判断了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势。在一些场合，许世友多次提醒说：“我闻到有股火药味。什么‘牢不可破’，我看是牢不可靠；什么‘同志加兄弟’，我看是小兄弟要欺负老大哥！”他指示军区部队特别是广西边境一线官兵，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投入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不出许世友所料，自卫还击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自卫还击战前夕视察炮兵阵地

1979年2月12日下午，许世友在南宁西园召开作战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打仗，小平同志点了我和杨得志的名。部队有二三十年没有打仗了，不打则已，打一定要打好，不打好是不行的。叫你打下，就一定要打下，打不下，那是要杀头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多少牺牲，都要把这一仗打好。"

反击战全面打响后，广西方向部队展开得不很顺利，推进速度比云南方向要慢。两线作战，是一场不比赛的比赛，指挥部里的人都急得直转。许世友却不慌不忙，指示部队要按预定作战方案打，困难再多也要打，谁打得不好，就找谁算账。部队打下谅山

后，中央军委命令撤兵，许世友却迟迟不肯下命令。他说：“仗刚刚打顺手，不用两个小时我就能打到河内。”他派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十公里，吓得该国党政机关纷纷撤出河内。许世友得到报告很开心，这才下令班师凯旋。

自卫还击战结束后，许世友感慨地说：“自古以来，都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打仗就是要消耗财力、物力、人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换来的是祖国的尊严，边界的安定，这是值得的……当然，我们连这次还击战也不愿意打，更不愿今后再和这个国家打仗，但愿这是两国之间的最后一战。”

如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早已全面恢复了友好交往，边境线上的千里雷区被复耕为良田和果园。许世友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了。

十六

离别篇

许世友对我说："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进院校深造。"

1976 年 8 月，我离开许世友，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到新单位报到前，许世友把我叫到会议室，两人相对而坐，进行了我到留园 7 号后第一次正规而深情的谈话。我为许世友的深情所感动，永远把那次谈话定格在了脑海里。

那天，许世友一改往日交代工作时的严肃表情，充满着温情和关爱。就像一位严厉而不失慈爱的父亲，对将要出门远行的孩子的鼓励和叮嘱。许世友语重心长地说："胖子，我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去院校学习深造。"许世友话语一转，又来了段对我工作的评价："你在我身边工作差不多三年了，大错没出，大情没漏，我是满意的，就给你打八十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听到这儿，眼眶一下就湿润了。想到当初自己这个新兵，既缺乏生活阅历，又没有多少工作经验，担任许世友的秘书能达到及格水平就算不错了，想不到许世友竟然给我打了八十分，这显然是首长对我的鼓励啊！

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三年来的许多往事。尤其是那些由于自己有时粗心大意，有时把关不严造成工作失误，或因为自己年轻气盛、说话不当，冒犯首长的几件



作者随许世友在某炮兵部队

往事，像过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闪过。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4年初，我到许世友身边工作不久，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来广州，下榻珠江宾馆。这天，王诤通过珠江宾馆的领导打电话，说要来看望许司令。因为王诤的“诤”与王震的“震”两个字发音相近，我未加思索，就以为是延安时期担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来了，马上报告许世友说：“北京的王震同志到了广州，他要来看望您。”

听说王震来了，许世友非常高兴。王震可是当年毛泽东倡导的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杆。战争年代他虽然没有和许世友在一个部队共过事，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许世友对王震的来访非常重视，对我说，“王震同志是湖南人，通知食堂，加几个辣子菜，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

一切安排停当，许世友亲自到门口迎候。我以前从没见过王震和王诤，客人到来后，我仍把王诤当成王震，此时却发现许世友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变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深感惑然，但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晚饭后，许世友送客人下楼。我陪许世友一起将客人送出了大门口。转身回来，许世友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真是个笨瓜，连王震和王诤都搞不清楚。他是王诤，不是王震！"我这才认识到由于自己粗心大意，凭想当然断定，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许世友接着告诉我说："王诤是我军的通信专家，早在红军时期，就是红军总部通信大队长。幸好我和王诤同志也熟悉，要不非出洋相不可。"许世友平时骂人"笨瓜"而不骂"笨蛋"，他认为"笨瓜"不算骂人。

许世友对我的这次失误没作太多指责，丢下一句："以后要把情况搞准了再报告，不要张冠李戴"，就上楼去了。

第二件事是1975年秋天，许世友在外地服役的儿子回到广州。许世友正好视察部队去了，留我在家值班。许世友的儿子向我提出，要开许世友留在家中备用的吉普车，去看望在外地上大学的妻子。

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许世友回来随时要用车，二是他儿子要去的地方路途遥远，担心路上安全有问题。这时，他儿子又要求我想办法在部队找一辆车用。我感到很为难，提出这事要先向许司令报告，许司令批准了再想办法找。他儿子明白，一旦让许世友知道将意味着要车的事泡汤，他不赞成报告，自己和司机到军区机关车队借了一辆吉普车上路了。没想到，他们在途中撞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他们还没有回到广州，撞牛的消息就传到了军区机关车队，车队报告了管理局领导，最后传到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许世友本来对子女要求就很严格，他从部队回来知道这一情况后，顿时火冒三丈。他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胖子，是你给那小子派车了？"

"不是我派的！"我解释道。

许世友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说不是，我看就是你派的，你是罪魁祸首。"

后来，许世友了解到车的确不是我派的，仍一脸严肃地说："你不是罪魁祸首，也是最大的帮凶。你不要给我帮倒忙。"

听着许世友的训斥，我感到自己确实没有把工作做好。虽然没自作主张派车，但首长不在时留我值班，就应该坚持原则，替首长把好关，可自己没有做到。

我第三次失误发生在197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上午，许世友交代我两天之内从海南买一千个椰子运回广州。许世友到广州后，就喜欢上喝椰子汁，每天中餐和晚餐后，都要喝上一杯，餐后一杯椰子汁代替了以往的一杯清茶。当年还没有"绿色食品"这个名词，许世友形象地称椰子汁是"天然饮料"，既卫生又有营养。那时，工作人员要定期为他买椰子，可从没有一次就要买这么多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帮北京的一位首长买的。

买一千个椰子容易，但两天之内从海南运回广州可就难了。当年的交通状况非常落后，别说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高速公路，就是状况较好的省道和国道，路面也是狭窄不平，汽车无法跑快。广东又是高密度的水网地区，江河上的桥梁又很少，汽车行驶到江河边，只能靠轮船摆渡，汽车在渡口排队等候摆渡，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不要说过江跨海去海南，就是单程去湛江也得

两天。

我分析了当时的交通状况后认为，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两天内把椰子从海南运到广州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空运，我想到了空军广州岑村机场专用于运输的“运5”飞机。

于是，我马上与有关单位联系，动用“运5”飞机事宜。

很快，军区作战部、广州军区空军调度室，以及岑村空军机场就反馈回信息，他们都说：海南机场现缺少“运5”飞机的航空煤油，飞机可以从广州飞海南，但在海南加不上油，再飞回广州油就不够了，若强行起飞，保证不了飞机的安全。

我把情况如实报告了许世友，说明了两天之内很难将椰子运回广州的理由。许世友听后说，那就算了。

我以为这事真的就算了，可到了中午，许世友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也不进门，铁青着脸，一改往日见面叫我“胖子”的称谓，怒声责问：

“孙秘书，你说没有航空煤油，据我了解是有的，你想干什么?”

我回答说：“首长，我了解过军区作战部、空军调度室，还有岑村空军机场，他们都告知海南机场确实没有‘运5’飞机用的航空煤油。”

许世友更加恼火：“你官不大，僚不小，连这点事都办不了，还能干什么!”

我听后顿感紧张，心想，难道是我搞错了?

许世友走后，我再一次与以上单位和部门核实情况，他们再次确认，海南机场确实没有“运5”飞机用的航空煤油。

我很纳闷：许世友并没有出门，他办公室又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他的情况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告知我：许司令另派人去岑村机场调查去了，遗憾的是去调查的人只问了岑村机场有没有“运5”飞机用的航空煤油，而没有问海南机场有没有，岑村机场当然回答“有”。因为情况没有搞准，他们回来后向许世友提供了不实情况，导致了许世友大发脾气。

此事我感到很冤枉。我想，是别人调查不实导致许世友对我发了脾气，如果事实不澄清，自己就要背“黑锅”了。为了让许世友了解到真实情况，我郑重其事地起草了《关于海南机场有没有‘运5’飞机航空煤油的再调查》书面报告，面呈许世友。

这个报告再一次阐明了海南机场没有“运5”飞机航空煤油的事实，同时说明了有关人员调查情况的不真实性。

许世友看完报告，脸色很难看，足足有三分钟没有开口。最后，他骂了一句：“这些饭桶，只会吃饭。”

这话像是批评去调查的人，又像是说给我听的。

海南机场没有“运5”飞机航空煤油的事实是澄清了，我因此而感到一阵轻松。然而，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许世友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报告”退回来，而是撕碎后丢到马桶里放水冲走了，许世友显然是真生气了。我追悔莫及：我真是犯浑，连这么点冤枉都经受不住。首长生气时别说批评几句，就是怒骂几句又算得了什么？而我却急于跟首长澄清事实，惹得首长生这么大的气。后来，我一想到此事，就为当年年轻气盛，说话太冲，处理问题不当而冒犯首长感到痛心疾首。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时

的这些失误，就感到内疚难当。如果自己考虑问题能够再细致一些，处理问题能够再周到一些，那该多好啊，可惜自己当时太年轻了。

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了近三年，因为许世友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后来去桂林军政干校（后改为桂林陆军学院）政治大队学习，之后回到军区机关工作，一直到后来担任某部正师职政委。对于我来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充满光彩的时光，也是我的境界得到质的升华的美好岁月。如今当年年轻的我，也已卸下戎装，但在我的心中，许世友的形象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与恒久：

铮铮铁骨，浩气长存。

● 许世友的墓前，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上千个空茅台酒瓶，前来悼念的人都带上一瓶上好的茅台酒，绕坟墓洒酒一圈，用这样的方式寄托哀思

我调离许世友身边后，仍回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工作。我时刻践行临别时许世友关于“要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工作”的指示，严格自律，勤奋工作，1985 年被上级任命为直属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这年 10 月份，我根据机关安排，带领工作组到驻湖北黄冈某部队，开展老兵退伍工作。当时，这个部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



许世友慈祥、勤劳的母亲

比较艰苦。计划退伍的三百多名老战士中，因病要求住院治疗的多，因家庭生活困难要求经济补助的多，想改志愿兵要求继续留队的多，各种矛盾和难点在退伍前集中表现出来，思想工作非常艰巨。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配合部队领导夜以继日地找老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仍感到时间不够用。

当退伍工作进行到了宣布退伍名单的关键时刻，10 月 23 日，南京传来许世友于 1985 年 10 月 22 日下午去世的噩耗。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把我作为许世友的生前友好，吩咐许世友治丧办公室，以她的名义专门打电话给我，大意是：许世友司令员不幸去世，关于许司令的后事，治丧办公室已根据军委指示，做了全面的、妥善的安排，对许司令在外地的生前好友，只发讣告，不一一邀请到南京参加悼念仪式。

听了许世友不幸去世的消息，我悲痛万分。我恨不得立即赶到南京，去见曾朝夕相处的老首长最后一面，能亲身参加追悼会，为老首长送行。可是老兵退伍工作到了最紧张的阶段，确保三百

多名老兵顺利离队，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作为工作组组长，若在这个时候走开，必定会给整个退伍工作造成损失。此刻，我想到在许世友身边工作时，许世友关于“任何时候都要工作第一”的教诲，决定先善始善终把老兵退伍工作搞完。我含着泪水，给许世友治丧办公室打电话，请治丧办公室代我给老首长敬献花圈，以表敬意和哀悼。接下来，我强忍悲痛，全身心投入老兵退伍工作，使三百多名退伍老兵平平稳稳、顺顺利利的平安返乡，使该部队被广州军区司令部评为“退伍工作先进单位”。许世友如果在天有灵，知道这一消息，定会感到慰藉。

然而，作为许世友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第一任秘书，没有亲赴南京为自己敬爱的老首长送行，始终是我今生的一大憾事。离开许世友之初，因首长工作忙，我很少去打扰他。许世友到南京定居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回想起来，我心里非常难过。

2008 年 10 月，许世友去世 23 周年，这年我 60 周岁。我不能再等了，我和我爱人申奎英商定，该到许司令的家乡看望老首长了。

带着敬仰，带着虔诚，带着几十年来的美好记忆，我和申奎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向许世友的家乡奔去。到了河南信阳，在我的老战友、当年在许世友身边当通信员、现在信阳市政府当局长的刘启亚的陪同下，来到了许世友的故乡——河南新县泗水店区许家衆。

许家衆在各级政府和家乡人民的关心支持下，已建成了以许世友将军雕塑像、将军墓、将军故居、许世友展览馆为主体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塑像、墓地、故居和展览馆，依照山势，由低到高，建在一个依山望水，两侧各有一座小山梁的缓坡上。站

在坡上，放眼望去，正前方展现着开阔的田野，一方方水塘，波光粼粼，一块块田地，泛绿吐金，好一块风水宝地。

我们沿坡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高大的、用花岗岩雕塑而成的许世友将军半身像。许世友身着1955年授衔时的礼服，披戴上将军衔，英气勃勃，令人肃然起敬。再往上走，就到了许世友墓，圆形墓包高2米，直径3.5米，拱形墓顶用水泥浇灌，墓基用花岗岩砌成，占地约100平方米。坟墓坐落在青山绿树丛中，没有任何修饰，只有一块高大的花岗岩石碑，矗立在墓前。石碑正面，不冠职，不记功，不叙史，简简单单镌刻着著名书法家范曾手书的七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



作者夫妇拜祭许世友墓

许世友墓的西南侧，是许世友父母的合葬墓，许世友墓与父母合葬墓紧靠，了却了许世友“死后尽孝，为母亲守墓”的最后心愿。

继续往上走，是许世友的故居和展览馆。故居里，许世友年轻时睡过的木床，以及他晚年要大儿子许光为他打制的棺木，都静静地停放在那里，已成了历史文物。展览馆里，陈列着许世友生前用过的物品和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展品中特别突出了“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史料。

在许世友的墓前，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上千个空茅台酒瓶，前来悼念的人，知道许世友晚年只喝茅台酒，便都带上一瓶上好的茅台酒，绕坟墓浇酒一圈，用这种特定的方式寄托哀思。我在敬献花圈之前，打开茅台酒瓶盖，恭恭敬敬地绕着许世友的坟墓浇酒一圈，空气中立刻飘散出茅台酒特有的醇香。我边走边浇，当年陪同许世友喝酒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老首长在天有灵，当知道“胖子”给他敬酒来了。

以前，我到过不少名刹古寺，一直坚持“三不原则”：不烧香，不跪拜，不占卦，在许世友墓前，烧香、跪拜、磕头，我全做了。我不相信世上有什么虚无缥缈的神灵，但我认为许世友是一颗救人出苦难的“红煞星”。如果这里有占卦的，我会破例占上一卦，求许世友在天之灵，保佑人民幸福安康。

许世友的堂孙许道炎，如今是这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主任。他饱含深情而又活灵活现的给我讲述了许多许世友鲜为人知的故事：

故事之一，邓小平为许世友土葬发放通行证。

这件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许世友生前曾声明，“活着尽忠，死了尽孝”。早在毛泽东健在时，许世友就提出了土葬的要求。那还是在1956年，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发出了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死后实行火化的《倡议书》。当时在《倡议书》上签名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领导，纷纷在倡议书上签字。当《倡议书》传到许世友手上时，他不仅不签名，还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葬的不理解。对于许世友的意见，毛泽东没有表态。

一晃29年过去了，整个社会对火葬已完全接受，即使普通百姓也不会提出土葬的要求，可偏偏许世友仍坚持要土葬。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任弼时、毛泽东没有火葬，谁还有胆量敢要求土葬？许世友要求土葬的报告，最后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邓小平最了解许世友的性格，最清楚他的功绩，但要求土葬确实令邓小平棘手。邓小平瞻前顾后，想到许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便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邓小平为许世友土葬签发的特殊通行证，又是特殊中的特殊。

故事之二，在向许世友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的同时，天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

许世友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10月31日下午3时。午饭后，按照治丧办公室统一要求，着新式军装的官兵，陆续来到军区礼堂外广场。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中，有士兵，也有将军。下

午3时整，礼堂内哀乐大作，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苏省、南京军区的领导人，以及许世友的生前友好，缓步走进礼堂，向许世友作最后的告别。几乎是在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的同时，刚才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瞬间突变，天空就像被一块黑布笼罩，乌云翻滚，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把列队等候的官兵们穿的新式军装浇得湿透。暴雨持续了二十分钟后，天空又是一片清朗。有人神秘地说："老天爷哭了，是为许司令送行啊！"

10月31日有雨，气象台早有预报。可这场大雨的起止，竟同告别仪式如此吻合，不得不使人产生"天人合一"的联想。

故事之三，一则所谓"千真万确"的传闻，从许家汆传到南京，给许世友的葬礼增添了几分神秘。

许世友的遗体入殓后，治丧办公室采取了严格的保卫措施，任何人不得接近停放灵柩的华山饭店16号楼。在许家汆，当地政府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措施，组织民兵昼夜站岗、巡逻，保护已挖好的许世友墓穴的安全。

据说这天晚上，月亮久久没有升起，夜色漆黑，秋风飒飒，树影重重，给这座坟穴四周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氛。开挖好的墓穴，向着深邃的夜空，静静地敞开胸怀。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如同流星一般，划破黑沉沉的夜空，曳着长长的光影，消逝在墓穴之中。

正在值勤的几个民兵，吓得魂不附体。

第二天，许家汆全村就议论开了这件事。一位辈分最高的老人平平静静地说："世友回来了。"

同时，南京的消息也传到许家衾，许世友真的于前一天在南京入殓。这则传闻，有人解释为自然界的“巧合”，有人破译为超自然的“感应”。许道炎说：“我们就把它当做一种幻觉、一种传奇吧！”

故事之四，随葬三件宝。

许世友的遗体入棺时，为寄托哀思，并参照大别山的风俗，征得田普的同意后，在灵柩里摆放了几件东西。除了他带了多年的奥米茄手表和天天听的收音机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件殉葬品。

第一件是一瓶茅台酒和一只小白玻璃杯。许世友一生喝酒，随葬品中首推此物。

第二件是一支猎枪。许世友戎马生涯六十年，酷爱打猎酷爱枪，理应有一支枪陪伴他于九泉之下。

第三件是一叠人民币，共计一百元整。

有人说，这三件殉葬品选得好啊，酒——壮胆，枪——打鬼，钱——买路。许世友走到哪里都会畅通无阻！

一个时代的盖世英雄走了，但他留下了说不尽道不完的传奇故事。

许世友，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

附录一

许世友同志生平

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世友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在南京逝世，终年80岁。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许世友同志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泗水店区许家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9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1927年8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8月下

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1936 年 7 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1938 年 10 月，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1939 年 2 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0 年 9 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1941 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2 年 2 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 10 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1945 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常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1947 年上半年，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同年 8 月，他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四个纵队又两个师，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潍（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 年 9 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同志于 1953 年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归国后，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许世友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

他奔波于海防前哨和纵深，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带头下连当兵，抓紧合成训练，重视部队作风养成。1964 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倡导下，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1974 年 1 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1979 年初，越南霸权主义者不断向我国边境挑衅进犯，许世友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不顾年逾古稀，在广西方向指挥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人民再立新功。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造反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其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许世友同志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 年 9 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许世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把毕生精力贡

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过一系列的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难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

许世友同志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组织观念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策。

许世友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祖国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许世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那坚强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新华社 1985 年 10 月 30 日）

附录二

我的军人生涯

许世友

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

我作为党的一个老兵，已经度过了60多年的军人生涯。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马岗区许家傢（现属河南新县）。自古以来，河南和湖北为兵家用武之地。从我记事起，军阀连年混战，你打他，他打你，闹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贫苦农民“一年到头忙，还是精打光”，卖儿鬻女，颠沛流离，终年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1926年，大别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兄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我们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我学过少林武功，还懂得一点军事知识，被选为乘马岗六乡的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从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就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支农民武装号称拥兵数千，但经常作战的只有二三十人，称作炮队。平时发现有敌来犯，只要鸣土炮报警，就会四方呼应，八面来兵，连妇女和小孩也拿着木棒、竹竿、菜刀，赶来“呵嗬！呵嗬！”地呐喊助威。那时的武器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我们炮队有几支钢枪以外，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是主要作战武器。尽管如此，也能够对付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和进攻了。

到了1927年，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叛变了，我们党内也有人跟着瞎嚷嚷：“你们以前闹错了！”尽管我们说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认准了一个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没有出路！

不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年11月，在湖北省委和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这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党领导一部分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我们乘马区有不少同志则留在本地继续坚持着斗争。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对于我和炮队的战友们来说，也面临着关联身家性命的抉择。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世代为牛马的农民，腰杆直了，说话粗了，去县衙门里可以大摇大摆，有钱人见了点头哈腰，这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放下枪杆子无疑是纵狼入室，自引杀戮。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下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

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人死算什么？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不能指望着那些“老爷”、“大人”们发善心，施仁政，这些统统靠不住。靠得住的是自己，是斗争，是枪杆子。我们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与其鱼水相依患难与共；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可以利用地形任意回旋；加上与我为敌的土豪劣绅死的死，逃的逃，反动势力较小，坚持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据此，我们横下一条心，豁上一身剐，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1928 年春，起义军重返黄麻，我们这支游击队即与他们会合。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 31 师。从此，我开始了在军队的漫长生涯。

我们那时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常常靠葛根、毛粟、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长期吃这些东西，两腿发软，浑身没劲。但战斗却十分频繁，今天围个寨子，明天打个埋伏，后天再来个昼夜百八十里的急行军，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拼杀几回。尽管这样，大家并没有怨言，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当孬种。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大家常说：我们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我们红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这段时间军事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游击战。我们的装备给养大都是取之于战，求之于民。军事理论有不少则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战术上也不太讲究，一般都是见机行事，“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

就走”。当然，也有死打硬拼的时候。记得我们后来曾经打过一个叫大山寨的地方。这个寨子是光山西南（现属河南新县）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动的一个，处处与我们作对，不打不足以除心头之患。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之上，青石垒寨，墙坚沟深，易守难攻。我当时是攻寨的敢死队队长，看准了守敌枪少弹缺，带着队员们硬是往上冲。敌仗居高临下，扔石头，浇开水，砸尿壶，泼大便，把我们打了下来。接着，我们顶着桌子，裹着被子，舞着大刀再往上冲。在这次战斗中，我被敌人从寨墙上一杠子打了下来，连伤带摔昏迷了两天两夜。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很舒坦，就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就是幸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当了两次敢死队长，带了六七次彩。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挂了彩一般都是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就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打仗用上了飞机、大炮、坦克，用上了导弹、激光、核武器，像当年这些近于冷兵器的作战方式，是显得太简单，太平凡了。不过，这些正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起家之本。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我年轻时去武汉，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感到真了不得，家乡的小河小溪相形见绌了。其实，那时还不懂得，正是小河小溪才汇成了滚滚洪流。没有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就没有后来的运动战、阵地战，也不

会有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总觉得外国这也好，那也好，别忘了自己也有传家宝，也有拿手好戏。

仗越打越大，部队也越打越强。1929 年下半年，我们连续粉碎了敌人“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在斗争中成长壮大了自己，不仅能消灭敌人杂牌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而且能够成连成团地消灭敌人的正规军。1930 年 4 月，我们红三十一师和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我们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红一师。我在红一师一团任连长。

这段时期我们打的仗相当多。打过杨家寨，打过杨平口，打过孝感花园，打过云梦县城，打过光山、罗山，还打过新洲、金家寨、六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围剿”。

1931 年元月，我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奉中央之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在第十师二十八团任营长。此后，我军主动出击，飘忽自主，克新集，袭柳林，出击京汉线，大战双桥镇，生擒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获得了鄂豫皖红军诞生以来进攻作战的空前大捷。

1931 年 11 月，部队再次扩编。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我在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团长。这时的红军已发展成拥有三万余人的雄师劲旅，对“围城打援”等战略战术，也已经驾驭自如，运用娴熟。紧接着，方面军连续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活捉赵冠英，痛打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重创张钫，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斗争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当班长，当排长，

直至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从当战士打到当干部，我逐步学会了带兵打仗的本事。我们的指挥员都应该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年轻干部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际锻炼。因为，战争不是儿戏，有无经验，在战场上完全是两回事。

有人说，官好当，兵难带，我看是官难当，兵好带，难还是难在干部。过去我们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兵好兵孬看干部。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打仗打出来的，是靠好指挥员带出来的。部队是要打仗的，军人既要流汗又要流血，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1932 年秋，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遣嫡系，纠集重兵，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而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张国焘，沉湎于已得胜利，盲目轻敌，不作准备，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其命令下，我团随全师再出京汉线，攻打鸡公山，两次围麻城，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四处出击，车殆马烦，连续作战达八月之久。当敌情日益严重时，张国焘又慌了手脚，战略方针连连出错，以我疲劳之师仓猝就精锐之敌。我军虽经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河口等处浴血苦战，予敌沉重打击，但终未能够打破“围剿”，被迫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1932 年 10 月到 12 月，我们出湖北，过河南，入陕西，抵四川；两次越秦岭，破冰涉汉水，冒雪翻巴山。我团时而前锋，时而后卫。一路上，草行露宿，荆棘载途，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加上

敌人对我围追堵击，险情迭出，方面军数次身陷绝境。在徐向前等同志领导之下，全军上下患难同心，英勇奋战，终究摆脱重围，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斗争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骨干。

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大流动”，倍感根据地重要。西征以来，部队犹如龙困沙滩，虎落平阳，受尽了窝囊气，打够了被动仗。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的切肤之痛就在于此。

四川人民饱受军阀欺凌，迫切要求革命，只要有火种，遍地干柴就会燃起燎原烈火。早在1926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我军抵达以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四川军阀们正在成都、内江一带混战。方面军总部审时度势，顺应军心民情，作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从此，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发展壮大的新阶段。

1932年底到1933年初，我军迅速占领通、南、巴，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在川北站稳了脚跟。这年七月，部队扩大了，我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团编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接下去，打仪陇，打南部，打营山，打宣汉，过关斩将，连克数城。短短两个半月，我方面军各部共歼敌两万，缴枪万余，根据地得到猛烈扩张，方面军也发展到八万余人，形成了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带的兵多了，打的仗大了，对指挥员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实战中，我逐步跳出了猛打猛冲的小圈子，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提高自己带兵打仗的本领。只有把局部与全局、战术与战略、目前与将来紧密联系起来的指挥员，方可堪称大智大勇，鲁莽的军事家是不足仿效的。

战争还告诉我们，兵无常势，战无定规。拘泥于“老套套”，满足于老经验，不足为取。在鄂豫皖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常常以进攻为主，在进攻中求发展。到川陕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四川军阀部队众多，地形熟悉。虽说彼此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反共上却是一致的。我军新来乍到，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终不像在鄂豫皖那样，土生土长，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这些不同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如果我们只知主动出击，不知积极防御，势必要吃亏碰壁。

反三路围攻时，方面军察情观态，提出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强我弱、优劣悬殊之时，先避不利决战，保存军力，疲惫敌人；拖到敌竭我盈，即集中主力，进行有利决战，毕全功于一役。此举经实战检验，颇见成效。其实，道理很简单。打人时，拳头直来直去，总不如收回再出有力。在后来的反六路围攻中，“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日臻完善，在我军的战略战术经典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1933 年 11 月，四川大军阀刘湘秉承蒋介石旨意，空全省之兵，集结二十余万人马，分兵六路，对我发动了长达十一个月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不为敌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前所未有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避其锐气，击其疲惫，有顶有放，先防后攻，最后大获全胜。当时，我率九军二十五师，坚守万

源以南的大面山阵地。刘湘在这里掏出了积蓄二十年的老本，集中精华，孤注一掷，以求一逞。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抱着横竖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志，凭险固守，浴血苦战，先后顶住了数万敌军的轮番进攻。待敌再而衰，三而竭，我军立即转入“最精彩、最活跃”的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麻之捷，横扫了四川六路军阀。

就我参加过的坚守防御而言，大面山一战，规模大，时间长，很残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样的仗。前些日子，我到了川北的通南巴和其他几个县。虽然河山已改，面目一新，但当年的战场仍依稀可辨，战斗情景又历历在目。站在今天看昨天，是有不少经验体会值得总结的。

坚守防御，重在一个守字。守住一点不走，这是敌人最头痛的。部队特别是干部，首先要有寸土不让拼命顶的决心和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一步的气魄。在紧要关头要咬住牙，我困难，敌人更困难，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之中。

大面山打得好，还因为部队觉悟高，纪律严，士气旺，作风硬。那时，我们上至军长下至战士，每人一把红缨大刀。情况紧急时，管你师长、军长，八角帽往下一拉，带着部队就往上冲。人人眼睛都朝前看，向冲在前面的同志看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不消灭敌人不回头。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我调至四军任军长。尔后，部队北进陕南，攻克宁强县，占领阳平关，进逼汉中城。接下去又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军阀焦头烂额，防不胜防。记得那时有首歌：

“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

这首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杨森（羊子）、田颂尧（冬瓜）、邓锡侯（猴子），李家钰（矮子），刘湘等人的窘相丑容，至今想来，仍然忍俊不禁。

张国焘这人很“特别”，我们明明胜利了，他却看成是失败。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他认为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破坏，红军待不下去了，说什么：“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并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他在后方不经任何会议讨论，自行由东到西收摊子，把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一锅端到了嘉陵江西。我们为之奋斗两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轻易葬送了。我军又陷进退失据的困境，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西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过涪江，跨岷江，前锋直达松潘、懋功（现名小金），意在摆脱不利处境，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 年 6 月，我们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消息传来，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奔走相告，期待着一个新的革命局面的开始。令人愤慨的是，事与愿违，衅起萧墙，张国焘出于卑鄙政治野心，一再违拒中央决定，公开挑拨两军关系，百般阻挠红军北上。致使我军坐失乘敌之虚向东北发展之良机，不得不涉险穿越草地。

草地茫茫，大军穿越，其艰其苦，无须赘述。值得提一提的是我军在出草地之后的包座之战。

包座，为我军北上必经之地，守敌是胡宗南部四十九师。据说这个部队曾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还是颇能打仗的。然而，这次

却甘忍外侮，同室操戈，当上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打手。我四军与三十军受领任务后，突袭该敌，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才把敌人砍光。这是我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的第一个仗，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至今记忆犹新。

部队过了草地以后，发生了一件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大事。张国焘又一次跳出来发难，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最近，看到一本他写的回忆录，书中仍在为己涂脂抹粉，极力推卸历史责任。其实，这都是欲盖弥彰，徒费心机。张国焘这个人道德品质不好，喜欢出风头，说大话，摆架子，耍军阀，领导作风简单粗暴，独断专行。打仗没什么本事，搞阴谋是个里手。红四方面军几遭重挫，都是他在从中作祟。历史是面无情的镜子。早在鄂豫皖时，他就以“党的化身”、“老革命家”自居，并以此张本，大搞宗派活动，顺者昌，逆者亡，竭力树立个人威信；进了川陕，他强化军阀主义个人统治，取消党的集体领导，经营独立王国，多次违抗中央指令；懋功会师后，他更有恃无恐，伸手要权要官，妄图变红四方面军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威逼中央；目的未达，又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哪里还有一点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动，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实为千古罪人。他被人民所唾弃，是理所应当，毫不足惜的。但是，他从反面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认真记取。

作为共产党人，从政不要有野心，从军不要争兵权，应该自甘为人民的公仆和党的一个兵。张国焘篡党篡军，落了个变节投敌，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林彪搞政变，落了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

都尔汗；“四人帮”想夺天下，落了个身陷囹圄，遗臭万年。野心家从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张国焘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可见孤立已极。

张国焘之所以能得逞一时，是利用了当时方面军广大干部理论水平较低的状况，得以大售其奸，这个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一个军人，军事头脑理当必备，政治头脑也不可缺。政治上稀里糊涂，难免上当受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害死人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如果抓枪杆子的不懂马列，不懂毛泽东思想，不懂党的方针政策，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时时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力争做到大事不糊涂。这样，才能永远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9月中旬，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我们再过草地，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10月上旬，我们四军强渡大金川，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中旬，攻占金汤镇、再下天全城，把刘湘的王牌——“模范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此时，敌主力业已集中，敌优我劣态势日趋严重。张国焘却无视现实，仍令全军向川西平原发展，致使我军在百丈地区与敌苦战七天七夜，伤亡近万，元气大伤。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完全正确。

12月初，我们四军出击荥经，薛岳打来了。在如何据峡口御敌的问题上，我同方面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摆一个团就够了。我感到兵力不够，再三力辩，未被采纳，只好服从。战斗打响后，薛岳集中了九个团，把我们这个团打垮了。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绝无仅有

的耻辱。给我震动很大，教训甚深。祸莫大于轻敌。峡口失利，正是那种大少爷指挥作风所致的恶果。多少年来，我每每告诫自己，任何作战决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万万不能独尊自大，一厢情愿。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指挥正确与否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不打则已，既打则要力争全胜。谁打了败仗，还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自慰，谁就是最没出息的指挥员。

南下碰壁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执意把我军拉向甘、青、新等边陲地区。1936 年 2 月中旬，部队向西康进发，接连翻越夹金、党岭两座雪山。接着，连克道孚、炉霍、瞻化，占领西康东北重镇甘孜。尔后，我入甘孜红军大学集训。结业后，就任刚刚组建的骑兵部队司令。

7 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

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同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分着吃，有烟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

爱兵蔚然成风，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长征还告诉我们，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会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红四方面军几经曲折，最后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1936 年 10 月，我们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尔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

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7月8日，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面抗战。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红四方面军大部编入一二九师。我先在抗大任校务部副部长，后随朱总司令上了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8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晋冀两省的大部分城市。我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太行山、五台山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四出游击，陆续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十几个城镇，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同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和三八六旅等进军冀南，我当时在三八六旅任副旅长。

由阶级斗争上升为民族斗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新的考验。当时，有些人只闻日军长驱直入，不见抗日烈火燎原，终日长吁短叹，说什么日军“不可战胜”；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不抗日，还到处制造摩擦。对此，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过去，我们打过地主武装，打过红枪会、大刀会，打过土匪、流寇、散兵，打过杂牌部队，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出一条经验：仗靠人打，路靠人走。侵略军为不义之师，我就不信什么“不可战胜”！

1939年初，日军纠集三万多人，分兵十一路，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杀我平民，烧我村庄，奸我姐妹，毁我家园，无恶不作，暴戾恣睢。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挫敌凶焰，陈赓旅长和我们分析了敌人

的骄傲情绪和逢挫必要报复的规律，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调敌就范，诱伏日军。2月7、8、9三日，我旅以一部连袭威县、曲周等城，致使敌人恼羞成怒，组成快速部队，由一个大队长带队，向我“扫荡”而来。10日中午，日军果然中我圈套，全部进入我旅预设阵地的香城固一带。我们立即于四面发起攻击。前后仅八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擒八人，缴获其全部装备。这一仗，大长我志气，大灭敌威风，戳穿了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使那些摇头的、叹气的、说风凉话的人瞠目结舌。

面对强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他越猖獗。如果我们顶不住，不敢打，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就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大部在此。

1939年秋，我调华北党校学习。不久，赴山东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同日伪顽战斗在渤海之滨，战斗在黄河入海处，战斗在清河两岸。

1941年春，我奉命带清河分区独立团至胶东，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组织反投降派的斗争。

胶东的投降派、顽固派，有大小二三十个司令，共约五万人。

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山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后来，居然一手拿着太阳旗，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旗；公开组织“反八联军”，勾结日伪残害百姓，对我实行军事进攻。对这些死心塌地的投降派，不打不足以克服投降危机，不打不能使我军全力对日作战，不打不利于抗日形势的顺利发展。此役我从胶东的牙山打起，尔后居高临下向南横扫。在五个月中，接连打垮蔡晋康、苗占魁、秦玉堂、郑维屏、安庭赓、赵汉卿、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司令”，使胶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战役结束后，我即回山东纵队，任纵队参谋长。1942 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我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不久，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决定成立胶东军区。我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我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刚刚走马上任，敌在大战犯冈村宁次的亲自策划下，发起了“拉网合围”的冬季大“扫荡”。这次“扫荡”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手段之毒，均为过去少见。两万日伪军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无村不搜，无山不梳，无林不篦；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无所不用其极。

斗争残酷，方显战士本色。我们利用人亲地熟，化整为零，空隙插孔，破网突围。抄敌后，袭据点，破公路，断交通，夺粮草，烧仓库，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年底收兵回窜。

此后，敌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对我实行“蚕食”、“囚笼”政策，频频占地掠边，加强伪化活动。胶东投降派坐收渔利，乘势扩张，内外夹击我军。

寇能往，我亦能往。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我们采用“翻边战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反摩擦，变守为攻，主动出击。仅1943年一年，作战达九百七十五次，占敌据点二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敌之封锁蚕食阴谋，被我打得稀烂。

1944年8月，我胶东部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一个月中，克水道，收文登，占荣城，逼威海，横扫敌据点一百三十余处，歼日伪军五千余人。威震胶东，称雄四海（胶东的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四个专区）。胶东这把刺刀，越磨越利，越战越坚！

在胶东，赵保原为大小投降派之首。此人出身土匪，反复无常，早在1937年就公开投敌，随日军入胶东后，一度“反正”。羽翼丰满之后，他毁弃抗日招牌，再次充当日军鹰犬，鱼肉百姓，祸害胶东，顽固与我为敌。几年来，该敌虽遭我军多次打击，但均未能全歼其主力，捣毁其老巢，仍为山东全境最大的汉奸武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讨伐赵保原，势在必行。1945年初，我们定下早打、快打、狠打之决策，发起讨赵战役。3月11日到19日，我军首克万第，再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大获全胜。战斗中，赵保原漏网而逃，1946年被我击毙于胶县，枭首示众。中国有句老话：报应之来，迟早不爽。此语颇有见地。

回顾在胶东的斗争，深感“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群众，我军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

不能生存，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无论是在鄂豫皖，在川陕，还是在胶东，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当向导、递情报、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运给养，贡献最大，牺牲最大。他们的业绩，值得我们的史家、作家们大书特书。

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就有人下山来摘桃子了。在这中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转折关头，作为军人需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暴力是为政治服务的，该争就争，该夺就夺，在原则问题上无客气可言。当时，我正在山东军区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立即带领在校学习的胶东干部返回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放手大反攻，解放了除青岛、即墨外的胶东全境，使八年抗战的成果握在了人民手中。

1946 年 6 月，蒋介石翻脸不认账，撕毁了自己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山东是其进攻的重点之一，投入了五个军十五个师的兵力。敌人的企图是：打通胶济线，切断南北联系，各个歼灭山东我军。大敌当前，我们不畏其气势汹汹，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在节节阻击中寻机歼敌。至 1947 年 3 月，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死伤近两万，只占了胶东的一些点线。而我军仅用半月时间，以风卷残云之势，又悉数收复失地，使胶济线重归我手，取得了与敌交战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1947 年初，山东、华中野战兵团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所辖部队随之改编为野战军第九纵队，我兼任该纵司令员。

从 1947 年 3 月起，我纵队奉命西进参战，下莱芜，战和庄，坚守白马关，攻必克，守必固，屡胜顽敌。5 月，在陈毅同志的指

挥下，我纵和兄弟纵队一道，插进沂蒙山，大战孟良崮，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全歼“蒋家五大金刚”之一的敌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吓得敌人四个多月没敢向我进攻。

6月下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根据中央指示，山东我军以八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进行外线作战；以二、七、九、十三等四个纵队和两个师组成东线兵团（后改为山东兵团），留守内线作战，我任该兵团司令员。

9月，敌为挽救危局，又调集六个整编师二十五个旅的兵力，配合以海军空军，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下，大举进犯胶东。企图消灭我内线主力，抽兵支援其他战场。我们虽面对强敌，困处重围，但深知战事在胶东，意义在全局。在敌我众寡悬殊、形势极为严重的胶东保卫战中，我们坚韧沉着，后发制人，在敌人即将把我们赶下大海的情况下，猛然跳入敌后，一举扭转战局。接着，大杀回马枪，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从此我军完全掌握了胶东战场的主动权。

在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双方兵力对比我劣敌优。我们作战是以防御为主，在防御中局部反攻。仗打得多，打得苦。胶东部队之所以深孚众望，打了不少漂亮仗，是因为有一批能攻善守的干部。战争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必须善于提挈全军，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战役企图的实现才能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有好将，就有好兵，就有好仗。我以为，军事指挥员应随时随地地注意发现军事人才，特别是在战争中更应如此。谁能打，谁会打，就应立即提拔而不加犹豫。不要怕压不住阵脚，不要以一眚掩大德。只要我们的文才虎将，济济一堂，宝刀不老，

新人辈出，就能稳操常胜之券。

1948年春，全国形势起了巨大变化。蒋家王朝摇摇欲坠，我军节节胜利，越战越强。根据党中央力争不间断发展到完全胜利的战略方针，我山东兵团于3月到7月，先挺进胶济线，由西向东横扫胶济线五百华里；接着进军津浦路，由北向南横扫津浦路七百华里，连战皆捷，声威大震，歼敌十四万七千余人，解放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山、潍县、邹县、兖州等数十座城镇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得敌人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不能，只有被我一个一个歼灭干净。

接下去，我军又发起了济南战役。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打援和攻城两个兵团；在野战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下，由我和谭震林等同志指挥攻城兵团，担负直接攻克济南的任务。

攻打济南，这是我军攻打的第一座大城市，敢不敢打，会不会打，打得下还是打不下，敌人、朋友、兄弟部队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意义之大，非同一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役高度重视。战役前后，主席多次亲自起草来电，指导战役进展，这对我们取得战役全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济南战役打响以后，我们所采用的“牛刀子”战术奏效。部队从敌外围阵地中，杀开了一个口子，像一把牛刀直插城内。打得敌人左防右堵，东遣西调，完全昏了头。但我军攻进外城以后，被阻于内城墙之下。当时部队已连战六天六夜，人疲马乏，伤亡很大，是撤出城外休整，以图再举；还是一鼓作气，不使敌有喘息，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节骨眼上，说话拍板算数的人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被

无关大局之变化所左右，不要为一时困难而犹豫。我们认为，仗已经打成了这样，攻城决心绝不能动摇！如果撤，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前功尽弃，再战还要大大增加部队伤亡，甚至可能出现欲攻不克、欲撤不能的局面，致使全役功败垂成。这时，需要的是咬紧牙关，哪怕是血流成河也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婆婆妈妈。如果只想着部队这个能否受得了，那个能否受得了，就没有办法指挥部队，也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经过八天八夜浴血奋战，我攻城部队完全攻克济南，毙伤俘敌十一万余，活捉敌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实现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誓言。

济南解放，威及全鲁。菏泽、临沂、烟台守敌纷纷弃城鼠窜。山东境内除青岛等少数敌据点外，全获新生。我华东野战军立即挥戈南下，会合中原野战军，在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发起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龟缩于青岛之敌惶惶不可终日。1949 年 6 月，我山东军民向青岛大举进攻，守敌仓皇落海而逃。这个陷于日、伪、蒋之手多年的海港重镇回到了人民怀抱。八月，我军扬帆过海，收复了京津门户的长山列岛。到此，山东全境均告解放。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内乱迭起，屡遭外侵，兵连祸结，狼烟不息，人民饱尝战乱之苦。新中国成立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渴望能够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但是，世界上偏偏有那么一种人，看不得共产党坐江山，看不得穷苦人过好日子，总想着给我们添点麻烦。1950 年，美国的

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

我于1953年3月出国参战，任三兵团司令员。

当时，战场形势越打越好。我军灵活运用毛主席提出的“敲牛皮糖”的方法，打出了一套阵地防御战的新战术，而且进一步提高了阵地攻坚战的本领。7月下旬，我带领所属部队参加了夏季大反攻。我军在金城地区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南推进数十公里，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一片混乱。这和美军进攻我上甘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54年2月，我调华东军区任第二副司令员。同年10月，兼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原华东军区撤销，成立了南京军区，我任该军区司令员。1959年9月，我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在这以后的数年内，我们以主要精力抓了战备、训练这些大事。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我们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练兵运动。

到了十年动乱，我也是“在劫难逃”。一会儿“反动”，一会儿“革命”，什么打倒啦，砸烂啦，炮轰啦，火烧啦，听了不少。家被抄了，东西被没收了，连警卫员也被赶走了。其实，这些都是唬人的东西。几十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还在乎你这个！就在林彪那伙人点了我的名，冲击了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准备给我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时，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后来，又把我接进了

中南海。周总理也多次明确指示：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保护下，我总算没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970 年 8 月，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之流在会内会外煽风点火，发动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一天下午，毛泽东同志把我找去，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十分恳切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主席的话使我认识到，要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自己梦想当主席。1971 年 8、9 月间，毛泽东同志到外地视察，又把我们从南京叫到南昌。告诉我们：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毛主席的话，使我进一步看清了林彪这个人的恶劣本质，对我起了同林彪斗争到底的动员作用。几天以后，林彪的武装叛乱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我们立即按照中央之命，迅速收拾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

1973 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我调到广州军区工作。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974 年初，西贡当局已行将就木，偏要兴风作浪，在我西沙、南沙群岛屡起事端。为护主权，保国土，卫人民，我们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狠狠教训了这些反华小丑。

1976 年 9 月 9 日，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震惊，我当天就赶到了北京。肃立在老人家的遗体旁，我这个平时极少流泪的人，忍不住热泪滚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都非

常悲痛，而江青那伙人面装忧戚，暗藏祸心，口吐狂言，目中无人。这一切，都引起了我的警惕。记得毛泽东同志在生前，曾要我们看《周勃传》。当时，林彪叛乱已被粉碎，又有什么人想发难呢？后来，主席一再严厉批评“四人帮”，我就心中有数了。在所谓批林批孔和以后的一系列的运动中，“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这就更加擦亮了我的眼睛。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顺应党心、军心、民心、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准备对付最困难、最复杂的局面。

10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执行人民意愿，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伙乱臣贼子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9年初，黎笋集团出于民族扩张主义的野心，背信弃义，猖狂反华，在边境地区杀我民兵，掠我公民，侵我国土，愈演愈烈。小霸胆敢如此欺侮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这次反击战，我负责指挥广西方面的部队。同过去的战争相比，这次是个小仗，但却是继抗美援朝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我参战部队大都近三十年没打过仗了。但是，我们师出有名，反击有理，是正义之师，这一仗非打不可！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谷深、路险、林密；天气炎热，光下雨，光起雾。在这种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打仗，我们还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仗，指挥员要特别动脑子。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我边防部队突破越军多道防线，

直插高平、凉山，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1980 年初，根据中央指示，我调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1982 年 9 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举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人老了，身体和精神就不如从前，为党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作为党的一个兵，思想上永远不能下岗。将来一旦有事，我虽不能冲锋陷阵，仍然可以当参谋，做顾问，出点子，为年轻人撑腰鼓劲。现在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同志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又为我们规划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蓝图。胜利正在召唤，前途无限光明。

同志们，努力吧！

（摘自《许世友回忆录》）

主要参考引证书目及文章

《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许世友的晚年岁月》，徐开福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毛泽东之剑》，王宣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许世友传》，金冶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近看许世友》，李文卿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许世友将军与酒》，衡学明，载《广州日报》1991 年 8 月 24 日。